

# 築橋

利銘澤的生平與時代

香港：一九零五年至一九八三年

VIVIENNE POY



加港文獻館惠存

德董心

九八





# 築橋

利銘澤的生平與時代

香港：一九零五年至一九八三年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09 with funding from  
Multicultural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利銘澤，1964年





# 築橋

利銘澤的生平與時代

香港：一九零五年至一九八三年



CALYAN  
PUBLISHING LTD.

利德蕙著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 目錄

謝言

序：李國章教授

前言

永別

## 第一章

青年期：香港到牛津

童年

牛津求學

友誼

祖父的企業

## 第二章

香港結婚到中國工作

父母親初會

婚禮

祖父遇害

一家之主

廣州工作

海南島墾荒

返回香港

青年期：香港到牛津	一
童年	
牛津求學	
友誼	
祖父的企業	
第二章	
香港結婚到中國工作	十二
父母親初會	
婚禮	
祖父遇害	
一家之主	
廣州工作	
海南島墾荒	
返回香港	

第三章

戰雲密佈：香港淪陷

.....二十七

捍衛香港

香港戰役

日治時期

中國游擊隊

父親是抗日戰士

第四章

家族逃難

.....四十一

逃離香港

桂林的日子

再度逃難

重慶的日子

日本投降

第五章

戰後：社會變遷

.....五十三

配糧及缺糧

健康問題

難民家庭

房屋問題

難民與工業

難民與教育



第六章

美好的年代

休閑出海

利行和大屋

僕人和小販

使館大廈

.....六十二

第七章

邁向種族和諧：香港鄉村俱樂部

多元種族俱樂部

邁向種族和諧

俱樂部晨泳

.....七十五

第八章

利氏家族企業

利舞台

發展地產

利園酒店

父親和漢釗

股票上市公司

.....八十一

第九章

吾家有女初長成

祖母的喪禮

父親和我的英國教育

麥基爾大學，結婚成家

與父親同遊中國

.....九十一

第十章

由動亂至改革：對高等教育的遠見

.....一〇三

一九六七香港暴動

社會改革

父親和教育

高等教育

一所新大學

第十一章

日本關係

.....一一六

日本學校

中國與日本之間

山一證券

第十二章

愛國華人

.....一二三

解決水荒

香港與中國之間

中國關係

花園酒店

第十三章

生意人

新隧道

電話公司

煤氣公司

羅富齊銀行

丹麥關係

航運公司

加拿大關係

.....一三七

第十四章

共濟會：終身的承諾

.....一五〇

第十五章

高瞻遠矚

心靈祥和

.....一五四

結語

.....一六三

利銘澤生平事業摘要

利銘澤弟妹名稱

註釋





謠歌給

與  
先  
父  
交  
往  
過  
的  
人



# 謝言

這本有關先父生平的傳記，是匯集了各方熱心人士的幫助才能完稿付梓。我首先要向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主席利漢釗先生，謹致最深的謝忱，沒有他的支持和鼓勵，不可能有這本書的誕生。同時要多謝香港太古集團公司及分公司董事姚剛先生、恒生銀行董事長利國偉爵士、父親生前秘書李樂君女士、東亞銀行董事長李國寶先生、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校董會主席馬臨教授、日本山一證券前任副主席白石信一先生、父親和利氏家族的好朋友吳慶塘先生、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聯合亞太研究所的加港文獻館館長楊國雄先生、和香港日本人俱樂部事務局長吉岡義之先生，他們不厭其煩的回覆我的問題及為我提供許多珍貴的資料。

另外要向Barbara Bennett女士、Sir Jack and Lady Peggy Cater、陳之昭醫生、陳紀萱先生、加藤智惠子女士、招黃瑤芬女士、Ruth Hayhoe教授、何銘思先生、何建立先生、胡黃瑤芝女士、黃茂蘭先生、Per Jorgensen先生、關榮昌先生、利乾先生、利榮森先生、利定昌先生、利漢輝先生、利江蕙蘭女士、李國章教授、李國星先生、利鄭靈愛女士、梁威林先生、林達光教授、廖烈文先生、Percy O'Brien先生、緒方鈴子女士、伍英才先生、Lady May Ride、Elizabeth Ride女士、Dr. Ray Rook、Ronald Ross先生、Sir Evelyn de Rothschild、盛樹珩先生、譚葆和先生、譚徐靈輝女士、George Todkill先生和王匡先生為此書所作的貢獻致謝。

在為此書作研究工作時，我非常感激香港中文大學的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陳尹璇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文化領事陳榮生先生、遠東經濟評論高級編輯秦家驄先生、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主任尹耀全先生、加港文獻館李有名先生、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李三千女士、香港東亞銀行律師鄭晏女士、香港大學畢業生陳家慧小姐、香港大學圖書館員朱進榮先生、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主席的秘書黃徐秀蘭女士、多倫多大學聖麥可書院中古歷史研究院秘書Karen Diensdale女士所給我的協助。

我特別要多謝多倫多大學特等教授秦家懿，對我耐心指導，幫助我規劃出此書的格局，及整理大量的資料。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聯合亞太研究所，加港研究計劃主任陸鴻基教授給我的意見和指正，我由衷的感謝。同時要對學者顧漢昭先生及前香港政府退休公務員簡仲元先生，為我所做的中文校對和建議，表示謝意。

此外，我的助手陳小芳女士，對我不斷的協助並將此書譯為中文，及她所複製的地圖，我也非常感激。最後要向我丈夫衛權為我攝製的新、舊相片，次子俊雄所做的封面設計，及為出版此書所付出的心力，致上我最深的謝忱。



# 序

利銘澤博士的一生，從任何標準看，都有卓越不凡的成就。他經歷過現代中國歷史上眾多的動亂事件，而在發展香港成為今天我們所見繁榮蓬勃的國際大都市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他出生於香港富貴家庭，在牛津大學受教育，見聞廣博，年紀輕輕即主掌家族企業王朝。他高瞻遠矚，認為現代中國需要國際間的聯繫及友誼，並肯定香港所起的作用，這些見解在他的時代以至將來都一樣適用。從他致力改進市民住屋、教育、福利問題，及其幼女德蕙在此書所述的其他重大貢獻，可看出他對香港民眾的關懷愛護。作者在書中與我們分享了一位才智之士的生平，其中不乏個人悲劇，包括青年喪父和中年喪子的悲痛。利博士慈善為懷但不感情用事，雖然家境富裕但自奉甚儉。

利博士為人果斷堅守原則，極少人能像他一般會辭去香港政府的行政議員席位。他為人公平正義，揉合了中國儒家精神與西方思想的優點。

正如德蕙在書中以玩笑口吻，提及當年利博士被港人推測為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後，首任的特區首長人選，他們卻不曾想到他屆時已是九十二歲高齡了！雖然這只是當時的一種推想，但其中不無出於香港市民對利博士的期盼和景仰，渴望有像他這等地位和成就的人物來帶領香港。也許，利銘澤博士正是香港無緣擁有的最佳總督或首長。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李國章

一九九八年三月

# 前言

我的父親利銘澤是個怎樣的人？

他作風嚴謹，主見頗強，嚴守時刻，律己甚嚴，自我要求極高。他是個典型的中國父親，對子女的疼愛很少形於外，從無摟抱親暱動作，但對子女關懷備至。不知他為人者初見他時都會敬畏三分，因為父親不笑的時候看來非常嚴肅，事實上他為人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也常面帶笑容，但在照像機前，他認為應有莊嚴的形象，所以從無笑容。他誠實聰穎，工作勤奮，樂善好施，待人慷慨大度，但自己則甚為儉樸。他又是一個極有原則能為奉行理念獻身的人，而且熱心公益，關懷社會與民眾。由前來父親喪禮弔唁的賓客中，可反映出父親的一生。

父親生前是土木工程師，他在有生之年建造了兩種橋樑：一種是鋼筋水泥有形的橋樑，另一種是用愛聯繫的精神橋樑。兩種橋樑中，以他為香港及中國所建的人際橋樑最為重要。

我自一九五六年即離家出外求學，其間僅有一年時間在香港，所以失去許多與父親相處，及耳聞目睹父親為人的機會。父親去世後我才明瞭，他不僅是屬於我們的，他也屬於香港、香港社會和香港市民的，他也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我對他的生平一直充滿好奇，現在我終於可以將它公諸於世。

這本有關父親生平的記事，是根據我對父母親的回憶，和他們的往來信件，及探訪接近父親的人士，加上我自己個人的觀察及與父親的關係所匯集而成。父母親共有子女四人，二子二女，性格各異，與父親的親情關係也各有不同。本書所述全基於個人的觀點，並為尊重家人隱私起見，家族成員將會不時提及，但並非本書重點。

利德蕙  
一九九七年於多倫多

# 永別

一九八三年夏日炎炎的七月十一日，香港正值盛暑，這是父親出殯的日子，母親一早便帶領哥哥、姐姐、我和孫輩，與其他家眷穿好黑色孝服，準備去香港殯儀館。

喪禮之前幾日家屬在殯儀館守靈期間，已有三千多人前往靈堂致哀。依據中國習俗，弔唁者在靈前對父親遺像鞠躬三次，然後由全體穿著殯儀館孝服的家屬起立，一致鞠躬致謝。其中一日我們必須極早到達靈堂，因為一些香港政府立法局議員及行政局議員，安排在飛往北京與中國會談之前，先來殯儀館致哀。七月十一日早上八時便陸續有各界人士前來弔唁，許多人一直留到十時以便參加安息禮拜。

由靈堂陳設，任何人都會一眼看出父親生前絕非一個普通人。遺像一旁最大的花園是由剛上任的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所送，另一旁則是港督尤德送來的花園。此外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尚昆、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姬鵬飛、中央政治委員習仲勛、廣東省委員會第一書記任仲夷、人民解放軍政委余秋里、廣東省省長梁靈光、香港政府布政司夏鼎基爵士及其他多位社會知名人士均有致送花園以表哀悼。

當天除親友之外，尚有香港及中國的各界知名人士前來參加父親的喪禮。包括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主席Michael Sandberg、置地有限公司行政董事Trevor Bedford、財政司彭勵治、市政局主席張有興、行政局議員方心讓及羅德丞、立法局議員田元灝及黃麗松，另有鄧肇堅爵士及電影界巨子邵逸夫爵士等人。兩位前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王匡及梁威林分別由北京及廣州前來參加喪禮。但其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般市民，我只認得一些我們公司以前的員工，今天這些市民來到這裡，只因為在他們的人生歷程中曾經與父親接觸過。

十位扶靈人士為：《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日本駐港總領事山田中正、行政局議員簡悅強爵士、香

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友人胡百全和李福樹、共濟會愛爾蘭總會駐遠東最高代表Arthur Gomes、香港大學資深總務長N. J. Gillanders、《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及特別得到北京准許為父親扶靈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

喪禮採基督教儀式，約有一千五百人參加，在父親生前所屬二十多年位於銅鑼灣的聖瑪利亞教堂舉行，由林汝升法政牧師主持安息禮拜。禮拜之前並由我們家族的老朋友胡百全律師略述父親生平；父親一生不僅各方面成就卓越，影響重大，表現非凡，更可貴的是生命中充滿了慈愛。

香港總督尤德爵士因於七月十一日赴北京會談，署理港督夏鼎基爵士聞悉父親逝世後說：「本港失去了一位戰後以來主要的公眾人物」<sup>(1)</sup>。父親生前與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前後的關係深遠，一直將此大學視為自己「兒女」之一，校長馬臨博士說父親的逝世是大學極大的損失。工商界友人形容父親是個「有遠見」及「深具影響力的大好人」，更是利氏家族的「棟樑」。中國的領導人則稱父親為「老朋友」及「愛國者」<sup>(2)</sup>。

香港市民皆惋惜他們失去了一位關心、體恤他們的好人。而我則痛失了一位摯愛我的慈父。

# 築橋

利銘澤的生平與時代

香港：一九零五年至一九八三年



# 第一章

## 青年期：香港到牛津

十 九世紀末的香港，有皇宮似的華廈，是一個比義大利熱那亞海港還更美麗的地方，在維多利亞市區懸浮雲端的山頂，是富有英國人居住的地方。以上是美國作者Eiza Ruhamah Scidmore，在她一九〇〇年出版的《中國——長存帝國》一書中，對香港的描寫。這時香港山頂為歐洲人而設的新醫院剛落成，《南華早報》正初創刊。當時華人除何東爵士家族外，只有歐洲人可以居住山頂地區。

太平山下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九〇四年開始有單層電車，全天候開放。舊式交通工具漸由街上消失，華廈的廐房也暫空置。那時香港尚未有汽車，人們外出坐黃包車（人力車）或乘轎，貨車多用黃牛或水牛拖行。街上隨時可見苦力肩挑重擔，喘著大氣。

當時島上人口已有三十二萬五千人，多為華人。一九〇一年遭受旱災，須由新界運送食水至維多利亞，政府為解決日趨嚴重的水荒問題，開始計劃興建全新和較大的水塘。

由九龍海傍排列的大貨倉，及比十年前增加六成入港的船隻看來，香港這個港口是開始興旺了。香港置地公司開始在中環（維多利亞商業區）進行開發後，中環滿佈新的四、五層樓建築物，煉糖廠、麵粉廠、棉紗廠、及水泥廠皆相繼創立，分別由渣甸及太古集團這類商行控制其營運，匯豐銀行主導金融，太古獨佔煉糖業。

儘管英國國內強烈反對販賣鴉片，但香港政府每年由競投鴉片專利權上獲利超過二百萬元，此時多家商行亦開始將販賣鴉片所獲利潤投資於正當事業。當年國人吸食鴉片之風頗盛，約有一成男子皆抽大



煙。雖然政府由一九一〇年開始不再發售新的煙館〔中國男人聚集抽大煙的場所〕牌照，但至一九四五年由澳門葡萄牙政府持牌所出售之鴉片皆為合法。

那時香港華人及非華人居民分為兩個不同的社區，除工作外各不相涉，華人日常起居與歐人完全隔離。華人男子大多留滿洲式的長辮或馬尾，很少著西服，多數穿唐衫褲或長袍馬褂及軟黑布鞋，極少參與西方運動或游泳，他們與洋人幾乎全無交往。老先生喜歡在白天拎著鳥籠去戶外溜鳥，孩子們便踢毽子或放風箏，入夜則可聽到此起彼落的麻將辟啪聲，麻將是當時華人最喜歡的休閒娛樂。

至於中國婦女，除了街頭小販、蛋家婦女、掃街婦及補衣婦外，從不出門。有錢人家纏小腳的婦女足不出戶，穿著華麗，裙褂繡滿花紋，窮苦女子只能穿粗布衫褲。

儘管當時有人將香港形容為皇宮一般，但香港華人居住環境卻非常不衛生，鼠疫及瘧疾等傳染病甚為流行。根據一九〇七年調查，政府衛生隊在對違反衛生條例的屋主及建築包商的物業，做滅鼠行動及在蚊蟲滋生地方噴灑殺蟲藥時，發了一筆小財。衛生問題後來演變成種族偏見，遂有華、洋分區而居之要求。繼在山頂區為歐人設保留區之後，在一九〇二年基於衛生理由，更將九龍的一個地段劃為歐人居住區，因政府不信華人之衛生習慣能改善蚊蟲繁衍問題。但日後外務大臣 Joseph Chamberlain 對此規定加以修正，而將此區開放給「清潔習慣良好之人士」居住，附註包括有良好水準的中國人在內。

香港在一八四一年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後，經過很長一段時間華人地位方被肯定。逐漸出現的華商，因他們在生意上的成功及社團的領導地位，如慈善機構東華醫院，其董事局成員是華人的權位的表徵，被殖民地政府認為是華人社區的代表人物。雖然一般學校仍採種族隔離，皇仁書院仍鼓勵不同國籍男生入學。中國學生更有機會學到西方文化及西方人士經營商業的方法。

這就是父親出世時的香港。



## 童年

### 祖

父希慎公和二祖母張門喜，在一九〇五年三月七日生下長子銘澤。祖母婚後雖曾產下一女，但不幸夭折，所以我父親當時不僅是長子，亦是家族中唯一的後代。祖父結婚七年仍未有後，所以當二姨太有喜的消息傳出之後，家人都極為興奮，祖父並特別安排歐洲助產士接生，認為歐洲助產士比中國接生婆衛生及較有見識，因在長女生下夭折之後，祖父不容許在生產過程中有任何差錯。

父親出世後福星高照，不僅是家族有了後嗣，而且祖父進出口事業亦開始一帆風順。祖父所購之南亨船務公司旗下貨船，頻密往來於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亞與仰光之間，後來祖父漸成為南北行行商中頗受尊重的知名人物。南北行是一個由華人和東南亞商人所組成的商會組織。

按照中國舊時風俗，若妾室先於正室生子，此子須交由正室撫養，祈能借福生男育女。父親幼時亦是如此，他由祖母親自撫養，果然，在二祖母生下次子之後，祖母也陸續生下二子、二女。

父親自小即與祖母感情融洽，一如親生母子，祖母對父親任何決策上的尊重，在祖父死後對家族裨益極大。

孩提時的父親健康壯碩且頗精靈，一如二祖母他面窄身形不高，雙手剛強有力，並有祖父黝黑的皮膚。中國男子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後才剪去髮辮，所以我猜父親和祖父都曾留過辮子。

父親幼年住在香港，但也常拜訪住在廣東祖祠所在嘉寮村的曾祖父母。父親曾經告訴過我，照那時鄉下人的生活習慣，曾祖父母一天只吃兩餐飯，一餐早飯，另一餐則在下午四、五點鐘吃。對我來說非常奇怪，但想是當年糧食不足的原故。祖父財產日增後，謠傳土匪企圖綁架曾祖父母，祖父便將他們移至離嘉寮村不遠的新會城內，另建新屋奉養。

身為長子的父親，不僅在祖父心中非常重要，同時也極得曾祖父母的寵愛。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曾祖父總是以餵食的方式，來表示對他的鍾愛，甚至在父親熟睡時，都要塞雞腿在他口中！曾祖父也常告訴父親在歐美淘金熱時，他坐小船橫渡太平洋去金山（三藩市）的艱苦旅程，與海外美

洲華人的生活情形。雖然祖父身為次子，但父親在家族的地位十分重要，曾祖父去世後，依我們鄉下風俗，遺體由嘉寮村沿河船運出殯時，由父親坐船頭，祖父坐船尾，中間則是曾祖父的棺木。

父親五歲時，香港再度流行鼠疫，祖父便將家人移至澳門，自己留在香港工作，多數家人在澳門住到一九一八年為止。祖父本人受過良好教育，所以對子女教育問題極為重視，當家人住澳門期間，特聘名師陳子襄先生為子女授課。

祖父後來在香港的生意及地產投資日漸成功，成為島上首富之一，便陸續收納三姨太及四姨太。當時男人均以妻妾成群，子孫滿堂來炫耀財富，祖父對家中日漸眾多的子女都非常鍾愛。他也非常了解給在英國殖民地區的子女接受英國教育的重要，所以祖父便將父親由澳門送入香港最好的皇仁書院就讀，皇仁書院當時被視為遠東的Harrow和Eton。

祖父幼年與曾祖父住舊金山時即開始學習英文，返國後曾祖父非常有遠見地將祖父送至皇仁書院就讀，以繼續他的英文教育，這不但對他日後在香港事業的發展助益極大，而且與皇仁校友莫立起未來良好的社會關係。所以祖父要他的子女也能得到同樣有利的條件。

## 牛津求學

祖父對英國教育制度非常了解，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將子女送到英國，完全浸淫在異國環境，學習英國人的生活習慣，並有機會交到日後對他們有幫助的朋友。一九一七年父親十二歲時，與三弟在保姆陪同下赴英求學，住在塾師邱吉爾(Churchill)家中接受教導，準備申請入大學，此時他們才有英文名字，父親為Richard Charles，三叔名為Harold。數年後父親的兩位妹妹也陸續赴英就讀，祖父希望一旦將子女們送往英國之後，他們皆能在當地完成學業。父親和叔叔們出國之前均被告誡若他們與異國女子成親的話，將會喪失家產繼承權。

父親非常喜歡邱吉爾先生，對我們稱他為「邱老」，直到邱吉爾先生去世，他們都保持書信往

來。邱吉爾先生晚年時視力漸失，我相信在他人幫助之下才能與父親仍保持通信，我還記得看過他潦草的字跡。

一九二〇年代時，較為先進及富有的華人家庭，非常盛行將大學年齡的子女送到英國、法國、德國或日本求學。香港華人學生多數選擇英國，當時只能坐船經蘇伊士運河前往英國，路程須費數星期。

父親由英國寄給澳門舊日鄰居的書信，後轉載於香港母校《子褒學校年報》中，提到當地華人奮鬥經歷，及一些枉負父母苦心，無心向學的富家子女在國外的情形，原文如下：

敬稟者。生等到英已來。平安無事。至於水土。則凡華人無有不合者。生等現寄居前香港工程師處。地名惡斯佛。華人號之曰牛津。為世界最有名大學之地也。華人極少。連生等亦不足十人。其中二人者。使人聞之驚駭。及可振人人自立之精神。二人者。周陳其姓。開平人。於十一年前彼等欲往北美洲加拿大謀生。豈知地球上不止一倫敦。英京亦名倫敦。當彼由鄉出港時。託人代購船位。但其代購之票。是來英國之倫敦。不是往加拿大之倫敦者。船開時。彼等尚未知之。只識往倫敦其地耳。船到後。久無親戚前往接船。心知有異。於是上岸行遊。全未見有黃面黑髮之人於道上。後來查問。乃知此是英國。非彼二人所欲往之地。斯時欲哭不能。欲笑不可。如是數日。游蕩至牛津。時旅費將空。二人以為發奮自立。尚可希望將來。於是設洗衣店於此焉。為時不久。名馳遠近。牛津一縣。無有不知之者。至今十一年。生意興隆。此處數十間之大學學生。多往交付。無他。潔淨而已。凡人出外。苟能自立。則不愁度日無方矣。生等今忘記彼等之名。彼此不暇。故未能時往相見也。今之留學於此者。多是不知稼穡艱難之輩。懶惰非常。往考大學試時。此科曰難。別科亦曰難。科科均以難字自騙。覺難矣。於是不考。若不考。則父母必有責罵。於是入一不用考試之大學。譯之曰無

大學。不論何人均可入者。於此掛號後。則寫信回家曰。我今已考入牛津大學矣。其在金橋者。則曰我今考入金橋大學矣。其家人則全不知其中之弊也。以為牛津金橋二大學而已耳。豈知金牛各有大學數十間之多。此輩掛號後。則遊蕩終日。蓋極奢華。待至三年期屆。則買一紙文憑回國。虛張聲勢。及刊於報紙上曰。某某牛津或金橋之畢業生也。苟有知之者而問之曰。汝於牛津或金橋何校畢業。試為我言之。彼等必無以對。此等之人。今亦見有其二矣。今也中國如此之弱。處於列強之間。苟無人材。將何以救國。但此輩尚不自猛醒也。中國許多志士。欲出洋留學。因父兄無力供給。致不能往。今此輩得父力。而尚不努力。哀哉。牛津縣裡。其氣候使人極為疲倦。故當夏季將至。人多往近海之地。否則必發生疾病。生等今亦到心麻舌處居住六星期。當暑假將完。然後返牛津也。(1)

由此信中可看出，父親早已立下他畢生獻身中國救國救民的志願。

一九一三年時父親進入牛津班堡克(Pembroke)書院攻讀土木工程，同學都稱他Dickie Lee。歐百恩(Percy O'Brien)比父親晚一年進班堡克書院讀化學，他記得父親在校時十分精明，面帶笑容非常開朗，總是疾步快走極為守時，而且衣著整齊，常在背心口袋掛懷錶。父親是個勤學用功的學生，經常在Radcliffe理工圖書館研究功課，歐百恩記得好幾次父親演算一些工程方面的數學給他看，他看後一頭霧水不明所以(2)。

雖然那時他對英國已漸習慣，但大學生活卻是非常不同。牛津學生的風紀均以一六三六年所訂de Moribus Conformandis之現代版本為規範。其中規定：逾時返校之學生將課小額罰金；學生可購買香菸（一六三六年時禁止購菸），但身穿校服則不許吸菸；又直到近年廢除學生不可有汽車之條例後，父親方可有車代步；並禁止在下午一點前及晚間十點後打桌球；學生不可在戲院後台入口處徘徊遊蕩；不得涉及賽馬或參加射擊及其他運動；對社交舞會餐飲均有嚴格規定；男學生不得進入女同學生之房間，但女學生經院長特別許可，有女伴陪同之下可進入男同學房間(3)。



班堡克書院有些沿習已久，但現在已不存在的校規，一是規定學生每天必須早上八點去學校的禮拜堂，否則即罰款二先令六便士。另一規定是學生不得在學校走廊談論私事，違規學生須一口氣由大啤酒量杯中喝下一品脫或更多的啤酒<sup>(5)</sup>。

父親在大學住宿時，在校園舊四方院擁有一般學生認為是特權的私人房間，他的房間在一樓，有臥房、小儲藏室及寬敞而附有壁爐的客廳、飯廳兼書房。冬日學生須舉步維艱地走過泥濘冰雪，才能去到位於舊四方院後方的公共房間。那時校方認為學生都應強健，所以沒有駐校醫生或護士。晚上九點舊鐘樓的鐘聲一響，就關閉宿舍大門，對遲到學生會科以罰金，但是學生還是有各種辦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爬回宿舍<sup>(6)</sup>。

住校時期非要有「校工」照顧寄宿學生不可，每位校工負責「一段樓梯」，就是照顧樓梯兩旁房間的學生。在某些方面來說，校工的工作像僕人，但很多地方他又像學生的「妻子和父母」，他照顧學生的生活起居，病痛時護理他們，又提供意見代為解決難題，酒醉時服侍他們上床等工作。父親非常幸運有位很好的校工叫Fred照顧他，他會幫父親點燃壁爐、整理房間床鋪、清洗衣物及預備早餐和午餐，並在父親請客時打點一切<sup>(8)</sup>。

父親在班堡克書院讀書時院長是Holmes Dudden博士，他博學多才富管理校務經驗，也是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二〇年代班堡克書院餐廳以佳餚美酒著名，所以能被邀在書院用餐，是非常令校外人士人嚮往的<sup>(9)</sup>。

## 友誼

大學期間父親結識了一些後來成為莫逆之交的終生好友，其中多位回國後地位顯赫。據我所知的有：歐百恩後來是班堡克書院的導師及院士，一九七四年退休之前擔任牛津醫學院的臨床生化研究部主任。

還有一位是錢昌照，他成為國民政府委員長蔣介石手下的要員，父親與他畢生為謀求國人福祉努力不懈，日後二人分別在香港及中國各盡心力。錢昌照在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後，轉而投效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中國內戰（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及文化大革命時，政府對人民實施種種限制而令他們友誼中斷，直到六〇年代初，二人才恢復聯絡。

另一位同學是劉佳，他是蔣介石在五〇年代派駐聯合國的代表。還有一位日本朋友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小池厚之助，後來成為日本山一證券公司的主席，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們曾失去聯絡，到一九六〇年代才再有交往。

父親年輕時在英國所交朋友中，只有利安不是牛津的同學。利叔幼時被我們鄉下祖居嘉寮村的一個利姓無子人家收養，受盡欺凌，在十多歲時便將自己賣身至北美做苦力，契約期滿後便跳上一艘遠洋貨輪偷渡離美，事前全不知船將開往何處，糊里糊塗的竟到了法國，一句法文也不懂的利叔，又再踏上另一艘開往說英語的國家，便偷渡到了英國倫敦，恰與父親及三叔同一時期在英國。利叔頗有生意頭腦，不久便在倫敦開了一間很小的中國餐館，顧客多為中國留學生。

父親與他的年輕朋友在倫敦時常去利安的餐館捧場。父親常對我說利叔有一次不知用什麼配料做豆腐，害得客人腹瀉！儘管如此後來他們也成了好友。我相信父親對利叔的勤奮創業精神十分欽佩，日後利叔在倫敦飲食業中非常成功，並擁有多匹賽馬。他的餐館經常有著名的電影明星光顧，利叔與他們皆成了朋友，也許因為他身高膚黑，又有高顴骨、單鳳眼典型的中國面孔，後來他還在好萊塢電影中扮演過小角色。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初，他來香港住在我們家的時候，那時他已開始酗酒，我記得父親曾對他說：「香港習慣日落之前不能喝酒！」

所有牛津學生均須在學校寄宿，在大堂與校長、教師一起用晚飯。學生有選擇聽課與否的自由，但卻「硬性規定」務必出席晚餐，參加晚餐次數不足者會失去期終考試資格。每張餐桌可坐十至十二位同年級同學，大家同檯共餐，雖然讀的科系不盡相同，但後來都成了好朋友。

小池厚之助在一九二三年時入牛津班堡克書院，與父親同年入學又同坐一桌用膳，後來便成了莫逆之交，經常一起運動。英國學生冬日多打橄欖球，父親同小池厚之助則去體育室打拳（<sup>10</sup>），班堡克

書院也有許多學生喜歡打拳。雖然父親鼻樑曾被打斷，但年輕時拳擊一直是他喜歡的運動。

父親是個具有崇高理想的領導人物，在一九二五年時，他成為中國歐洲留學生總會會長，那時他已立定終生將盡其心力為民服務的大志。多年來父親一直珍藏著每份留學生總會聚餐的菜單，這些菜單上，有他們當年聚餐時草擬的新中國未來大計。

## 祖父的企業

父親與弟妹留英期間，祖父事業不斷成長，不僅是香港首富之一，社會地位亦漸提高。他的主要事業是發展地產為中產階級提供大批住屋，更企業化的投資於中華糖房、香港電燈公司、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牛奶公司，並成為對南中國及香港供電的中華電力公司之顧問及主要股東。很不幸的，由一九二四年開始，祖父在葡屬澳門享有鴉片獨家專賣權的裕成公司也有投資，因而種下禍根。

第一次大戰期間父親仍在英國，祖父在堅尼地道山坡購入大幅土地，預備自建住宅。但因戰爭及勞工問題，一直拖至一九二〇年才開始動工，由Palmer and Turner公司設計營造，此建築公司亦負責建造國內位於上海外灘的匯豐銀行總部大樓，所以這幢我們稱之為「大屋」的外表與匯豐銀行總行頗為相似，是當時香港極為雄偉的住宅，父親在一九二七年回港後才見到此屋。

大屋有香港內港最佳的景觀，高牆內有美麗的花園、噴泉、寶塔、假山岩洞、竹林、及雞舍菜畦。大門由印度錫克族警衛佩槍看守，因錫克族人相貌兇狠，當時香港多僱用他們做警衛，家中的錫克警衛及其家人，均住在花園觀音池旁的房舍。

大屋共有三層，二、三樓為家人起居使用，各有大陽台及廚房。用餐時男人在二樓，婦孺則在三樓。一樓有寬大的宴客廳、書房、竹房、幾個小客廳及屋後的大廚房，由前廳走到花園陽台可瀏覽香港海港全景。大屋四處陳設來自世界各國的藝術品。

氣派雄偉的大屋，亦是所有嘉寮村鄉下親戚朋友來訪的臨時住所，一樓大廳後方有多間客房，隨時歡迎他們住宿用飯。一如大家長的祖父對所有遠近親戚均妥善照顧，極為慷慨大方。終其一生，祖父都使得他的兄弟姐妹經濟無虞，並讓所有姪甥均能受良好的教育，或獲得工作機會。祖父逝世後，他的兒子都繼承了這個傳統家風。

大屋完工之後四周仍有大片空地，祖父便決定在另一端較高的山坡，再建一幢外表與大屋相似三層公寓式大廈，稱為利行，利行中堂有開闊的樓梯，每個單位都有獨立的大陽台。祖父在世時利行全部出租，我想當時祖父已有遠見，他的子孫將來會住進利行，我們一家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一直住在大屋及利行。

英國港務專家在一九二〇年來港勘查海港及土地發展時指出，西環發展已達飽和，將來新發展勢必向東轉移至九龍灣，祖父便計劃在該區購地發展房地產。香港島地多山陵，建屋十分困難，須先夷平山坡以山泥填平土地，方能大量造屋。一九二四年一月祖父由渣甸(John William Buchanan Jardine)手中，以港幣3,850,960.35之價格購得銅鑼灣土地，成為他一生中最引人注目注目的交易。此幅銅鑼灣土地原為各渣甸大班的住宅、辦公室及貨倉所在，其中有頭號及二號大班的宅院，中間以一馬房相連。購地時祖父與香港政府協定，利用銅鑼灣土地山泥作為北角填海發展，但計劃因政府毀約而告擱置。祖父便以營利生意眼光將此山地闢為華人之遊樂場，稱為利園山，更將大班之住宅改為酒樓。由於當時政府極少興建華人遊樂場所，所以利園成為週年開放的娛樂場地後，業務非常興旺。

祖父預先在一九二五年為家族設立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將銅鑼灣土地及其他若干產業歸屬公司名下。祖父後來繼續發展利園山下原屬貧民區的土地，將街道拓寬，改建堅固的屋宇。

祖父非常富有企業家的精神，對開創新事業極為熱衷。他愛看大戲，覺得當時有必要興建一所較易轉換場景的劇院，便計劃建造一所有旋轉舞台的中國劇院，演員不必離開舞台即可變換場景。於



是在一九二六年建成利舞台，高高聳立於波斯富街上，劇院的華麗拱形圓頂繪有金龍圖形，並掛滿燈飾。當年港人最普遍的娛樂即為看粵劇，所以利舞台不但在票房上極為成功，亦造就了幾位出名的藝人，日後又為放映電影添置了大銀幕。

# 第二章

## 香港結婚到中國工作

父親一九二七年自牛津畢業，離家十年後在二十二歲時，終於回到思念已久的香港，並計劃假期結束後再赴英國做實習工程師。祖父非常高興見到長子回家，一心希望在他赴英之前完成婚姻大事。消息傳出後，媒人便帶了許多女孩給祖母過目。

父親回到香港後，發現香港已非他記憶中的社會。他在英國時受到同等的待遇，回到這片殖民地，卻處處脫不開英國人在亞洲的民族優越感，島上幾乎各方面都有種族隔離現象。香港的醫院及殖民政府，至二次世界大戰時仍嚴格採取種族隔離政策。例如一九四〇年香港山頂的明德醫院曾拒收一名美國女子就醫，只因她丈夫是中國人。政府機構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取消只准歐人參加僱員應試之規定，到最近一九九二年時香港政府高級職位皆為英人擔任。當年匯豐銀行明文規定不得有華人擔任董事，許多英國公司皆不許員工與非英籍女子成婚。

父親在英國求學時是個勤勉用功的學生，受到英國自由博雅的教育影響，思想上認為人人平等，所以當他回到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時，決不能接受二等公民的待遇。父親留英期間經常騎馬，返港後亦想加入香港馬會，豈知卻因身為華人被拒，祖父知悉後馬上說：「不需要他們，我們自己來搞一個華人馬會。」香港馬會聽到風聲後，便又立刻准許父親在俱樂部騎馬，因為馬會知道如此一來，必將失去其所倚靠華人投注賭馬所帶來的豐厚入息。

一位在上海及香港皆非常成功的商人嘉道理(Ely Kadoorie)，將當時的國際大都會上海與英化的香港兩個城市相比較，形容香港殖民地式的勢利眼是一種「小家氣的心態」，但至少中國人在商場上倒沒有因種族差異而被拒門外。祖父在事業上的成就，令當時回港度假的父親，十分明瞭香港是個創業的好地方，但以父親深信人人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個性，香港決非他喜歡居住的地方。

## 父母親初會

父親年輕時十分好客，總是朋友成群。由英返港那年夏天，一日父親與友人在海邊時，有兩位女孩打完網球回家途中路過，父親立刻為其中一位少女所吸引，便要求他所相識的少女之一黃瑤珍介紹認識。瑤珍卻說：「別煩她，她是我的妹妹！」但在父親堅持下，終於結識了母親，當日午後兩人便一起相處。

母親與父親開始這段旋風式戀愛時年方十七，仍在拔萃女書院就讀，她根本不急於結婚，只想先完成學業。祖父母知悉兒子已有心儀對象時非常欣慰，更急切的要促成這門親事，在父親向母親求婚之際，祖父母也同時拜訪外祖父母，徵求他們的同意。但問題不在外祖父母，而是母親表示自己年紀還小，應該繼續學業，不想太早結婚。於是祖父便提出一個好辦法，就是婚後父親赴英完成工程師實習訓練時，母親亦可隨同赴英國牛津大學讀葡萄牙文，將來可對家族事業有所助益，並答應次年陪同她父母環遊世界赴英國探訪他們，總算這樣才打動母親同意嫁給父親。

由於一切發生得太快，父母親在婚前都不及認識對方，他們在婚後相處多年後，才逐漸培養出維繫一世婚姻的互信、互重和互相體諒的情感。

母親本姓黃，生於一個現代先進的家庭。外祖父當時是香港社會的中堅份子，與何東爵士及周壽臣爵士等知名人士都是好友。黃家住香港太子道時的生活非常優裕，母親與她的兄弟姐妹在成長的過程中，家中不祇有許多的僕人及園丁，還有四部汽車供孩子使用。

母親對外祖父在一九一二年時已擁有全港第一輛進口汽車，感到非常自豪，但當時華人形容汽車

是「嘩嘆鬼叫又咳個不停的怪物」。外祖父黃茂霖公與外祖母麥玉珍共育有子女十一人，八女三子，母親排行第五。當年母親與兄弟姐妹生活十分優閒，經常開車四處游泳、打網球及跳舞。母親有一次也許是在去買她最愛吃的朱古力途中，因超速被警察攔截。她也受過飛行駕駛訓練，但從未取得駕駛執照。

母親對她自己的家庭非常熱愛並感光榮。曾外祖父黃有傳年輕時便遠赴西印度群島工作，三十多歲略有儲蓄後，便返回中國，曾外祖父因能說英文，便在香港政府擔任法庭傳譯員。後來便自己挑選與一位德國修女院的華人女子成親，她的父親和兄弟都是教會的牧師。曾外祖母不僅能說流利的中、英文，並能說德文，但只穿歐式服裝，在當時華人女子中是非常少見的。他們二人婚前未曾見面，曾外祖母後來常告訴她的兒孫，她在新婚之日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她這富裕丈夫竟會有對那麼粗糙的手。

曾外祖父在法庭擔任傳譯員薪俸不錯，所以黃家生活十分優越，住在九龍界限街附近的大宅院〔後來土地被政府收回之後，便搬到現時的太子道〕。

母親時常提起童年時代，與她祖父母相處的種種趣事，兒孫輩最喜歡曾外祖母，她也喜歡孩子，常教兒孫唱德文歌，她信仰虔誠，並用獎金鼓勵兒孫唱聖詩。曾外祖母對慈善公益非常熱心，甚至坐著輪椅都要出份心力。曾外祖母後來因疲於不停生育，便為曾外祖父納妾，兒孫都覺得她思想很開通。其實她為曾外祖父納妾的真正原因，是要有人留在中國鄉下照顧她的公公和婆婆。因為曾外祖父是獨子，有了妾室之後，曾外祖母才可擺脫這份自己不願意做的差事。他們共有十六個子女，其中十一個是她所生。

當曾外祖父衣錦還鄉回到廣東省東莞縣時，在祖居河伯橋造了一棟附有炮樓的房子。黃家是客家人，非東莞本地人，所以住的地區比本地人較為貧瘠，經常為灌溉農田水源與鄰人發生爭執。

黃家除了稻田和荔枝園之外，還有花生油廠，曾外祖父或兒子每次由香港回鄉下視查業務時，大家都先在火車站集合，然後在武裝團隊的保護下才一起回去。由於國內法治不修，農村各組武備，地主僱請武裝保護毫不為奇，尤以在外地主為然。

傳統上客家和本地人互不通婚，父親是本地人，常取笑母親同鄉大腳客家女人。中國舊日審美觀念認為女人大腳極為不雅，事實上，客家婦女從不纏腳，因為她們平日須要在田野做活，加上發生糾紛需要幫忙時，有對大腳才跑得快。

曾外祖父在祖居大門口懸有一張「百鳥歸巢」的巨畫，希望有朝一日他的子孫都能落葉歸根回到祖居。但只有妾室所生長子，排行第八的兒子長住鄉下照顧田園和生意，其他子女都寧願留在香港。有幾年國內政治局勢不穩，香港的黃家人甚至無法回去探親。唯有在二次大戰日本佔領香港時，香港糧食缺乏，黃家才回到有自家稻田不愁糧食匱乏的祖居避難。

曾外祖父在香港德高望重，逝世時有很多人前來太子道住宅致唁，有人甚至由大門口一路叩頭至靈前。曾外祖父喪禮備極哀榮，他的棺木置於馬車中，由四匹白馬拖載，當日香港花店的鮮花，都因他的喪禮而被訂購一空。<sup>[1]</sup>

外祖父黃茂霖公排行第二，是香港頗俱聲望的特許會計師，並擔任首屆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主席。第一次大戰時外祖父曾任後備警察，當時因許多英人回國參戰，所以祖父因得填補空缺。瑤芬和瑤芝阿姨都記得她們的父親穿白色警察制服英姿挺拔的模樣。

每當法庭人手不夠時，外祖父便充任傳譯員，他一九二三年被委為太平紳士，又榮獲英王喬治六世及國父孫中山先生授予勳章。當第一任妻子病逝後，因未有生育，便再娶外號為「靚妹」的歐亞混血女子麥玉珍即外祖母為妻。曾外祖母常鼓勵兒子娶歐亞混血女子，這樣她才會有漂亮的孫輩，結果她真有不少俊美的兒孫。

外祖母是約翰·麥克斯維爾(John Maxwell)和一中國女子所生的四個子女中的獨女，我們從不知她的姓名，因為自小母親及她兄弟姐妹均對我們稱她為外婆。麥克斯維爾在十九世紀時由蘇格蘭到香港，來香港之後就在當地成家立室。保良局是香港富紳在一八七八年專為收容無家可歸的婦孺而設的慈善機構，麥克斯維爾曾外祖父便在此機構選得一華人女子為妻，也唯有如此他才能在香港成家，因為當時極少有門當戶對的歐籍適齡女子，而正當華人家庭又不會將女兒嫁給洋人。麥克斯維爾曾外祖父一直在香港警隊服務，是個好父親。



當年歐亞混血兒在香港既不屬於中國社會也不屬於歐人社會，所以他們要非常努力的做到非此即彼。外祖母比中國人更中國化，她能說、讀英文，但中文只能看。她又熟知中國民情風俗，是黃氏家人經常請教的對象。印象中我仍記得她身穿旗袍頭梳髮髻，一片慈祥端莊的模樣。

## 婚禮

一 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父母親在香港聖約翰大教堂舉行婚禮。少女時的母親常希望她結婚時的潮流是長婚紗禮服，而不是短禮服，結果為了時尚，她還是穿了銀紗鑲珠的短禮服，手捧白玫瑰花球。母親是個美女，比一般中國女子身材修長高窕，骨骼較大。結婚之日她只能穿低跟鞋，以免看來高過父親，事實上，她婚後仍繼續長高，後來真的比父親高些。母親皮膚白晰，不像父親膚色黝黑。她深褐色的髮上披著當時非常流行的頭紗，飾花低至眼眉。母親的婚禮非常隆重，她的姐妹及堂、表姐妹均穿著不同顏色綴滿小花的禮服，正如曾外祖母所願，這群美麗的少女都是她的孫輩。

結婚當日教堂內外中西賓客雲集，有些賀客因人太多無法進入教堂，只好站在外面。婚禮由香港主教A. Swann打破傳統，首次為華人證婚。當時香港的社會華、洋分隔，唯有在這樣的場合大家才能相處在一起。

因利園內大班舊宅所改的酒樓不夠容納兩千賓客，故慶祝酒會須在利園內臨時搭造的竹棚舉行，酒席菜餚由祖父喜歡光顧的香港酒店燴製，又特別另搭一檯架放置六層的結婚大蛋糕。酒會中何東爵士代表賓客向新人敬酒，並由何東爵士、羅旭和博士分別致賀辭及父親致答辭。

婚禮後父母親即乘郵輪經蘇伊士運河赴歐洲渡蜜月，在埃及時一如一般遊客，亦騎駱駝及在獅身人面像前留影。到達歐洲第一站瑞士時，母親首次見到正在當地求學的三叔，到英國後再和寄宿女校就讀的二姑姐舜華及三姑姐舜英見面。

## 祖父遇害

### 父

親返港探親時，適逢祖父為股東之一的裕成公司因鴉片牌照問題與澳門政府涉及官司訴訟。利氏家族擁有三分之一股份的裕成公司，自一九二四年即享有鴉片專賣權，祖父為公司總經理。一九二七年三月間葡萄牙政府在政府公報宣佈；任何有關鴉片進口、加工及買賣的專利合約均告終止，故政府與裕成公司之間的合約將全部無效，改為政府專賣，由消費稅督察監管，並另設鴉片管理委員會，由羅保(Pedro Jose Lobo)出任行政管理官員。裕成公司總投資額為三百萬元，一九二七年時投資人已收回四分之一成本，並有心理準備與澳門政府訴訟後，他們其餘的投資本金可能化為烏有。

但後來祖父發現澳門政府將收回的鴉片專賣牌照，反以十二萬元的代價，轉讓給另一家名為又成的公司。又成公司在香港有利銀行開戶後，銀行買辦即知悉又成公司已獲澳門鴉片專賣權，公司並公開招股吸資，祖父一友人被招攬入股時曾向祖父徵詢意見。

祖父認為澳門政府既已終止裕成公司的所有合約在先，便不應由政府再發牌照給任何其他公司。因此祖父向澳門總督呈遞陳情書，請求政府對裕成公司給予公平待遇，及對此事件詳加調查。祖父亦將陳情書送交香港駐澳門總領事、立法委員及十六位律師，陳情書中有行政官員羅保名字在內。

一九二八年春天祖父正為我父母準備婚禮時，羅保向法院對祖父提出誹謗控告，並請求法庭禁止祖父繼續寄發對澳門總督之請願書。在官司纏訟期間，祖父曾收到威脅生命的恐嚇信，更聲稱將在父親婚禮中投擲炸彈，眾親友皆勸祖父應要加倍小心及改變日常生活作息習慣，但祖父對這類威脅全置之不理，結果父母親婚禮順利舉行即赴歐洲後，恐嚇一事也漸被淡忘。四月十七日香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Collan宣判祖父得直，祖父認為此事應已告一段落。

四月三十日下午一時，祖父如常前往位於威靈頓街的裕記會所用餐，在廊外遇刺中槍，叫了幾聲救命，會所會員聽到槍聲和求救聲後，一名叫羅流的伙計首先衝到台階，見祖父身受重傷靠著牆

壁，面色極為蒼白，因羅流瞥見一名穿短衫白褲的男子，正由會所奔向暗巷，他為追趕這名男子，所以無暇照料祖父。其他會員趕到現場時，祖父已氣絕身亡，享年四十七歲。

案發後雖然家族懸賞一萬元，及警方掌握若干線索，但一直未能緝獲真兇。祖父的遽逝令全家陷於極度驚恐，他遺下一妻、三妾、七子、六女及排行第八的遺腹女。

惡耗傳到英國後，父母親及父親的弟妹立刻全體準備返港奔喪，由於港、英之間經由蘇伊士運河航海行程費時甚久，他們無法趕上祖父的佛教喪禮。五月二十五日，祖父下葬於風景優美、可遠眺海灣的香港仔永遠墳場。

事後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建議為祖父建水陸法會，便特別在利園搭建竹棚，延聘眾僧誦經七日起度祖父<sup>(1)</sup>。

## 一家之主

**年** 僅二十三歲的父親，頓時成了一家之主，而十八歲的母親已不再求學，開始與父親共同挑起這個重任。由於祖母不識字，所以照顧這一大家庭生活的責任就全落在父親肩上。父親為了籌措足夠資金以支付祖父的遺產稅，須拋售許多祖父的股票套換現金。他永遠不會忘記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曾經求助多位當年祖父所謂的「老朋友」時所受的委屈，多次甚至被拒門外。唯獨在父親非常難堪的向匯豐銀行會計主任 Arthur Morse 借貸時，他對父親的體諒與熱心支持，令父親永誌在心，二人日後成了終生好友。

祖父許多物業都有抵押，其中最大宗為由渣甸集團手中購下的銅鑼灣土地〔今利園〕，若我們無法繼續分期償還抵押，即可能失去物業產權，於是父親便向匯豐銀行安排貸款，清還抵押。

當年有許多人慫恿祖母出售產業，幸好在父親鼓勵下，祖母堅不變賣任何產業。由此時開始為應付每月靠收租償還抵押，家人經歷了幾年手頭非常拮据的日子。



父親將祖父遺產稅清理完畢後，即開始留在香港，替柯倫治建築工程行工作，以完成他的實習工程師的在職訓練。其中一項工程是九龍黃埔船塢的第一號船塢加長工程<sup>註</sup>，現在這個地方成了一個船形建築的購物中心。

父母親此時與祖母及其他家人同住大屋，家中月入償還抵押及貸款後所剩無幾，而父親又正在受訓階段毫無收入，所以祖母控制家用非常謹慎。年方十八的母親剛嫁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傳統大家庭，父親又無法經濟獨立，她頓時失去財務及精神上的自由，開始日漸消瘦及精神沮喪，於是外祖母決定要母親換個環境，便帶她去廬山靜養。

廬山位於江西省九江縣的鄱陽湖附近，空氣清新、風景優美，是休閒或養病的清靜地方。直到現在許多外國人及富有華人在山邊皆築有別墅，後來蔣介石、毛澤東在此亦有避暑山莊，母親稱它為中國的瑞士。

母親告訴我她剛到廬山時非常瘦弱，那時要上廬山只能步行或坐轎子，轎夫們都爭先恐後的要抬她上山，但等到她與外祖母下山時，卻胖得沒有轎夫願意抬她。母親從不說她在山上住了多久，她靜養期間吃得好、睡得好，直到父親上山接她回家。

## 廣州工作

**父** 親於一九三一年在柯倫治建築工程行受訓完畢後，成為檢定工程師，並想以此為專業。當時利家各項業務都有職員照顧，父親覺得只要他在附近即可隨時聯絡，不須一定長期留守香港。

三〇年代時國內亟需各方協助建立新國家，正如許多其他愛國青年一樣，父親對未來充滿熱情與希望，便決定赴中國奉獻己力。

因父親是廣東人，很自然的便前往廣州工作，他在劉紀文任廣州市市長期間於廣州工作數年，曾任廣州市政府主任秘書、總工程師、自來水局委員及審計部稽核等職位。

父親於廣州工作時，母親曾獨留香港住大屋三樓一段時期。那時利家的孩子有：六叔榮康、七叔榮達、七姑姐舜儀、八姑姐舜娥及堂兄漢釗，漢釗哥為銘洽二叔之子，亦是家族第一個孫子。他常記起當年家中因現金短絀加上祖母又特別儉省，幾個孩子整日感到飢腸轆轆。父親經濟獨立後，母親手頭較寬，他們最記得母親常在星期天焙製蛋糕，招待大家喝下午茶吃點心，這位時髦摩登的大嫂頗受父親弟妹的敬愛。幾位父親的妹妹因祖父早逝而無法赴英國求學，便要求母親為她們取了英文名字，分別是：四姑姐為Joyce，五姑姐為Dione，及六姑姐為Amy。

父親在廣州市政府工作日漸穩定後，母親也搬至廣州與父親團聚，住在廣州市郊東山一個很好的住宅區，與劉紀文市長全家成了好朋友。他們參加許多官場的應酬，官太太都希望母親能多與她們交往。有一天幾位官太太相約一起去看相，相士直言她們運道都不好，唯獨母親命相最佳。幾位太太聽後都不甚高興，令母親非常尷尬，因為她的丈夫在廣州市政府的職位最低。然而在那時又有誰能料到中國政局會有如此大的變化，這些國民黨官員在共產黨當政之後都成了難民。

父母親住在廣州期間，周末便乘火車返香港大屋探望祖母及其他家人，那時已有許多利氏成員住進山坡上大屋旁邊的利氏大廈即利行，父母親周末返港時則仍住大屋。

祖母是家中唯一有汽車的人，星期六中午放學後我們家的孩子都來大屋吃中飯，飯後等父親、三叔（剛由牛津畢業返港）或是二姑姐開車帶大家去南灣別墅玩。孩子都非常期盼這個周末郊遊，他們可在別墅附近游泳、野餐，漢釗哥那時才開始學游泳，多半在海灘玩，他記得游完泳後，父親常會去牛奶公司的攤位買雪糕請大家吃<sup>(6)</sup>。

那幾年父母親在每周往返香港與廣州火車途中，交了幾位朋友，常在車上打橋牌。

父親當時與廣州市工務局局長袁夢鴻工作相當密切，他的姪子袁耀鴻是木工出身，常嘲諷父親是留洋學生只知書本理論，對建築毫無實際概念。但後來二人也成了好友，我們都稱他袁叔。

袁叔於三〇年代中來到香港，加入利氏家族的民樂公司做總經理，利舞台即為民樂公司的附屬機構。成立民樂公司的原因是祖父的一位弟弟常去利舞台戲院銀櫃索錢花用，員工無法阻攔。因他是長輩，父親與叔叔等雖身為戲院老板，但礙於輩份難以阻止，有了民樂公司後員工便可直言戲院已

屬其他公司，櫃檯銀錢不可隨便動用。日後他若需要零錢便須直接去利希慎置業公司，或利東即我們的租務辦事處索取。

父母親生活較為穩定之後，便在離廣州不遠的從化溫泉區買了一幅地，父親在風景優美的山邊設計了一幢紅牆綠瓦的中式小屋，四周遍植各類果樹，並將溫泉引進屋頂水塔以供使用。廚房設於屋外，全屋除主臥室外，無其他房間，為開放式的空間，親友來訪時皆睡地上的榻榻米。

他們與親友在這裡度過許多快樂的時光，常去附近的小湖游水，湖下方是瀑布，有一次瑤芝阿姨游水時太近瀑布差點被淹死。從化溫泉水質以可醫治皮膚病聞名，瑤蓮阿姨有皮膚病的兒子也來洗過溫泉浴。

後來劉紀文市長及其他許多廣州政要，皆仿效父親在此建築鄉村度假屋，日後國內許多黨國領導人在從化亦都有別墅，這個地方便成了富人的度假區。

第二次大戰後因國內政局不穩，父母親不再住從化後，便請了一位管工住在此屋照顧庭園。一九四〇年代末時他來香港對父親報告屋況時，我見過他，當時父親還特別詢問果樹成長的情形。

一九八〇年底，母親帶著我與衛權及友人李太太返從化時，我才有機會看到這幢房子。只見往日庭園雜草叢生，不見果樹，屋宇年久失修，十分殘破，原本的紅牆綠瓦全部改為白色，鄰近又蓋了一間甚為醜陋的房屋，以前的停車場也為一公眾食堂所佔用，令母親非常傷心。

## 海南島墾荒

父親在一九三四年辭去廣州市政府工作，計劃去海南島做些與眾不同的事。海南島位於南中國海及東京灣之間，面積與台灣不相上下。除西沙群島有中國、台灣和越南分別駐軍外，海南島是中國最南的疆土。

我從來沒有想到問父親，是什麼原因使一個牛津畢業生，帶著年輕的妻子到海南島這樣落後的地方？我想部份原因是他好奇，又富冒險精神，畢竟父親一生對新鮮事物一向有追根究底的個性。但

我認為主要原因是父親想由較為僻遠落後的地區開始幫助中國，父親相信盡他自己一份棉力，一樣能造福有數千百萬人口的中國。

海南地區在三〇年代時，財政部長宋子文曾赴當地視察，並認為有開發價值，中國企業界及教育界人士才開始重視這個有「中國糧庫」之稱的熱帶天堂。島上稻米農作一年可收成三次，四季鮮花不斷、盛產水果，樹木林立，亦稱為「中國天堂」。有位古印度詩人形容海南島是「棕櫚島」，因為有六種不同的棕櫚樹在島上繁茂生長，為島民帶來可觀的收入。海南島是個熱帶氣候型的海島，白天烈日當空，島民出門非要打傘或戴帽不可，整年潮濕，夏天溫度可高達華氏九十八度，冬天則在華氏四十五度左右，但島中部的黎母嶺山區則氣溫較低。

中國在秦始皇時代（公元前二四五年至公元前二一〇年）即開始知道海南島，島上最初居民全為原住民黎人。西漢時期（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十四年）大約有二萬三千人首次自中國移居至此，東漢時期（公元二十五年至公元二一九年）海南島被收入版圖，土著被迫遷至島中央，元朝時因此島在「大海之南」，故命名為海南島。

一九二一年正式將海南島劃為廣東省的一部份，一九二〇年代後期島上約有二百萬中國移民，大多定居於北部沿海一帶，與大陸保持密切聯繫。位於海南島最北端的主要城市海口，不僅是島上行政首長的官邸，亦是駐防司令總部所在<sup>(5)</sup>。

海南島亦稱瓊崖，中國政府在一九二〇年代初開始在海南島建築公路幫助開發。在人口較多的地方，除了有商店、餐廳、旅館及銀行之外，還有些中國人投資的橡膠園和甘蔗田，但部份公司後來因為盜匪猖獗而被棄置<sup>(6)</sup>。在三〇年代時全島被劃分為十三個縣，其中兩個縣全為華人居住，黎人與華人雖然住在同一地方，但屬完全不同的社區<sup>(7)</sup>。

島上最原始的居民即為黎人，他們的體形和文化與住在泰國、緬甸、中國雲南省及印度支那半島的泰族人頗為相似。黎人外形粗壯，中等身材，膚色褐黃，頭髮黑直，眼睛深褐，臉孔輪廓亦異於一般華人「數百年來，中國學者稱黎人為不知文化的南方紋身蠻人」。黎人稱紋身刺花為「灘灘」〔音譯〕，僅有婦女紋身，以不同花紋令後裔容易辨認。雖然黎人有他們自己的服裝，但在炎夏時，



成年男人只穿丁字褲和戴頭巾，在三〇年代黎人皆靠狩獵耕種為生。

由於父親想盡份心力，幫助中國開發這個荒蕪之地的農業及貿易，就帶著母親來到海南島做墾牧先鋒，有意養牛將牛隻推銷至歐洲，此地氣候和地形對畜牧業非常適合<sup>(1)</sup>。父親在海南島購買的土地，根據地契所述，面積之大是「極目所及」。然後父親便由歐洲進口最好的牛隻來海南島繁殖。

父親冒險性強，他在海南島時，曾橫跨越過黎人居住的黎母嶺山脈。當地中國政府事前警告父親切勿輕易入山，以免感染瘧疾及其他疾病。常有人說十人進山只有一人能活著出山，但父親對現代科學極有信心，認為只要他隨身帶有奎寧和其他藥物，他即可平安無事，結果倒也如此。

父親和陳顯彰及其他股東，在一九三六年買下由許亮承和李實熙創設的寶成公司，開始務農種黃麻和甘蔗。寶成公司於一九二八年創立，擁有五千畝地，專種高價值的黃麻，當時每噸黃麻成本只有七英鎊，運到倫敦後的售價可高達三十英鎊，是利潤極高的生意。但因地方盜匪為禍，公司被迫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間結束營業<sup>(2)</sup>。

父親買下寶成公司後，將公司改稱為利興種植公司，位於海南島北部海口以西的臨高縣內，共有一萬五千餘畝地，種植黃麻和甘蔗。一九三七年一月時又增添土地至兩萬畝，公司並備有壓麻機、貨倉機器房、四十五匹馬力的發動機、電油庫、車庫、辦事樓和員工宿舍等設備<sup>(3)</sup>。

父母親帶著銘洽二叔及另一年輕人梁光榮來到瓊崖，光榮由此時開始為利家工作，後來是大屋園丁之一，一直做到退休。父親同時也僱用了許多黎人幫助開發土地及看顧牛群。

黎母嶺深山黎人部落所在的溪流中產金，他們常用撿到的小金塊做裝飾，或與外人交換物品。父親告訴我他曾用玻璃珠、鏡子及肥皂與黎人交換金塊，這些黎人在鏡中看到自己的身影覺得非常奇妙，也喜歡在河中玩弄肥皂泡沫。況且對黎人來說五彩繽紛的玻璃珠確實比金塊好看得多。

父親亦曾購置槍枝武器用來狩獵或自衛，但嚴禁黎人使用。有一天，父親發現二叔用槍枝與黎人交換物品時非常不悅。

父親說過海南島水域屬偏遠地區，常有不尋常的海洋生物游入港灣。有一天父母親正在海邊，見到漁船拖回一條長約十呎的暖洋鱸魚，令村民非常驚訝，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麼大的鱸魚，結果全

村居民與父母親和隨員，一起慶祝享用了這條大魚。我們都覺得這是個不可思議的故事。

父親在島上時常去打野豬，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野豬受傷後會攻擊狩獵者。母親有時也會騎著小馬跟著去打獵，她騎術不佳，當小馬被槍聲所驚跳起時，都會令她害怕，但又不得不用這唯一的山區交通工具。

父母親在島上過了一段拓荒者的生活，他們打獵並自己種食物。島上無電力供應，父親便自己設置風力發電機發電<sup>(2)</sup>。他們在這裡也交了些朋友，多數是島上其他墾荒的人士及傳教士還有幾位部落族長。他們進城住入小旅館時，常與朋友會面，有時也帶來訪遊客到島上各地遊覽。父母親都非常喜歡住在這裡，那時父親被熱帶陽光曬得像黎人一樣黑，父親提到瓊崖時總是充滿懷念，那是一段他最珍貴而又無法再擁有的日子。父親由海南島帶回來最好的紀念品，是他自己特別設計製做專吃芒果用的刀叉，到今天我仍使用這些珍藏。

此時在海南島以外的地方卻發生了大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軍隊在北京附近的蘆溝橋衝突，引發了不宣而戰的中日戰爭，父親明白該是回中國做事的時候了。母親日後告訴我：「就算中國不打仗，到一九三九年歐洲也爆發戰爭，根本不可能有船可運牛隻或農產品到歐洲去。」

## 返回香港

一 一九三七年底，父母親返回香港。父親返港後又繼續在中、港之間奔波，這次是為國民黨政府效力。母親則一直覺得身體不適，經醫生診斷後，才知道她結婚十年首次有喜，一九三八年我大哥志珮出世。

父親當時以為返港只是暫時性的，計劃戰後再返回海南島繼續他的農牧事業。行前他將牧場業務托人代管，卻未料到從此不能再回海南島，後來農場所有土地都被中國政府接收。記得母親提過她將海南島的地契，妥善保存在保險箱內，但她去世後我們卻無法找到。

一九三〇年代，蔣介石的中央政府，頗受許多受過良好教育、資歷優越的人士支持，他們都有建

設進步新中國的崇高理想<sup>(1)</sup>。一九三一年日軍侵佔東三省及一九三七年的蘆溝橋事變之後，國內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在香港有一群傑出的工程師，經常聚集研討戰後重建新中國的問題，於是在一九三八年成立了中國工程師協會香港分會，規定須有至少七年以上經驗的工程師，方能申請加入成為會員。首屆會長為黃伯樵<sup>(2)</sup>，曾任京滬鐵路局局長，父親為副會長。當時非常年輕的吳慶塘受僱為香港分會秘書，這是他與父親相識的開始<sup>(3)</sup>，後來他們不但成了好朋友，吳也一直是父親的親信得力助手，同時亦為此書提供許多非常珍貴的資料。

一九三八年日軍侵佔中國南部，十月間廣州亦告失守。父親在香港淪陷前幾年經常往返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抗戰時期他不但以工程師身份更在許多其他方面參與抗戰。中國茶葉公司為直屬中央政府財政部的重要機構，父親曾在此公司任採購部經理及顧問，當時茶葉外銷所得為國家帶來大量庫收<sup>(4)</sup>。日後經母親解釋才明白父親加入中國茶葉公司的原因是：中茶公司用茶葉外銷所賺得的外匯在國外購買武器以供抗日之用。中茶公司總部設於重慶，所以那段時間父親經常由香港去重慶。

後來中國政府又要求父親負責食鹽分銷<sup>(5)</sup>，當時中國內地許多居民因缺碘而普遍甲狀腺腫大，故亟須解決缺鹽地區的困難，記得戰時常聽大人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也在中國內地地區見過甲狀腺腫大的病人。

一九三九年母親生下姐姐德蓉。

一九四〇年時父親因熱心公益聲望日隆，被推選為中國工程師協會香港分會會長。因他在香港社會的人際關係及為人，大家都信任他決不會洩漏任何商業機密，故得以參觀到許多工廠及不同的機構。天廚味精廠即為一例；當時香港所用味精皆為日本製造，本港僅有一家由吳蘊初經營的天廚味精廠，在正常情況下他決不會讓任何人參觀他的工廠，但在父親安排下，天廚味精廠願意開放給工程師協會會員參觀<sup>(6)</sup>。工程師協會的晚宴多半在我們的大屋舉行，吳慶塘說那時他在父親身邊做事總是西裝革履，常有人誤會他也是會員之一。

吳慶塘任職工程師協會秘書時，月薪為港幣三十元，父親對吳頗為賞識，便允許為他留意一份薪俸較高的工作。中國茶葉公司在香港設有一研究機構，負責人為祝百英，一九四一年初父親請祝百

英將吳慶塘安插至此研究機構，雖然僅是文員，但月薪加上津貼已跳升三倍。吳母說他既然賺這麼多錢，應該可以結婚成家了<sup>(20)</sup>。



# 第三章

## 戰雲密佈：香港淪陷

自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後，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間，大批難民由大陸逃至香港，使得香港人口由七十萬突增至一百五十萬人，他們的話題總是不離他們目睹殘暴日軍對華人的屠殺、強姦及遍地的飢荒。但英軍既無對付日軍的軍事力量，又無法依賴美國支持，只好採取懷柔政策。英方認為他們只要與日方保持友好態度，香港便能免於受到侵犯，並為討好日本政府起見，香港英政府下令禁止所有反日宣傳<sup>(1)</sup>。再加上英國政府根本忽略了香港對日本戰略位置的重要性；香港不但是日本在戰爭中的運送戰略物資及軍力中心，亦是海防重地。駐港英軍情報人員亦忽略日軍在中國邊境的調度行動，對遍佈香港各階層的日本間諜毫無所悉。

在特務機關代表伊藤陸軍少將的指揮下，日本情報工作人員在香港無孔不入，他們在英軍常去的消費場所偽裝成酒保、理髮師、按摩師及侍應生做為掩護，對英軍提供各類賒欠容易的吃喝玩樂，如冰凍啤酒、新奇食物及女伴，伺機搜集情報。有一位香港最出名的理髮師，在香港七年期間，曾為歷任港督、將軍、警察局局長、情報組官員及匯豐銀行主席等高層人員理過髮。當一九四一年聖誕節香港對日本投降後，他搖身一變竟穿著日本皇軍海軍指揮官制服，出現在他的僱主面前<sup>(2)</sup>。

廣州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淪陷後，日本便在香港邊界北方集中兵力，第三十八軍團每天都在廣州白雲山集訓，利用此地與新界西邊醉酒灣防線相似的地形，演習在夜間由邊界深圳進攻香港<sup>(3)</sup>。

## 捍衛香港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倫敦陸軍部深知香港兵力不足，但以其殖民地之地位，而且在軍事上亦無法防守，故未予重視。當邱吉爾首相的參謀長伊斯曼(Hastings Ismay)在陸軍部會議中提出對香港撤軍時，被譏為失敗主義者。港督羅富國(Sir Geoffrey Northcote)卻認為伊斯曼意見實際，便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去信英國政府要求撤除駐港之防衛以「避免日軍襲港時平民受到生命及財產的損失」<sup>(4)</sup>，但卻無人理會，後來羅富國因健康欠佳退休在即，其職位則由楊慕琦(Sir Mark Young)接替。

當時一位多倫多出生的英國駐香港指揮官葛賽(Edward Grasett)少將認為日本決不敢對英國及美國宣戰，但仍主張英國對香港軍力應該增強，英國政府及許多香港居民都希望採信此論調，但增兵要求為英陸軍部所拒。一九四一年英駐遠東司令Sir Robert Brooke-Popham空軍元帥認為香港遇侵時可抵擋六個月以上，對港增兵確有必要，但此請求再度遭受否決，因首相邱吉爾認為英國毫無機會守住香港。

葛賽少將雖然明知邱吉爾首相不願對香港增兵的決定，但仍續持己見。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自中國退休，返英途中，路經加拿大渥太華與舊日同窗加國參謀總長Harry Crerar會面，會中談及若香港能獲得一或兩個大隊的兵力支援，香港必能支撐抵抗日軍更久。他並未直接對加拿大求援，但對英國參謀長則有提到此項建議<sup>(5)</sup>。

英國對香港的防衛措施全不熱心，唯一的英國皇家飛行中隊已轉調馬來亞，僅留下五架舊式的戰鬥機作為香港的防空。至於海防只靠Prince of Wales號及Repulse號兩艘軍艦，需要時才由南中國海開過來支援香港。同時英方亦認為香港若有戰事發生，美軍在太平洋珍珠港的艦隊必會牽制日軍行動<sup>(6)</sup>。陸地方面則全靠1,387名的義勇軍和一萬一千名英國及印度部隊防守。香港島上近港灣入口處設有多處炮台，而在醉酒灣的防線則為第一防線。為防日本飛機轟炸，市區到處設有防空洞。

香港居民對躲避飛機轟炸都略有訓練，中學生皆有發放軍服，並受訓練成為民間防空隊員<sup>①</sup>，燈火管制隨著戰情緊張而日漸頻繁。香港義勇軍在民間徵兵時，母親表姐林美娥的丈夫伍英才，後來成了我的家公，他是以一種「與年輕朋友一起組摩托車隊覺得好玩」的心態，加入了香港義勇軍，當時貪圖可分配到摩托車，而加入義勇軍的亦大有人在<sup>②</sup>。伍英才才是生於澳洲的華人，當時正在加拿大駐港貿易專員公署工作，他常將兒子衛權背在身後，騎著自己的摩托車，載他去利園山上的嶺英小學上課。

一般市民甚至在大批難民逃到香港之後，都不願相信香港會受日軍攻擊。許多國內的藝術家、文人學者到香港避難，令香港在一夜之間成了世界華人的文化中心，又因人口突增三倍，製造業快速成長，經濟開始繁榮。更有人在日軍控制地區與中國內陸做走私生意，發了不少橫財。

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這紛亂的時期，我剛好來到人世。

在英、美兩國相繼凍結境內日本財產後，一九四一年七月香港政府亦凍結日本所有在香港的產業，但英國仍堅信日本不會侵犯香港，留港日人仍可自由來去未受監視。甚至英國情報單位在獲知一位鈴木上校實為日方間諜身份後，礙於英、日兩國非敵對國家，外交部並未將他驅逐出境。此人在十一月底，即日軍攻打香港僅兩星期前自動離境，竟身懷全套詳盡的英軍防衛計劃。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倫敦自治領部致密電給加拿大政府，要求加國提供一個或兩個大隊軍力增援香港<sup>③</sup>。十一月十九日兩個大隊的加拿大兵到達香港，受到香港市民歡迎。豈知這些部隊不但全無戰鬥訓練，而且在部隊抵港前，有關方面竟將香港資料錯送至澳洲，使部隊對香港人文、地理環境一無所知。

由於國內受中、日戰爭影響情況較香港混亂，所以家中並無人打算離開香港還算太平的日子。父親與中日戰爭時任中共中央華南書記的廖承志<sup>④</sup>，由此時相識成為好友，廖承志原本在廣東及香港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後逃至香港組隊支援惠州及寶安，此即為東江縱隊之前身。他們二人曾與英國政府協商，請求英方對港九大隊游擊隊支援彈藥軍需品，以防禦香港，但為英政府所拒，因英方顧慮彈藥會落入親共游擊隊手中<sup>⑤</sup>。

父親和廖承志及另一英國友人，計劃在日軍佔領九龍之前破壞當地一發電廠，豈知日軍出人意料提早進攻，計劃未能實現<sup>(12)</sup>。

利家在戰時做過一件備戰的事，就是在大屋囤積米糧，那時利園山下灣仔居民皆知大屋藏米甚多，這也是戰時及戰後大屋常遭劫掠的原因之一。

港督楊慕琦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出席半島酒店慈善晚會的第二天，即星期日中午，無線電台即對義勇軍發佈緊急全體總動員集合令，伍英才說他應召報到後，發現許多義勇軍因怕戰爭危險而臨陣脫逃。伍英才和香港富紳余東旋之子余經鉞因隸屬野外工程部隊，故在九龍火車站集合報到，義勇軍動員工程部隊準備在日軍來襲之前，先破壞新界預定地區的橋樑及公路。同一天亦是母親的小妹瑤芝結婚前夕，他們計劃第二天先去香港大會堂註冊登記結婚之後，再去九龍舉行婚禮。

## 香港戰役

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早上八點半，我的未來夫婿，才小學一年班的衛權因不必上學，便跟著僕人在天台收晒乾的衣服，當他們看見天空的機群時，有些人還說：「只是又一個演習罷了。」此時九龍郊區及啟德機場上空，已開始彈如雨下。

瑤芝阿姨及其丈夫剛在香港大會堂婚姻註冊處簽完字，就無法返回九龍繼續舉行他們的婚禮。婚後直到姨丈去世，瑤芝阿姨常開玩笑懷疑他們的婚姻是否合法，因為他們既無證人也無婚禮。

外祖父母此時住在香港仔的壽山村道，與好友周壽臣爵士是鄰居。因他們的房子位居戰略要點所以被英軍強佔，並限四小時之內搬遷。在不及收拾任何細軟的情況下，只好來我們家暫住。

日軍將五架停在啟德機場的古老戰鬥機全部炸毀之後數小時，又傳來日軍摧毀美軍在珍珠港的艦隊，同時馬尼拉、新加坡均首次遭受轟炸，及香港僅有的Prince of Wales號和Repulse號海防艦隻也相繼被炸沉的消息<sup>(13)</sup>。



香港遭受轟炸後，我們家因地勢高目標顯著，所以大屋亦被散彈擊中，利行的牆壁也炸開一個大洞。家人立刻收拾細軟，由大屋躲到利舞台戲院的後台，我們非常感激祖父將戲院造的如此堅固，讓他的後代在戰爭中可有碉堡般的避難所。當時外祖父母也與我們一起住在戲院後台的房間，還有個廚房，雖然住得擠些但很安全。由於日軍轟炸事發突然，家人走避不及，未能帶夠米糧，又不知所帶米糧需維持多久，所以只能吃粥度日，稍大的孩子肚餓時在兩餐之間就吃些米通（爆米花）充饑。我那時才七個月大，原本是個健康的嬰兒，但在避難期間，母親用隨身帶來的奶粉餵我，我吃後立刻生病，母親說是因為戰時利舞台沒有清潔食水，只好用井水調奶所致，從那開始到戰爭結束，我的健康一直不佳。

在戰時市民聽到空襲警報時就要立刻躲進防空洞，利舞台附近的防空洞在禮頓道上，有一次警報來時外祖父不及躲進防空洞，結果被散彈擊中肩膀。日軍佔領九龍之後，隨即在岸邊設起對準香港的大炮陣營。母親妹妹瑤芬在尖沙咀的住宅，就因此被日軍強行霸佔。

做實習男護士的譚葆和此時正在瑪麗醫院，輪值晨間六點早班。香港受轟炸後，他們立刻移開住院病人，將床位讓給炸傷的傷者，仍須留醫的病人，就送去改為臨時救傷醫院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又為安全理由，除了志願留下的女護士，其餘全部遣送回家，看護工作全由男護士擔任。當日下午已有許多受傷士兵送來此地，正在受訓的譚葆和，就一人負責照顧二十四位大多數是加拿大籍的傷兵。當時有許多醫生已赴中國，僅有部份醫生受徵召留港服務，與譚葆和一起工作的醫生有周錫年和韓素音<sup>(14)</sup>。愛爾蘭是中立國家，所以其中也有許多愛爾蘭醫生<sup>(15)</sup>。

日軍入侵後，瑪麗醫院的醫生辦事處，及護理學校改為宿舍後，很多政府官員都來此避難，其中包括港督楊慕琦、愛爾蘭駐香港總牧師 T. E. Ryan 及一些香港大學的教授<sup>(16)</sup>。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清晨三時，新界黃竹山居民鍾本（音譯）被急促的拍門聲驚醒，為防劫匪，他手中持刀開門，發現幾支槍正對著他，原來此時新界的西貢已被日軍佔領，大埔、沙田在兩天前途陷，另外城門在前一日亦告失守。英軍已自新界醉酒灣防線撤軍到香港，僅由印度部隊在魔鬼山掩護撤退。日軍從十四鄉往九龍途中，或許因迷途而誤入黃竹山，日軍入村後便逐戶騷擾，強

逼村民做日兵腳伏擔抬重物。十二月十一日，日軍輕裝甲部隊兵不血刃通過西貢市區，因當地警察在日軍進佔之前早已撤離，村民全都留在戶內<sup>(15)</sup>。

英軍在新界及九龍所設的防禦措施，目的是用來鞏固保衛香港本島，但日軍在四十八小時內就輕易攻破防線，佔領了銀禧（城門）水塘的城堡（銀禧城堡位於醉酒灣防線城門水塘上方，九龍、新界分界群山以北）。香港義勇軍全部撤退至香港本島總部集合，日軍只以榴彈射擊，但無轟炸。十二月十二日，敵軍沿九龍碼頭排出炮陣，十三日早上九時，一名日本參謀官舉著免戰旗，渡海到維多利亞港碼頭，帶來一份交給港督楊慕琦的信函，命令香港對日本投降，否則將遭受嚴重陸、空攻擊轟炸。港督拒降後日軍對港開始大舉進攻。

十二月十八日晚到十九日，日軍登陸北角、寶馬山及筲箕灣三地，將香港分割為東、西兩半。北角日軍佔領發電廠後，將看守發電廠年紀稍大的平民義勇軍全部殺害<sup>(16)</sup>。日軍橫掃香港本島後，繼續向淺水灣及赤柱方向進攻，伍英才曾親眼目睹一名加拿大將領，在總部及部隊傳遞消息途中遇害，死於黃泥涌峽的防護壕內。十二月二十一日英首相邱吉爾再度對港督下令「決無投降之意」<sup>(16)</sup>。

日軍進佔香港時父親正在重慶，聽到消息立刻搭乘中國茶葉公司飛機趕回香港，不料飛機在香港領空無法降落，只好折返惠州。豈知如此一來或許救了他一命，日後他常說，當時若被日軍捉到他這類抗日份子，非殺頭不可。

英軍與加拿大軍均以為日軍已佔領黃泥涌峽，在聖誕夜全部撤退至山頂區後，便派伍英才出去打探風聲，但伍未見任何動靜，部隊又再移返。在日軍佔領香港一半地區，但尚未進入維多利亞城，傳來雙方談判略有進展的消息。

## 日治時期

### 港

督楊慕琦於一九四一年聖誕節晚間六點半正式向日本投降，日軍將他先移至半島酒店，又轉送到日本統治的台灣，再去遼寧省的瀋陽。至於戰後生還的外籍香港義勇軍士兵，和英防部隊士兵都分別被送往北角、深水埔、亞皆老街及馬頭涌的戰俘營，許多戰俘被迫運往日本或其他日本佔領地的勞動集中營做苦工。華籍香港義勇軍士兵脫去制服後即可回家。另外日軍視為敵人的平民俘虜全被關在赤柱戰俘營，因作業程序較慢，所以一直到戰爭結束才得釋放。日後我們聽到許多這期間在集中營內發生的各種英勇事蹟，和受盡折磨忍辱求生的故事。

伍英才聽到英軍投降消息後，立刻詢問義勇軍部隊動向，長官回答須先觀望日軍動靜，伍說：「我不等了，家中還有妻小，我非走不可」，於是轉身對余經鉞說：「我們走吧！」兩人將武器及摩托車交至葡萄牙藉義勇軍單位後，脫下制服，換上隨身一直攜帶的唐衫褲，走向余經鉞父親余東璇的中藥舖余仁生中藥房，到了店中余便打電話給他母親詢問家中狀況，余家在香港有兩幢出名的古堡式豪華巨宅，當時余母正在般咸道人稱Euston的一幢，余母說家中一切安好，日軍准許家人繼續住在家中。當晚二人暫宿店中，可清晰聽到日軍進城並在市區架起崗哨的聲音。

伍、余兩人第二天一早起來，因急於去余府，但見到藥舖門口已設起日軍崗哨，便商議先保持鎮靜，然後裝成若無其事的样子，口中吃著陳皮梅，由藥舖出來。豈知一出大門，伍英才的腦袋就莫名其妙地被日軍重重打了一記，原來他不懂見到日軍要鞠躬行禮的規矩，於是二人就一路鞠躬哈腰的來到余府。

此時伍家其他家人都住在跑馬地，因為糧荒問題，他們無法再繼續養一頭叫白雪的俄國狼狗，令衛權非常傷心，這頭狗大概一放出去就被人捉來吃了。此時香港街頭一片混亂，日軍當中有些士兵來自台灣，他們奉命可任意姦淫殺掠。日軍挨家挨戶的到處找所謂的「花姑娘」年輕女子及少婦，所以這些女子平日都盡量躲藏，並將自己弄得灰頭土臉衣衫襤褸，以避免遭受日軍凌辱。每逢戰亂

就必有苦難，只是每人遭遇不同而已。香港此時籠罩在一片恐怖的氣氛下。

次日余府廚子遲歸挨余母訓斥時，廚子告訴余母因在回家途中被日軍捉去當差，所以無法早歸，並拿出一張日軍給他的通行證，憑證可在市區自由行動。伍英才與廚子的年齡不相上下，所以第二天他就借了這張有廚子姓名及年齡的通行證，通過日軍崗哨去跑馬地藍塘道找他的家人。到了住處發現日軍在他們所住的公寓大樓不但強姦婦女還殺死數人，九龍巴士公司的鄧肇堅，是香港知名人士，也被日軍刺了好幾刀，他誤信相士胡言，以為可以靠這座公寓的風水趨吉避凶，豈知反而受害。

衛權母親有一次在日軍搜查他們住處時，幸好她母親也在，便幫她帶著兩個外孫，她自己就躲在櫥櫃的被褥下面，一動也不敢動，她母親故意讓日軍知道家中只有老小，就這樣衛權母親逃過一劫，無法得逞的日軍只得悻悻離去。衛權母親在日軍離開他們住處後，就帶著她母親和孩子去投靠弟弟林安邦及弟婦楊懇，後來伍英才向留在公寓的工人打聽，才知道妻子和孩子的下落。

伍英才找到家人後，告訴妻子他必須再回住處一趟，取出藏在餐櫥櫃腳內的三粒鑽石。他再次用余府廚子的通行證返回公寓，途中被日軍哨兵盤問時，他就用那幾句早年在滿州中國東北學的日文告訴日兵，他必須回家為孩子取換洗衣物。快到家時，就看到家中的餐桌正在大街上拍賣。

當他與日軍進到家門時，雖一眼即見那餐櫥櫃，但礙於日軍在一旁監視，無法下手取出所藏的鑽石，公寓內只見衣物雜亂散佈四處，有些衣物甚至來用做廁紙。後來所幸隨身哨兵被叫開幾分鐘，他乘著這機會飛快的取出鑽石，日後他告訴我：「妳一定沒有見過任何人用螺絲起子有這麼快的手脚！」鑽石取出後，剛好日兵進門就問：「你是不是二十六歲？」那正是通行證上廚子的年齡，若當時日兵改口問：「你多大年紀？」的話，那就麻煩大了，因為伍英才根本忘記查看通行證上的年齡。

鑽石到手後，伍英才就回去預備帶家人去余府避難，但因天色已晚又開始宵禁戒嚴，妻子美娥便說：「你先回去，明早再帶人來幫忙一起過去。」

第二天一早，伍英才依約帶著余府工人回到住處，卻發現公寓空無一人，牆上滿是子彈孔及血



漬，後來經由鄰居，他才找到躲在樓梯腳下的妻子及兒女，只見衛權抱個瓶子，美娥身背手中抓著餅乾的女兒。美娥的弟弟和弟婦已先離開住處，她只好自己一人帶著孩子在原地等丈夫回來。

原來前一天伍英才離開住處後，日軍又來強抓年輕婦女，美娥的母親便將美娥及媳婦楊懇藏在櫃中用被覆蓋，自己與兒子安邦帶著兩個外孫在櫃前打地鋪，正當兩名日軍進屋用電筒（當時已斷電）找女人時，幸好憲兵及時命令日軍離開。

伍英才夫婦帶著衛權及背著女兒的工人，一行人由跑馬地走向灣仔時，在街上遇到騎著白馬的日軍，和士兵捧著陣亡戰友棺木的大遊行。此時剛好路經一家餐廳，便入內買些食物果腹，結果花了一百元買隻熟雞，大家邊吃邊等遊行隊伍通過。終於到了毫無戰亂氣息但卻有食物的余府，當晚衛權就寢前請求他可否在余府住一輩子不走了<sup>(20)</sup>。

日軍進佔瑪麗醫院後，將所有醫院醫療用品丟棄，以日貨取代。員工除了阿劉必須留下操作機房及鍋爐，其餘全部遣散，阿劉在幾個月後也被解僱<sup>(21)</sup>。

瑪麗醫院在戰時將許多員工調至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臨時醫院服務，聖士提反中學改為臨時醫院已有五年之久，學校一間小課室被改為輕微手術室和醫療室，只收香港華人，醫生多為華人和愛爾蘭醫生，如G.E. Griffiths、林開弟和李有璇醫生。至於英國的修女護士和醫生，除了醫療服務團的總負責人克拉克(Selwyn-Clarke)<sup>(22)</sup>醫生之外，大多仍在實習階段。香港淪陷期間，克拉克醫生在任內，利用職權幫助了許多香港市民，譚葆和及其他醫務人員都得到他的信函，介紹他們日後逃到自由中國，可繼續為英政府服務<sup>(23)</sup>。

香港淪陷後中茶公司設於香港的研究部門也被迫關閉，經中國財政部指示，將中茶公司在香港所存的公款悉數發放全體員工，平均每人可得約四個月薪資。吳慶塘便自告奮勇去匯豐銀行提款，發放現金時，他很有先見之明的將面額十元的鈔票留給自己，因為他覺得戰時小鈔較為通行，果然後來日軍禁用十元以上大鈔。伍慶塘帶著這筆錢，便以難民身份離開香港逃到中國。

伍家在余府借住兩天後，伍英才出門前往畢打街，途中有一家懸掛法國維琪政府旗的法國珠寶店，他曾和余的父親余東旋去過幾次。伍英才頓時靈機一動，他知道很多日本兵都想要手錶，就進

去問店東華許(Walsh)先生是否信任他代售手錶給日軍，商量之下華許便給了他十隻銷路較差的手錶，和一些便宜的勞力士錶。伍拿了這些錶就直接去日本憲兵隊總部兜售，看到那裡有麵粉、香菸、威士忌酒和食米。主管日軍詢問勞力士錶價格時，伍說：「免費給你」，那軍曹便問伍英才想要從部隊拿些什麼回去，伍便要了一袋麵粉、一些香菸、洋酒及食米，結果這軍曹不但將這些東西全送給他，還派人幫他送回余府。後來伍英才告訴那名軍曹，拿回去的麵粉長滿了虫，他聽後便要求伍設法幫他賣掉部隊這批麵粉，伍就找到一位中國朋友，將這些麵粉又再賣給日本人，每賣一袋麵粉，他們二人就四、六分帳，軍曹得四十日元，伍得六十日元，當年一元日幣可兌換兩元港幣，而且身邊有日幣又方便許多。從此，日本人想要買任何東西，伍英才就四處為日軍搜購。

伍英才在憲兵隊總部混熟之後，不但常幫朋友弄到食米和麵粉，而且和幾位憲兵也成了朋友，並常去余府走動，有時日軍還會送些食米過去。自從日軍憲兵控制香港以後，伍家從未吃過苦頭。那時衛權六歲，妹妹才三歲，他記得日本軍官很喜愛他們兄妹倆，尤其衛權頗有音樂天份，日軍來余府作客時常要他表演，他父母就開始提心吊膽，因為衛權愛唱學校早會集合唱的革命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及彈「鬼怪上校」鋼琴曲，所以每次有憲兵在衛權身邊，他要表演這些曲子的時候，他父母都要立刻制止他。衛權母親始終對日本人存有恐懼及厭惡的心理。

日本不僅需要香港戰略地理位置作為海軍基地，同時亦覬覦香港的財富和資源，因為香港可為日本帶來大量收入及物資。日軍任意搜掠他們所需的物資，將所有可用的貨物，如汽車、機械、建築材料沒收後全部運回日本。瑤芝阿姨家中的汽車，在當時算是幸運的被日軍以一袋白米徵用，日軍甚至將他們所養的猴子都搶走。當時香港港口滿是船艙貨品堆積如山的貨船等候出港開赴日本。但日本僅得到少量英軍留下的武器，因為中國游擊隊已搶先一步，將英軍留下物資偷運回中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至三十一日之間，九龍城內的英軍剩餘物資買賣市場非常活躍，香港居民、西貢村民和游擊隊，都買了不少英軍留下的武器。

# 中國游擊隊

## 香

港投降後，利家許多人便由利舞台的避難所搬回住所，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和其他家人一起回到利行。戰時大屋曾受搶掠，日軍見有搶匪便開槍射擊，所以大屋留有不少搶匪的屍體。對母親來說這是一段非常艱苦的日子，一個年輕的母親，獨自帶著三個孩子，丈夫又不在身邊，但她全然不知自己受到父親派來的「情報員」暗中照顧。

所謂「情報員」是指中國游擊隊員或同情游擊隊的民眾，很少香港人知道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初已滲透新界地區，準備在日本侵犯香港時能有所抵抗。當時官方的游擊隊，是由蔣介石國民政府支持及供應武器，但香港在一九四一年聖誕節投降後，最為活躍的游擊隊是廖承志於廣州淪陷後，在香港組成的東江縱隊的港九大隊。港九大隊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式納入共產黨旗下，易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

中國游擊隊在香港設有情報交通網及破壞工作小組，日本佔領香港初期，不同政治背景的游擊隊曾積極活動，幫助國內要人和國際友人逃出香港，包括有最早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脫逃的廖承志<sup>(註)</sup>。在最初七個月當中，共有三百多人獲救，其中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喬冠華、薩空了、梁漱溟、著名影星胡蝶，及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官余漢謀夫人上官賢德<sup>(註)</sup>。陳策將軍是國民黨駐香港與英軍聯絡的情報單位最高負責人，則自行設法逃走。另外尚有戰俘從戰俘營逃出後，皆由游擊隊安排他們經水路坐舢板，或走山路進入自由中國。游擊隊員並與新界村民合作幫助戰俘躲避日軍搜捕，並提供食物，甚至孩子們也徵召成為「小鬼」的小游擊隊員，當時年紀最小的僅九歲，他們常為游擊隊跑腿或刺探消息。

戰俘營第一次逃亡計劃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由香港義勇軍野戰醫院的賴廉士中校，及原屬香港義勇軍第三機槍隊的一位上等兵李堯標（音譯），在深水埔戰俘營策劃。賴廉士是來自澳洲的醫生兼教授，一九二八年到香港大學生理系擔任講座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參戰時曾兩次在法國受傷。身

材瘦小的李某戴著眼鏡，個性內向，是香港大學生理系的職員，因景仰賴廉士為人，故要求調至野戰醫院與賴廉士同一單位。李其實不須關在深水埗戰俘營，因香港投降後，日軍准許華人香港義勇軍脫除制服即可解散回家，但他告訴賴廉士他想體驗戰俘生活，及萬一賴廉士需要逃亡，他可隨時在旁幫助，此外他覺得在營內比在外面更能提供支援。果然在集體逃亡時，他就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此次逃亡路線策劃全由李在營內暗中安排，與游擊隊員及同情游擊隊員的民眾，利用運送食物及其他日常用品的機會互相聯絡，許多人因此被日軍殺害。後來他們兩人會同一起在香港大學任教，同屬香港皇家後備海軍義勇軍的工程系講師Morley中校，及另一位物理系講師Davies中尉，四人一起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成功的逃出戰俘營<sup>(26)</sup>。

他們四人乘舢板至青山道附近的海灘，再步行到新界，沿途一路躲避日軍搜索後抵達西貢邊緣。日本佔領西貢半島之後，就將西貢半島交給汪精衛手下管轄（汪原為國民黨要員，是蔣介石在黨內最主要對頭，後來背叛國民黨投靠日本）<sup>(27)</sup>，加上土匪四處流竄，市面一片混亂，幸好在一月九日他們一行四人到達西貢的同一天，游擊隊已將西貢情況控制。他們逃出後，消息傳到了游擊隊及汪精衛手下，就成了兩方爭先搶奪的對象。在李的安排下，他們在約定地方和港九大隊長蔡國樑見面。賴廉士在他的日記中，對這些素不相識的熱心村民所提供的幫助，有非常詳盡的描述。村民不但給他們食物，並提供住處，更將他四人扮成鄉民模樣以避日軍耳目，若沒有這些村民的協助，他們決不可能成功逃出日軍魔掌。四人終於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安全到達自由中國<sup>(28)</sup>。

到了中國，賴廉士被指派成立英軍服務團，負責運送醫療物品進入戰俘營，及安排逃亡計劃，並協助自行逃出的戰俘到達安全地方。英軍服務團直屬M19英國情報單位，中國政府最初極不願意有外國情報單位在國內活動，但礙於戰時英國為同盟國，而勉強同意。英軍服務團在香港的活動，則全靠游擊隊協助而得以順利展開。賴廉士致英國陸軍部報告中稱中國游擊隊員為「我們的游擊隊」，或「紅色游擊隊」，因他們較親共產黨。對逃亡戰俘來說，這些中方游擊隊是他們的生命線，賴廉士認為這些游擊隊員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所有組織中是最活躍、可靠又有效率」<sup>(29)</sup>。



香港在日治時期，中國游擊隊員就滲透到香港社會生活各方面。他們活躍在各個市區、鄉村角落。他們在日本銀行、印刷廠、甚至日軍高層指揮部都廣佈眼線，專門從事間諜、破壞及救援任務，成為日治時期香港與自由世界的重要聯繫。

事實上，日軍對佔領區的控制仍有隙可尋來往香港與中國大陸，同時也可利用如澳門及廣州灣的法租界中立區進入中國。戰爭初期游擊隊曾成功地救出許多戰俘逃離香港，直到後來不但因為任務愈見艱難，而且事成之後日軍對營中其他戰友的報復行動亦太過殘酷，才不得不放棄搶救工作。游擊隊員搜集到情報後，立即報告中國高層，有些情報亦轉達其他盟國。美國空軍就全靠這些珍貴的情報，在戰爭末期得以準確地向香港日軍基地投擲炸彈，美國飛行員被擊落時，也幸得這些游擊隊員協助逃生。

## 父親是抗日戰士

父親由一九三七年就開始在中國以官方身份，及用私人關係積極加入抗日行列，他將家人安置妥當後，便全力幫助更多的人逃離香港。父親在國民黨游擊活動，及親共的廣東東江游擊隊均有參與。我們利家在戰時幸而受到這些游擊隊員的保護，不但毫髮無損，而且得以免受日軍和同樣殘酷兇狠的土匪迫害<sup>(30)</sup>。

父親不屬任何政治黨派，他的獨特作風令他與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他記得有一次在無意中獲悉國民黨要捉拿當時身處在國民政府內的周恩來（周得蔣介石保證安全，為共產黨派駐國民黨的聯絡官），父親立刻警告周恩來，令他得以順利脫逃，周對此事一直銘感於心。戰後他知會中國駐香港非正式官方辦事處的香港新華社，父親可以自由出入中國任何地方<sup>(31)</sup>。

母親帶著我們兄妹三人進入中國時，父親已在廣東東江地區游擊隊的基地惠州活動。我想父親從未直接參與游擊隊，因為當時情況非常混亂，各種不同組織在抗日同時互相競爭。實際上，有兩種游擊隊：一是親共的「紅色」游擊隊，另一種是由余漢謀將軍指揮的官方游擊隊，在廣東地區活

動，此外還有汪精衛手下的奸細，和英軍服務團及其他不同組織。這段時間父親結識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宋慶齡女士，和毛澤東好友斯諾(Edgar Snow)及多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高層官員。戰後斯諾每到香港辦事時，都會借用父親的辦公室<sup>(32)</sup>。

父親當時以人道主義者自居，是那些逃出香港的人士，游擊隊及中國政府三者之間的聯絡人。賴廉士在他的日記中經常提到，父親如何為在香港的戰俘和逃到中國的難民取得醫藥及毛毯等物資。當年父親可能是以他中國紅十字會司庫的身份，為英軍服務團取得所需物資。四叔說他在一九四二年時，去廣東北部曲江（廣州被日軍佔領後，曲江成為廣東的臨時省會）探望父親，當時父親正和賴廉士上校在英軍服務團總部一起工作。後來四叔非常幸運的，隨同服務的中國銀行調到英國倫敦，一直工作到一九四七年。父親與賴廉士上校在這段期間，因工作而互相了解尊重成了好朋友。戰後賴廉士成為香港大學校長，父親則是校董會的校董。



# 第四章

## 家族逃難

一 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是我在兵荒馬亂年月中的孩提時期，跟著家人逃難至中國。雖然許多戰時的經歷是別人告訴我的，但在幾十年後，我自己對那個年代的某些事情仍是記憶猶新。

在日本統治之下流行一句「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即指亞洲人應由日本人統治。此時香港市民人心惶惶，有錢人還可由黑市買到食米，無糧可吃的窮人只有活活餓死。

一九四二年初日軍宣佈計劃縮減香港人口，目標由當時的一百六十萬人，減至他們認為「可以控制」的五十萬人，經過各種手段，他們幾乎達成目標。其中最不幸的一批人當街被日軍捉上卡車，整車人運到海港後丟進帆船，然後拖到大海淹死，或放火活活燒死。僅在一九四二年這一年內，根據正式紀錄顯示，共埋葬了83,435因戰爭恐怖行為、搶劫而死亡的人<sup>①</sup>。亦有很多人餓至骨瘦如柴，甚至吃人肉。所謂每人每日六兩四的配米，不但混有砂石，還要憑運氣才能得到。

那時香港街頭充滿恐怖景象，街邊常可見到垂死的餓殍，尚未斷氣已被切割分食，若有人見到日軍忘記鞠躬行禮，即冒斬首之險。每當我的朋友譚葆和去般咸道女友家時，常見到載滿死屍的卡車，將屍體丟棄在山頂警署附近的方形長坑內<sup>②</sup>（現今佐治六世紀念公園地點），地點剛好在當時伍家借住的余府巨宅之下。此時中環市區的茶樓全被改為賭場，市區亦開始為日軍特闢紅燈區慰安所。

## 逃離香港

日

本政府鼓勵香港華人返回中國，我們家族亦在遣返中國之列，許多利氏和黃氏家族成員就分別到了中國不同地方，但也有極少數親人願意留守香港。

利氏家族中，只有銘洽二叔夫婦帶著三個小的孩子，回到利氏祖居嘉寮村，因此他們戰時的經歷和其他家人略有不同。他們坐船經珠江，再赴嘉寮村。兩個較大的男孩在戰爭初期才三歲及五歲，都在村裡學堂讀書。

只要聽到有日軍進村的風聲，全村人不是躲到田野的茅屋，就是逃到鄰近村莊避難。漢輝堂哥記得當時他才三歲，每逢逃難時，大人便將他與妹妹分別塞入兩個竹籬筐內，用扁擔挑著跑，五歲的漢楨哥就只得跟著大人自己走。戰時不但要躲避日軍騷擾，亦要提防當地土匪隨時入村搶掠。天真的漢輝哥聽到土匪要來就十分興奮，因為全村村民都聚集在我們的利氏祠堂內，等候二叔發槍給所有壯丁，防守各人的崗位，將祠堂變成了堡壘。漢輝哥未曾憶及在嘉寮村的數年中，土匪曾造成任何重大的傷害<sup>(2)</sup>。

祖母及二祖母（父親生母）分別與自己家人逃返中國，二叔大女兒慶雲亦跟隨二祖母避難。四祖母（四姨太吳月，又名吳佩珊）則回到自己廣西梧州老家，她的孩子皆已十幾歲，則跟著其他家人回國，孩子無論住在何處均在當地就學。唯有三祖母（三姨太蘇嫻，又名蘇淑嫻）決定與她兒子五叔留守香港，五叔在戰時一直於家族租務公司工作，負責收租<sup>(3)</sup>。當時家人經兩種不同路線由香港進入中國；一是陸路入沙頭角，或坐船至湛江即舊時所稱的廣州灣，此區當時屬法國維琪政府故為中立區，家人到國內之後再會面<sup>(4)</sup>。

因為父親無法親自返回香港照料我們，便託一地下工作人員，也許就是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游擊隊員，帶信給母親，信中要母親帶著我們跟隨此人去中國，母親生恐其中有詐，不肯起程，直到父親捎來第二封信，母親才決定準備離開香港。

逃難時很多人都將值錢珠寶縫在衣服夾層，或藏在鞋底，以防日軍搜身及土匪搶劫，戰亂時這些珠寶可隨時賤賣換取現金急用，但除了現金之外，還是金幣最容易換取食物和其他用品。母親一定儘可能的藏了不少細軟在我們行李中，但她大部份的珠寶，都由她表姐美娥的丈夫伍英才，幫她埋藏在大屋後院。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們一家跟著其他成千上萬的香港難民，踏上逃往中國的路程。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四歲的哥哥、兩歲的姐姐和才九個月大的我，加上兩個傭人，六大件行李，由四叔和伍英才陪同，及游擊隊員暗中保護下，一行人坐船過海來到九龍火車站。伍英才為防日軍阻擋或搜查我們，他告訴日本憲兵朋友，母親是他妹妹，並為我們弄到一張特別通行證，還利用關係在行前為母親換到些現金。戰後父親曾向伍英才詢問這名憲兵的姓名，以便去函致謝<sup>⑤</sup>，但是否打聽到他的下落就不得而知。

四叔在車站與我們道別後，由伍英才陪同我們坐火車進中國邊界粉嶺，車廂擁擠不堪，我們的行李幾乎無法上車。粉嶺下車後，母親就僱了幾部單車載行李，傭人背著哥哥和姐姐，母親抱著我，跟著大群的難民，步向中國與香港邊界的入口之一沙頭角，伍英才在此與我們分手返港，母親一進到中國就立刻撕毀日軍的特別通行證以免麻煩。我們由沙頭角船行一段路後，步行一日到了惠陽，然後再坐另一艘船去惠州與父親見面。

到惠州之後我們便坐卡車去廣東省北部的韶關，再轉乘火車到桂林。父親亦指示他的弟妹和漢銓姪兒走此相同路線，到桂林與我們相會<sup>⑥</sup>。大家深信我們是因為受到游擊隊員一路保護，才得順利通過敵人和土匪控制的地區。

我們家離港不久，伍英才接到他所服務的加拿大貿易專員公署通知，他們一家可能有機會去加拿大，因為他們的名字很幸運的在美、日政府互換境內外僑名單之內<sup>⑦</sup>。由於美、日雙方交換人數不平衡，當時談判地點正在香港，而所有加拿大士兵全關在香港戰俘營內，只好用部份在香港的加拿大公務員，彌補美方不足之人數。

伍英才懷疑這個消息是日軍設下的陷阱，就由他的家庭醫生亦是他姐夫處，取到一張他妻子肺部

有陰影結疤的舊X光片，然後去憲兵隊打探虛實。伍英才拿著這張片子給憲兵看，證實他妻子確實有病須要治療，憲兵就建議伍帶著家人去加拿大，根本不知伍給他的是張舊X光片。

伍英才帶著妻子美娥和兩個孩子一家四口，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離開香港，直到今天，伍家仍不明白他們的名字如何會在交換名單之內。到加拿大時，移民局官員因為他們是華人而不許他們入境，但四人名字又確在交換名單之內，只得允許他們居留。伍家是加拿大史上第一批收容的華人難民，政府不但供住屋，伍英才還可繼續在渥太華政府貿易部工作。伍英才原本計劃戰後返回香港，但因一九四五年時香港居住環境太差，才決定全家在加拿大定居。後來他們全家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於加拿大國會議會典禮中，宣誓成為加國公民。

## 桂林的日子

### 往

桂林途中，吳慶塘再度與我們一家在柳州會面，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母親和其他家人，他與我們家的關係從此更加密切。

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時，我們在風景優美的旅遊勝地七星巖正對面，蓋了一幢房子，現在此屋已被夷平改為馬路，以輸送此區旅客。日軍向廣西省方向迫進時，飛機轟炸亦漸頻密，每當日機來襲，我們就躲進七星巖裡。

漢釗哥當時寄宿學校，戰時學校伙食僅供兩餐，孩子們總是吃不飽，所以他周末常來我們家吃飯。在桂林一直跟著我們的一個女傭順姐，告訴漢釗哥我們屋子有鬼，他聽後老覺得晚上睡覺有人壓著他，但又不敢對我父母親開口，所以開始找藉口去離我們家只有五分鐘路程，在建幹路上的二姑姐家住宿。漢釗哥說其實只要那一家吃的東西多，他就去那裡，漢釗哥在戰時與二祖母常和我們同住。

我們在桂林住了一年多，此時家中兩位女傭預備辭工，母親便決定在女傭未離開之前，她先單獨一人回港。因為母親相信女傭一定知道她在後院埋藏珠寶的地方，她要儘快在她們回港之前，

先回去取出這些財物。戰時家人在必要時可變賣這些首飾以求生存，同時她也須要回港儘可能取出我們日常生活需用品。

母親將我們交由父親和傭人照顧之後，便和瑤蓮阿姨一起經湛江回香港，但瑤蓮阿姨無法取得通行證，只能在湛江等候母親。於是母親便獨自上路，還得加多一件為阿姨帶回所需衣物的責任。

母親回到大屋後由留守大屋工人協助，收拾我們的衣物。大屋一樓和二樓遍地都是被散彈炸死或日軍殺死的劫匪屍體，我們住的三樓似乎未受騷擾。日後母親對我們說，當時他們必須繞過死屍，然後在三樓收拾衣物，因為二樓地上滿是結成厚塊的血漬（戰後重整家園時，無法清理這些血漬，須重新更換地板）。我實在無法想像母親是如何經歷這段日子的。

母親回港期間住在利行，因為利行離灣仔較遠，未被劫匪騷擾。外祖父母和瑤芬阿姨都有來利行與母親見面，有一天母親和外祖母在街上，經過一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人，向他們叫著「求你救我！」當時外祖母和母親都自身難保，對他實在無能為力，信仰虔誠的外祖母就說：「你向耶穌禱告，祂會幫助你的。」

母親對我說過在她晚年，尤其父親去世後，過有任何困難時，只要想到這場戰亂的經歷，她便無所畏懼。

母親在香港住了幾個星期之後，便坐船赴湛江與瑤蓮阿姨會合。大家都相信母親是受游擊隊的暗中保護才能安然無恙。母親將她的首飾，極為巧妙地藏在各個隱密的角落，另外加上二十大件我們家和瑤蓮阿姨的行李，一起帶到桂林，其中有我們最需要的厚外衣和絲棉被<sup>(10)</sup>。

戰時人們總是想盡辦法收藏貴重物品，我最喜歡聽的一個故事是，我在一九四九年見到的一位父母親的朋友陳律師的妙計。當年她毫不遮掩的，堂堂皇皇的將大鑽戒等所有首飾全戴在身上，讓日軍誤信她身上戴的都是假珠寶，得以過關。

吳慶塘非常感激母親送給他的絲棉被，因為逃難時他總是怕冷，而自己又買不起絲棉被。直到今日吳慶塘仍稱讚母親是個非常勇敢的女人。

戰時我們全靠變賣或典當母親首飾維生，父親為了私人原因拒絕為美國政府在中國做工程師，而



他對中央政府、東江游擊隊及英軍服務團的種種抗日活動，均為義務性質，全不取薪，所以此時父親毫無入息。父親生性儉樸，個人需要極為簡單，又為了衣物耐髒好洗，他將淺色衣褲全染為深色。經濟上我們僅能勉強維持，他安慰母親只要打完仗，一切情形都將好轉，並必會補償她所失去的個人財物及珠寶。的確，這些承諾他都一一兌現。

一九四二年日軍進逼，廣西情況告急，中央政府亟須整修黔桂（貴州、廣西）鐵路<sup>(11)</sup>以疏散難民，於是便成立一個共有四位工程師組成的委員會<sup>(12)</sup>，由國民黨員侯家源主持，但他們仍需一位有能力及可靠的人手監督工程進展，所以推選父親為此委員會的國民黨榮譽執行委員<sup>(13)</sup>。

此時吳慶塘在桂林的永光煤炭行任經理<sup>(14)</sup>，但父親認為吳跟著他較有前途，便說服吳成為他的秘書。因父親不會說國語，所以在代表中央政府參加會議時，須要吳在一旁代為傳譯及發言。他們雖然身為中央政府代表，但都不屬國民黨<sup>(15)</sup>。

吳跟隨著我們家到了廣西省宜山，鐵路局總部所在，局長侯家源便給父親一塊位在總部附近的土地，讓父親自己監工設計蓋了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給家人住。房屋外型完全依照當地風格，用竹片混和泥土建造，父親又特別改良將泥土混合部份水泥，令屋牆密不透風<sup>(16)</sup>，宜山房子完工後，二祖母也搬來與我們同住。

戰爭歲月中，父親積極抗日行動之一，是做中國紅十字會義務司庫，因著這層關係，他可取得一種中國無法找到的西藥，學名為對胺基苯磺醯胺，專治敗血病。在宜山時，吳慶塘手臂受傷感染發炎十分嚴重，幸有此藥治癒<sup>(17)</sup>。

有一次父親因得瘧疾病倒<sup>(18)</sup>，須由吳慶塘代表監督鐵路工程，父親晚年時常自誇身體硬朗朗從無病痛，他大概忘了這段打仗的日子。父親後來實在體力不支，須辭去國民黨榮譽執行委員監督黔桂鐵路工程的職位，便託盧衍明<sup>(19)</sup>、連瀛洲<sup>(20)</sup>及歐陽奇<sup>(21)</sup>，安插吳慶塘去柳州的新加坡華僑聯合商業銀行工作。這家銀行為汕頭華僑所有，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只用汕頭籍的員工，但在父親的推荐下破例錄用吳慶塘，並信任他在銀行負責採購事務<sup>(22)</sup>。但柳州不久也告淪陷，銀行被逼遷至重慶。



## 再度逃難

一 九四三年時，利家尚有五個大孩子留在桂林讀書，他們是六叔、七叔、七姑姐、八姑姐及漢劍哥，因桂林情況日漸危急，須將他們疏散較為安全的地方。由於當時火車票極難買到，幸好有一位前利舞台員工，亦是家族好友的袁耀鴻出面相助，他認識中央政府專員的黃茂蘭，黃的父親是位將軍，袁便說服他們，將這五個大孩子塞進將軍的私人火車車廂內。五個孩子終於到達柳州，得以暫時躲避日軍，然後他們再由柳州坐火車去宜山，此時我們一家已離開宜山赴貴州的獨山，五個孩子到達宜山時，與二祖母一起住在我們家中。漢劍哥記得我們在宜山房子後院種有蕃茄，也養雞一隻，這時他學會殺雞，他說若不自己動手，晚飯大家就沒雞可吃。他們在宜山沒住多久，也跟隨我們到了獨山。

交通運輸一直是中國的一大問題，尤其戰時更是困難，父親認識一位中國銀行交通部門的負責人王藹佳，憑他所提供的卡車，我們一家得以由宜山搬至獨山。貴州獨山是個丘陵小鎮，我們住在城郊，生活情況非常落後，又無自來水供應。幾位叔叔和姑姐到獨山後，就在當地入學，漢劍哥正讀高中，不論天氣多冷，父親每天都帶他去附近的一條小溪瀑布洗澡。那時我大哥還太小，無法跟他們去。這段時間叔姪之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父親常告訴漢劍哥他在牛津讀工程的點點滴滴。母親說年紀小小的漢劍哥，已經立定志向長大要像父親。

我在獨山開始得病，骨瘦如柴，弱得連頭都抬不起來，母親形容我那時就像一頭快要餓死的小貓一樣瘦弱。當我病重住在獨山非常落後的醫院時，六叔來看我，正巧醫院的女傳教士醫生，向母親發出我的病危通知，要父親儘快來醫院看我最後一面。十幾歲的六叔正和我母親在一起，馬上跳上單車去找父親，父親接到消息，立刻帶了他身邊僅有的「仙丹」對胺基苯磺醯胺，來到醫院。醫生對此藥一無所知，但見我已無藥可救，也只有死馬當活馬醫的給我服下此藥，奇蹟般的，竟救了我一命。

戰時我一直體弱，走到那裡，病到那裡，最後總要住進醫院，成為家人的一大負擔。從香港對日投降，我七個月大開始，就一直多病，經常腸胃毛病弄得脫水，還有一次大腿淋巴腺受感染，好幾次父母親都以為要失去我。雖然戰時父母親和大哥也曾得過瘧疾，但是我身體最差，所幸我們都走過來了，今天我還能寫這個故事。

日軍漸近貴州時，我們又被逼離開獨山，這時我已開始懂事，日軍轟炸過後，當母親牽著我走回家時，她非常驚訝我居然能馬上認出我們屋頂已被炸毀，只剩下厚厚牆壁的房子。

離開獨山時，我們又再次使用王藹佳借來中國銀行的車輛，一路坐在行李上，來到貴州省省會貴陽。沿途山路彎曲顛簸，尤其下坡剎車失靈時，更是驚險萬狀。途中我們的車隊曾數度被流為土匪的國民黨散兵阻攔，幸好無人受傷<sup>(註)</sup>。當時我才兩歲，依稀記得在車上，要像爬粗繩樓梯一樣爬到行李上，上路後小手要抓緊繩索以保性命。每當我們走到國內落後地區，因衛生環境太差，父親絕不買任何熟食（他形容零售的肉類因蒼蠅滿佈，看來是黑色的），只有靠水煮蛋充飢，記得我一路暈車，將胃中的蛋嘔吐的一塌糊塗。五十年之後，我才克刻服了對水煮蛋的恐懼。

經過漫長辛苦的旅程，終於在天黑時份到了貴陽，車隊在一間戲院門前停下，見到前利舞台員工袁耀鴻由戲院出來，將手中的一包東西塞進父親手中，說：「澤哥，請收下，是給你的」，原來袋中全是現金。我們家在戰時沒有人身上帶錢，所以漢釗哥對剎時間看到那麼多錢，所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記憶猶新。袁當時在貴陽戲院當經理，他將我們安排住在一間全不隔音的房屋。我們家住樓上，二祖母，年輕的叔叔、姑姐和漢釗哥、慶雲妹睡樓下，漢釗哥說我們在樓上的一舉一動，他全聽得清清楚楚。

## 重慶的日子

中國銀行的車輛又一次載我們由貴陽來到四川省的重慶，沿途情勢受國民黨控制較為穩定，所以一路還算安全。我們到達四川省後發現此地生活、飲食習慣和南方人不大相同，尤其我們不慣辛辣的川味食物，覺得難以下嚥，另外母親覺得有錢的四川人，將預先訂製的棺木放在自己床下，是很恐怖的習俗。

幼年時的戰亂，對我來說只有美好的回憶，煩惱憂慮都屬於大人，我不生病住院時，就是個旁觀者。天熱時我穿著木屐，跟著工人在鄉間到處亂跑，經歷了最精彩的探險，冬天就穿布鞋。戰時平民沒有皮鞋，因為皮革須留給士兵做軍靴。有時我們走到稻田間去看農人作活及撈田螺，雖然我們家不許吃田裡的田螺，怕有寄生蟲，但看人撈田螺也非常有趣。有一天我和傭人在外散步，忽然聽到一陣騷動，連忙趕去查看，原來是一條大鯰魚困在淺水泥塘中掙扎，有人晚餐可打牙祭了。又一次聽說附近農村有頭母牛快要生產，傭人就帶我過去看熱鬧，正好見到剛生下的小牛，對孩子來說，真是經歷了一堂活生生的學習課程。我們也曾一起去買雞蛋，將部份雞蛋用來孵小雞，那些剛出殼絨絨的小雞，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有一次不知是誰的主意想要喝羊奶，於是十幾歲的七叔便捉了隻羊想擠羊奶，當時景象真是好看煞人！

我們橫渡長江入重慶與祖母、三叔及五姑姐會面，他們很幸運的能搭乘上海商業銀行的運輸機<sup>(25)</sup>，由桂林直飛重慶，不必像我們飽受舟車勞頓之苦。十六歲的六叔因年紀還小從軍不成，便停學憑著優厚的英文底子，加入中國政府機構任傳譯員，以賺取收入，後來調至緬甸。

在重慶時我們住陶園社區，此社區是我父母朋友陶家的產業，由中國最大的承包商陶桂林建造，他曾負責中國一些最主要建築物的工程，尤其在南京及上海地區<sup>(26)</sup>。陶家住在社區入口左邊的大房子，我們則住在右邊最後一間。

三叔是上海商業銀行的董事，所以他和祖母及一些叔叔、姑姑，可以住在上海商業銀行在重慶所

擁有的天壇新村其中一個住宅單位。

當時我年約三歲，仍記得我們住在長江江畔陶園的一幢小平房。此屋是沿著河床地形斜坡而建，結構簡單，前面是客廳，後面為臥房，所以雖然房子大門臨街，但後面臥房已在河堤坡上，最有趣的是廚房與房子遠遠分開，另在坡下河邊。

我們兄妹三人常喜歡在晚飯後去捉螢火蟲，然後將螢火蟲放在瓶中看它發光。我們還將由河邊捉來的烏龜，綁在客廳沙發腳邊，讓那些烏龜吃蚊蟲。因為廚房在坡下河邊所以常遭水淹，每遇河水上漲，家中的大人就得趕下去，將廚房地面食物移至屋內。水退後河床岸邊總會留下一些跟著河水沖上岸有趣的東西。有一次我們捉到一隻螃蟹，我想留下來玩，父親怕蟹箝傷我，但又不知如何細綁蟹箝，只好把那對箝子活生生的敲下，他真不懂生物學上人、蟹的分別，居然還給螃蟹傷口塗抹紅汞藥水，然後再用繩綁好螃蟹給我牽著走。雖然那個年代我們沒有玩具，但我在這方面卻一點都不匱乏。

從我當年經常往來的玩伴中，我學到一些童言稚語的普通話，至今仍有些記憶。在中國時因我排行最小，大家都叫我妹妹，所以戰後便慣用 *May* 為我的英文名字。因中國女孩常以「美」字為名，我嫌俗氣不喜歡這個名字。

中日戰爭日軍步步逼進時，重慶是戰時臨時首都，是當時最安全的地區，有些親戚來重慶探訪我們之後，也決定在此地留下。

一九四四年除夕，母親的弟弟錦彰及弟婦仲霞，帶著孩子來陶園看我們。晚飯後大人在客廳聊天，一群表兄妹的孩子們就在父母親的臥房玩，我哥哥突然覺得不適，便用椅子爬到窗邊對外嘔吐起來，其他的孩子也跟著爬上去一探究竟。霎時間，鳳恩表姐由窗口跌了出去，當時年紀最小的我在一旁觀望，幾個大孩子都嚇傻了，只有我當機立斷的跑到客廳，告訴大人鳳恩表姐掉出窗下的意外。

當時混亂的情況真是可想而知，幸好鳳恩表姐跌出去時被後窗下的電線截住，沒有從兩層樓的高度跌到地面。戰亂時期的重慶，又逢除夕，要送醫治療實非易事，後來總算舅父和舅母找到一部黃



包車，將鳳恩表姐送到附近醫院。幸好她傷勢不重，只在下巴留下一道疤痕。父母親直到晚年時仍常談起，難得當年我才三歲半，就能如此鎮定機智。

## 日本投降

**歐**洲戰事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結束之後，對抗日本的策略開始轉變，太平洋地區只求在最低傷亡情況之下，能儘快結束戰事。終於在八月六日在廣島上空投下第一枚原子彈，三日後另一枚原子彈又在長崎上空投下。結果於東京時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晚十一時三十分，日本天皇正式宣佈向同盟國家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同一天晚上，重慶的新加坡海外聯合商業銀行，正舉行晚宴款待外交部長陳慶雲，及前上海市市長吳鐵城。陳慶雲家人聽到日本投降消息後，馬上打電話通知銀行，銀行主席連瀛洲和總經理歐陽奇，立刻要吳慶塘上街買炮仗來燃放慶祝，他們二人都是廣東潮州人，不知四川人是報喪才放炮竹，所以街上市民聽到炮竹聲，還以為是銀行有人去世。晚上消息傳開後，無人再肯睡覺，市民都湧上街頭通宵達旦狂歡慶祝，個個都喝得酩酊大醉<sup>(27)</sup>。

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香港之後，市民上街見到日軍就打<sup>(28)</sup>。蔣介石認為香港在中國戰區之內，故應由他本人代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關於香港前途曾在戰時高峰會議中討論過，交回香港方案也得美國羅斯福總統支持，但英首相邱吉爾反對。日本投降後數日，香港情況仍混淆不清，不知應由何方政府從日本政府手中收回香港。八月二十三日代號為鳳凰的梁姓英軍服務團工作人員，帶信給赤柱營內的吉姆森(Franklin Gimson)，要他出面接掌香港政權。三日後吉姆森由赤柱營釋放，駐進法屬使館大廈。八月三十日英國皇家海軍Sir Cecil Harcourt上將抵港，成立戰後香港軍政府，由此政府接管香港至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止。

一九四五年八月父親、三叔及祖母，與邱吉爾首相駐派中國戰區的特別代表Sir Adrian Carten

de Wiarte中將同班飛機，由重慶飛回香港。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被日本佔領後，金融制度已完全脫序，因為父親身為第一批返港人士，匯豐銀行便委託父親帶回大量現金<sup>(19)</sup>。

因父親須先趕回香港參加重建工作，母親便獨自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及傭人，像其他難民，經一般的路線坐火車及船回香港。記得有一段路，我們須擠在一個小平底船上，一個個平排而睡，母親告訴我們戰爭結束，可以回家了。最後一段路我們須坐火車，但火車坐位非常有限，幸好家人認識的火車站站長告訴母親，要清早四點以前到車站才可能有坐位，於是我們便一早到了車站搶到坐位，踏上歸途。

漢釗哥和十多歲的叔叔姐姐仍留在重慶繼續學業，重慶學校伙食分量很夠，不像桂林學校只有兩餐可吃，所以家中大人回港時，他們還不至於太難過。此時這些孩子若教育或生活費用有問題，漢釗哥記得那時多向三叔在匯豐銀行一位姓吳的朋友求助，漢釗哥去的時候，吳會請他一起喝咖啡，他對吳家華麗的巨宅，印像非常深刻。

一九四八年漢釗哥中學畢業後，計劃去上海三姐姐與她美籍丈夫Henry Sperry家，預備參加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在上海舉辦的入學考試，但此時共產黨已開始控制中國東北及北京，所以父親去電要漢釗哥立刻回港，參加廣州嶺南大學在香港的招生考試，同時等待機會赴美國求學。漢釗哥離開重慶時，吳還去機場送行，翌年中國解放，就再也沒有吳的消息。



# 第五章

## 戰後：社會變遷

**戰**後香港市面殘破蕭條，其時中國爆發內戰，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令香港人口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之間，由原有的一百六十萬人，驟增至二百三十六萬人。僅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即有七十萬人由大陸蜂擁至香港，同年五月政府在邊界成立的配額制度證明完全無效。多數難民皆為無特殊技能的勞工階級，有些人在來香港之前根本不知香港在何處，但他們都立定決心要在香港工作定居。

父母親偶爾會在晚上接到由大陸逃至香港親友的電話。香港到處可見人們露宿街頭，滿街都是乞丐，山坡上有很多人住在由撿來的鐵皮和木板搭成的木寮裡。

那段時期共產黨在羅湖及文錦渡邊境地區，架起擴音器對香港喊話，整天播放宣傳口號，侮蔑英國人，特別是港英政府。邊界雙方互設崗哨對峙，若有任何人企圖由中國偷渡來香港，邊境中國士兵奉命對他們格殺勿論，但仍有人冒死逃亡成功，這也是香港人口增加的原因。

幸好我們有家可歸，庭園、果樹、雞舍及網球場一切依舊。祖母和她自己的子女在戰後搬回大屋，新婚的三叔，如我們在戰前一樣住在三樓，四叔在一九四七年由英國返港後，和五姑姐與祖母一起住大屋二樓。祖母的另一個女兒即二姑姐在戰前已出嫁。

我們家此時搬至利行左翼的頂樓居住，利行共有六個公寓住宅單位，左、右各三個，中央共用寬闊樓梯。我們樓下的單位空置，一樓則租給父親游擊隊時期的老朋友蘇雲(Shulwan)少校，他在中國時或許和英軍服務團有關係。他是英國工程師，能說流利的國語，從未成家，只對汽車引擎有興趣。當時他

是香港勞工處處長，下班回來總是見他換上工作套裝，一頭鑽進車底。他身材高大，穿著油污工作衣的模樣，令我看得非常入神，我們都稱他蘇雲叔。

二叔和他家人住利行右翼頂樓，二祖母住他們樓下，四祖母則住一樓，二叔的孩子常和我們玩在一起，所以我們玩伴很多。

住在利行時，我們兄妹三人共用一間大房間。晚上有個女傭會搭張床在我們房間，陪我們同睡，她常常一連幾晚的講大戲故事給我們聽。夏天睡覺時，我們的床上都要掛蚊帳，冬天就用大毛巾包好灌滿熱水的銅壺，然後用大扣針包牢，放在被褥中暖床。

雖然父親可稱得上是個富人，住的環境不錯，但我們家銀根仍不很寬裕。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穿母親為我們做的衣服，母親那時衣著簡單，只戴些假首飾。四歲半時我得到第一個玩具，是一九四五年我在香港首次過聖誕節時，父母親送給我的洋娃娃，童年時這個娃娃是我最喜愛的玩偶。

## 配糧及缺糧

**戰**後香港軍政府所面對的最大難題是，戰俘和戰犯的處置及遣返問題，加上關閉戰俘營，遣散武裝部隊及輔助防衛服務隊伍等。政府亟需工作人手，首次加重本地華籍及葡萄牙籍員工的職責，也因此令未來的香港政府，不得忽視這些非英籍員工的工作能力及貢獻。

香港戰後第一年，市民生活還是非常艱難，糧食仍是主要問題，糧食配給由聯合國糧食局控制，糧食嚴重缺乏對建設日漸增長的健全社會是一大威脅。香港政府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四日，委任父親為香港穀米糧食統制處處長，父親上任一星期後於政府新聞處對記者解釋，聯合國糧食局只能配給香港二萬噸米，為本港所需半數，所以必須增加麵粉及青豆替代<sup>①</sup>。月底他並向聯合國糧食局抗議香港配米不足，由九月開始至一九四七年間，配米量再減而增配餅乾和麵粉，情況總算穩定。到一九四八年，米價及麵粉價格開始上漲，父親為平抑米價，便一面維持米、麵配給制度，一面應大眾

需要，推出由泰國和越南進口的廉價米。一九四八年父親向政府辭去這份義務工作，但政府仍請父親為顧問<sup>(2)</sup>。

父親在任期間，精明強幹、公正無私，沒有任何人，甚至親戚朋友，可徇私多配糧票<sup>(3)</sup>。有一次我在學校遭受男同學戲弄，他說：「你爸爸是屎桶官」父親聽我告狀後，笑著說：「你去問問他吃什麼的。」

父親任穀米統制官時，與東南亞有「米王」之稱的泰國華僑馬祿臣成為好友。從那時開始馬祿臣每年必定送我們成袋的暹羅米，暹羅柚和芒果，泰國的白花芒果，我想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但因果實不宜長途運送，所以市面無法買到，父母每年必將這些禮物分贈給其他家人一起享用。這個習慣在馬祿臣去世後，一直由他的兒子沿襲至一九九六年我母親去世。

早年因物資缺乏，小型工業難以發展，父親曾盡力幫助這些小工業，像專做糖薑的余達之，和製糕餅的嘉頓等公司，他們都非常感激父親協助他們取得糖的供應<sup>(4)</sup>。以前在飯後常可吃到美味的糖薑，我記得裝薑的罐子特別好看。嘉頓在年節時常送糕餅給我們，而且在父親去世後仍繼續贈送。一九九五年母親去世前一年，嘉頓還送了一個非常美麗的聖誕蛋糕給母親。

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後，面臨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水荒，當年香港仍全靠積存在水庫的雨水供應用水，水庫水量不足時就開始限制用水。一年當中總有一段時間，一星期僅有兩天可供水數小時，高樓住戶常因水壓不夠經常無水。因為旅館不限水，有錢人至少還可去酒店旅館開房間洗澡，窮困地區市民須拿著盛水器皿，排隊在街頭公眾水喉取水，報章及電台經常報導有糾紛發生。這段時間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水荒的影響，水來的時候父母親總是叮嚀我們要節約用水，每逢輪水時傭人們必將浴缸和各種盛水器皿都儲滿水備用。

政府此時發現新完工的新界大欖涌水塘的儲水量，根本無法應付日益增加人口的需求。

## 健康問題

香港戰後的另一主要施政重點，就是改善市民健康問題，我記得政府派公共衛生護士來學校，給學童注射傷寒和霍亂預防針，我打完針不是手臂痠痛，就是有發燒的反應。我們做完肺結核試驗及種過牛痘後，傷口還須用有鐵絲的護罩保護避免抓傷，總之每逢這些「公護日」，我就怕得要死。

我天生有追根究底的個性，有一天我放學回家後，發覺父親比平日早回家，探問之下，才發現原來父親經常去紅十字會輸血，戰後早幾年中國人少有輸血救人的觀念，但他自己從未對人提起。

只要一提起戰後幾年的日子，就不由得讓人聯想到我們「杜蟲」的經歷，父親非常注重健康，對戰時中國及戰後香港的衛生狀況非常注意。每年秋涼的一個周末，我們全家須禁食一日，只能喝些薄粥，晚上父親就要我們吞服杜蟲藥。理論上是，我們體內的寄生蟲，在一天沒有其他食物的情況下，就會吸收我們吃下去的杜蟲藥。第二天一早，我們喝下極其難飲的橙汁和葶麻油的混和液後，體內的蟲和卵就應該會順利排出。每逢杜蟲的周末，不只是我們自己家人須禁食吃藥，若有其他親人在我們家時，也須一起參加。雖然堂兄妹很喜歡來我們家玩，但總希望能避開這件大事。可是父親從不事先宣佈，因為要他自己時間方便。父親要我們知道，若是人體內有蟲的話，我們平日所攝取的養份，就會被寄生蟲吸收，那麼我們就長不大了。他說的一點不錯，我真的看見我體內有寄生蟲排泄出來。

父親非常注重健康，他要我們養成每天晚間定時如廁的習慣，所以每晚飯後，我們三個孩子就排隊上廁所，哥哥坐馬桶，姐姐坐高痰盂，我就用小痰盂，我們經常只是坐著嘖嘖咕咕聊天，根本沒有做過什麼。

我們家在一九四七年有了第一艘叫天鵝號的遊艇，阿根是看船工人之一，父親覺得他患有寄生蟲，就逼他服用杜蟲藥。他為我們工作多年後，真的長高些，健康得多。

因我戰時多病，常引起中耳炎，父母親約在四〇年代末，發現我聽覺有問題。父親認識一位國內知名的眼、耳、鼻、喉科專家陳翼平醫生，大約父親在牛津期間，陳醫生亦在維也納受訓，當時國內許多有牌照的醫生，僅可在香港政府醫務署工作，但不得行醫。父母親非常信任他的醫術，便向他請教我失聰的問題，他診斷後發現我左耳膜穿孔，所以聽覺受損。父親非常心焦的定期帶我在放學後去看陳醫生。陳醫生在我耳內放了一片特殊的薄紙代替耳膜，並敷上藥膏，促進耳膜再生，在我悉心治療之下，我的耳膜終於長好，但我覺得兩耳聽覺還是有差別。

## 難民家庭

一 九四七年農曆新年，重慶陶家的親戚盛樹珩和朱翹仙突然來訪，令我第一次感覺中國的動亂。他們二人在一月份時，搭機離開上海計劃來香港領取赴美簽證，飛行途中因天候惡劣須轉飛馬尼拉，後來飛機四具引擎中的兩具著火，失事墜入中國海。機上三十六位乘客中有七人喪生，其餘生還乘客的救生筏在海上漂流了三十小時後，才被美國船救起，住院就醫兩個星期後，盛樹珩和朱翹仙終於到達香港，在等待美國簽證的大約一個月期間，父母親歡迎他們住在我們樓下空置的單位，和我們一起用餐，我當時六歲非常喜歡聽他們的事。他們取得赴美簽證後，便回上海預備赴美。

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間，有許多來自國內的親友借住利行，不知當時是因香港住屋短缺，或只是暫住，曾經有三戶人家在同一時期住在我們樓下的單位。利行的孩子都很歡喜能有更多的玩伴，但由大人的談話內容，讓我意識到國內動盪不安局面的嚴重性，也了解這群新玩伴的友誼只是暫時的。我也很清楚他們在我們家擁擠不堪的居住環境，看到人們因戰亂被迫離鄉背井，總是很難過。

母親的姐姐瑤珠姨媽帶著六個孩子，由上海逃至香港後，便暫住我們樓下，當時這個單位有三個家庭借住。姨丈鄭兆祁是個資深工程師，仍想留在國內出一份力，所以未隨同家人來港。一九五〇



年時，他覺得國內局勢已漸穩定，便來香港接家人回上海。因韓戰問題，為避免正值兵役年齡的長子被送到戰場當「砲灰」，所以他們將長子留下與我們同住，可是不到兩年時間，他們其他的孩子又一個個的逃回香港。

另一家是陳氏夫婦和四個孩子。陳是前文提過的律師朋友，她與父親同時在二〇年代，於英國求學相識，她在英國讀法律，並受訓成為律師，夫家是國內的政要。我對她印象最深的，不只她是位幹練的律師，而是她手飛快，可在一天之內針織好一件衣服，最神奇的是甚至午睡時，她的手也可以不停的織衣服。

第三個家庭就是父親在廣州工作時的上司劉紀文一家，帶著太太和孩子同住利行。劉太太美麗優雅，善長書畫，他們一家住利行時，我每天放學後，都去樓下看她作畫，她知道我有興趣，就教我研墨上色、用毛筆，不知不覺中，我已坐在她桌旁，她開始教我畫畫了。劉太太告訴母親，我很有藝術天份，應該學繪畫。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在蔣介石帶領下撤退至台灣。

## 房屋問題

**戰**後父親不僅透過政府，更加上自己個人的力量幫助香港市民。一九四六年父親被推選為太平紳士，職責為在太平紳士法庭裡做法官，解決像違規設攤小販等這類案情不重的案件。一九四九年英國政府為表揚父親對香港社會的貢獻，尤其在擔任穀米統制官時期的表現，特別頒發大英帝國官佐CBE勳章。父親在一九五三年成為市政局議員之後，立刻大聲疾呼政府重視屋荒問題，他呼籲大企業與政府合作為員工興建廉價屋宇，並提供合理利率的分期付款方式購屋，由此亦可增進僱主與僱員之間的良好關係。同時他也提出大眾對公共衛生缺乏認識，建議政府印製簡明的宣傳單，教育民眾<sup>(8)</sup>。

屋荒危機嚴重影響公共衛生，窮人多半住在木屋，甚至露天而居，或向舊樓業主租用天台搭建木



屋。這些居民居住環境惡劣，連廁所和自來水都沒有<sup>(9)</sup>。

一九五三年聖誕節，香港木屋區一場大火燒傷五萬三千人，政府方察覺香港總人口有三分之一為無家可歸的難民，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使他們融入社會實在刻不容緩。於是便開始策劃龐大的徙置計劃，供給廉價而較安全的房屋，清除違章建築的寮屋。但政府的整建計劃永遠無法趕上難民增長的速度。

一九六一年，父親以非官守立法局議員身份，在立法局會議中批評政府工作效率太低。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宣佈計劃徙置七萬五千人至政府公屋，但根據父親所得資料顯示；至一九六一年二月時，僅三萬二千四百三十二人獲得徙置。他催促政府簡化作業程序，加速徙置木屋居民，優先供應公屋給月入港幣三百元以下的市民<sup>(10)</sup>。

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山坡的違章建築木屋漸由政府的多層公屋取代。這些難民得到安置後，大部份成為香港工業化的中堅份子。

## 難民與工業

一 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韓戰期間，聯合國向中國禁運，對香港轉運貿易打擊甚大，所幸一些難民不僅為香港帶入大量資金，同時也注入工業技術的知識。根據統計，這段時期移民在香港投入約港幣數億元的資金，同時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有二百多家上海的公司行號，轉在香港註冊。

香港當地的工業在中國東北工業家推動之下，令香港日趨工業化並建立起國際銷售網<sup>(11)</sup>。香港本島缺乏天然資源，大量難民的到來，令香港技術性及知識性的人力資源不虞匱乏。香港的成衣業多數皆由這些新移民開創，設立工廠，造就了大量就業機會。五〇年代開始，即可見到愈來愈多「香港製造」的商品，漸而取代四〇年代末期「日本製造」的商標。為使香港在國際商場上更具競爭力，對科技及各類人材的需要更顯迫切。

愈來愈多的工廠興建後，香港的社會結構也起了重要的變化，傳統中國式的住家女傭逐漸消失。原本這些婦女皆來自珠江三角洲的絲坊區，她們在村莊附近的紡絲廠工作，當經濟蕭條工廠結束後，就紛紛遷至廣州、澳門和香港。這些不幸的女工多為文盲或半文盲，唯一生路即為幫傭，其中很多人一世做「梳起」女傭終生不嫁，也有些是寡婦喪偶之後不再嫁人，她們之間形成一個「姐妹團」，精神上互相安慰，有時經濟上亦互相支持。她們從不修剪頭髮，都將長髮編辮梳起，年紀較大的就在腦後梳髻，我很喜歡看她們用市場買的木刨花油，整理她們的頭髮，令髮絲光亮清爽。

香港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勞工需求也大為增加，吸引了大批原本做女傭無特殊技能的年輕女工，加入勞力市場，華人女子不願再為人幫傭。年輕人在工廠打工，可以和自己家人生活在自己的空間，只有年紀較大的女傭寧願繼續留在服務多年的僱主家。政府津貼的公共屋宇，提高許多市民的生活素質。家庭幫傭的勞力市場，則由香港僱傭介紹所帶入的菲律賓籍及後期的泰國籍女傭所取代，至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的家庭幫傭，幾乎全來自東南亞國家。

從公眾場合開始聽到上海話，加上街頭飄溢的上海炸臭豆腐味，令我真正感到香港在變。有錢人由中國逃至香港時，總是儘其所能的將值錢細軟帶出，據我所知，在香港常有人將手邊的珠寶變賣求現，作為設工廠或其他營生的資本。後來幾年有位我們叫「上海婆」的珠寶商，常來我們家向母親兜售她手上客人託賣的特別首飾。她身材圓胖，來的時候常穿件很普通的鬆身旗袍，但內衣裡縫有各種不同的暗袋，我每次都是用無比欽羨的眼光，看她解開旗袍鈕扣，然後由各個暗袋中拿出最精美的首飾。我總是盼望上海婆能在我放學回家後來，有時我運氣好的話，剛好她晚來，我就可以湊熱鬧。見她獨來獨往的帶如此多的貴重物品，不禁擔心她的安危，但想想亦非我所該問的問題。

# 難民與教育

父

親開始積極參與四邑工商總會（祖居同鄉所組成的團體）、灣仔街坊福利會（社區互助團體）、東華醫院（貧民醫院）和保良局（保護婦孺組織）等草根階層團體的義務工作。他投入大量時間為窮困市民籌募冬衣、舉辦一般義診、免費醫牙、提供學雜費全免的小學教育，更對貧苦民眾捐贈國人非常重視的棺木。加上父親對教育的熱心，他經常應邀參加學校的頒獎及新校開幕典禮，這些多數為難民而設的華人學校，需要像父親這類的人士提昇他們的校譽。父親一生對需要他幫助的人，總是竭盡所能的給予協助。

戰後香港學校情況一片混亂，許多校舍都被摧毀或嚴重受損而無法使用。中國難民大量移入後（二）香港校舍極為短缺，任何可使用的建築物都充當課室。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學年中，我共換了四間學校，其中兩間很短時間即不存在。

五〇年代香港主教何明華（Rev. R. O. Hall）牧師為難民子弟成立勞工子弟學校，但香港殖民地政府懷疑這些學校宣傳共產主義（三）及灌輸反英思想，便關閉了數間學校，有時還將教師遞解出境（四）。一九五三年教育法例及附屬條文規定，禁止學校有任何政治活動，包括討論中國當前之政治，及香港殖民地政策。

政府實施三班制上課制度，同一校舍分早班、午班、及夜班三批師生使用。一九五二年時我哥哥和姐姐已去英國讀書，我和弟弟很幸運的在聖保羅男女中學，編在早上八點開始上課的早班。

我後來才知道伍英才一家當年就是因為香港缺糧和學制混亂，決定繼續留在環境好得多的加拿大。

# 第六章

## 美好的年代

戰爭結束至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我們一直住在利行，那段歲月，對我來說是多采多姿的。利行孩子多，從不缺玩伴，我最愛在園中自由自在的玩耍，吊在樹桿上採水果，或在雞棚趕雞，我的膝蓋經常是傷痕累累，腿上滿是蚊虫叮咬留下的斑斑點點。園中叢樹開花飄來的陣陣香氣，最令我陶醉，花開時，母親髮髻中常插有幾朵香花。我也喜歡聽夏天的蟬叫，現要我只要聞到茉莉花香，或聽到知了叫，就會憶起我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

我們這群孩子在院中用幾塊板子搭了一個屬於我們的小「俱樂部」，裡面有幾張長椅和木凳，最重要的設備是一個小炭爐。每個星期六晚上，所有的孩子就聚在俱樂部講故事、烤蕃薯吃。有一次姐姐在學校考了第一名，便為我們的周末俱樂部向祖母討賞，當晚祖母便要廚房做了一隻太爺雞，送到「俱樂部」請我們吃。一群孩子當中數我年紀最小，所以只有在一旁聽、看的份，雖然每次都非常興奮，可以和大伙人盡興的玩到任何時間，但聽完大孩子的鬼故事，又怕得要命，散場時，大孩子總是會邊叫著「鬼來追我們啦！」然後一呼而散，偏偏我又跑不快，一定落在最後。

有一晚我半夜醒來，看到一個長髮白衣的女人身影從我們房間移動到洗手間，我第一個念頭閃過，就是母親說戰時利行沒有死過人，便自我安慰的告訴自己，既然屋內沒有橫死的冤魂，我們就不會受到傷害。

另一晚我又看到一個白色的女人身影，站在我 and 姐姐的床中間，起初還以為是女傭，便坐起來查看，當我看到她仍在熟睡時，嚇得我動也不能動，叫又叫不出，只見那白色身影越移越近，走向姐姐的

床，用長長的手指甲觸摸她的蚊帳。我就一直告訴自己，她不會傷害我們的，因為我們從未做過虧心事，後來我就昏睡過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我詢問之下，發現女傭並未在半夜起來弄過姐姐的蚊帳，但我不想增添父母親無謂的煩惱，所以從未對他們提起此事。

直到今日我仍無法解釋我所見到的影像，但記憶卻依舊是如此鮮明。

我們住在山坡上的利行四周樹林環繞，有許多野鳥，但父親仍喜歡在家中養鳥。我們養過鸚鵡和幾隻金絲雀，父親常為鳥換水、餵穀食，籠中還放有一塊墨魚軟骨。父親最喜歡一早聽掛在陽台的鳥唱歌，有時還會引來林中的野鳥一同唱。我們的廚子也常在廚房後面餵來訪的黑鳥。

那幾年香港有許多人吃不飽，我們的廚子常將廚房剩下的菜飯分給他們。有一清晨，我被父親對著窗外的喝斥聲吵醒，我從窗口望去，只見一男子腋下各挾著一隻雞，由利行山坡奔向灣仔，一看就知道他是爬進園中雞舍的偷雞賊，他剛要逃走時被父親發現。

有些專收破爛的男人，常定期挑著扁擔來我們家收購舊瓶罐，這是戰後香港資源循環再生的方法。

父親每天很早起床，母親則相反，所以我們常和父親一起吃早餐，他先將深咖啡色濃厚的魚肝油放在我們面前，每人吃一湯匙，然後一定要看著我們吃早餐時，吞下兩種維他命和鈣片。他一直保持著英國習慣，早飯吃醃肉或醃青魚加蛋，若廚子早去市場買到魚的話，我就吃片煎魚。

父親早上心情最好，是他每天最好的時光，香港學校八點即開始，他喜歡自己開車送我們上學，然後一早去辦公室，甚至比打雜工人還更先到，我問他為什麼不要司機送我們，他說：「阿莫住九龍，我不想要他一早過來接我，他可直接去寫字樓向我取車，然後開回家給媽媽用。」但我認為父親是喜歡自己開車送我們上學。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雖然父親嚴肅而守舊，但他是我們的支柱，極受大家的敬愛。我幼年時非常沉靜，對周遭的事物聆聽吸收，我想父親從來不知道我對他的景仰有多深。我才幾歲大時就知道自己已有和父親一樣的剛強個性，有一次我才五歲，父親堅持我一定要吃完午飯才可離開餐桌，但我不能，就頑強的坐了幾個鐘頭不肯繼續再吃，最後父親只好讓步。從那次以後，父親才接受我的硬脾



氣，知道我對自己的事一定要能自己作主。

幼年時我話很少，而是聽的時候多。我們在家都用廣東話交談，唯有在晚餐時，父母親不想傭人知道他們的談話內容，多用英文交談。為了要了解父母親說些什麼，我就加緊學英文，非常用心的訓練自己的聽力，結果在未說英文之前我已經聽得懂了。

此時大家都知道我好查根究底，母親被我問煩的時候說，她只要對我略提某人，我就要知道全盤細節，甚至人家肚腸的長相都要知道。

姐姐於一九四七年在拔萃女書院寄宿，父母親見她在外住校非常愉快，便決定將我也送去，但我每星期日返校時就哭哭啼啼，不肯回去，父母親只好將我轉到聖保羅男女中學上午的三年班就讀。

我的學校經常有表格須要填寫，其中一欄是父親職業，我多半填上「工程師」，但後來覺得似乎不妥，因為父親做這麼多不同的事，而且我知道他決非以做工程師為生。有一天我便決定要一問究竟，到底他的職業欄應該填什麼，他想了一下才說：「就寫公司董事好了。」

利家在南灣有幢小屋，夏天我們去游泳時常用來更衣。當時我們家的汽車是由司機阿莫開的，但父親喜歡在周末自己開車帶我們去南灣游泳，平日也一定親自送我們去學校。香港的夏天又濕又熱，令我們常長瘡癤，父親說海水能治瘡癤。每次去南灣游泳，經過南邊曲折山路時，總讓我想起趴在中國銀行卡車上逃難的那段路，然後就必定暈車，一路上父親要為我停下來好幾次。

有一天我們在南灣游泳時，父親問我喜不喜歡在南灣有幢我們自己的房子，令我非常興奮。但他擔心此區太過偏遠，治安會有問題，幾年以後他才改變初衷。

一九四六年時，我感覺到家中有一股新生命的滋長，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弟弟志剛便來到人間。

## 休閒出海

父親熱愛陽光和清新的空氣，一九四七年他經濟情況許可後，便買下第一艘名為天鵝號的遊艇，父親一生共有四艘遊艇；其他三艘分別是五月花、富都及亞特蘭大號。我最喜歡坐船出海，後來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份。父親常在周末帶著我們出海，有時會去香港仔的水上海鮮畫舫吃飯，但後來香港仔海水污染嚴重，父親就不許我們再去那裡的餐館吃飯。

父親說香港外島水域有海盜，所以從不讓我們在船上過夜，但拗不過我們的苦苦相求，終於將船停在銅鑼灣避風塘內，讓我們過了一晚。當晚船伕為我們在水面上點了盞燈，大家還捉到好多墨魚帶回家給正在坐月的母親。

那時香港尚未有人口過擠和空氣污染問題，仲夏日落風景最美。我每次在海上看日落時，總是想將雲彩形狀烙在腦海裡，因為那時我還小，遊完船河天黑回家時，已不支睡著，要父親抱我上床睡覺，我要第二天一早起來，將日落晚霞在我水彩畫中描繪出來。父母親非常珍惜我的作品，和喜愛我欣賞大自然美的天性。

坐船出海是父親最喜歡的休閒活動，在船上家人可享天倫之樂遠離塵囂。我們小時候父母親很少在船上招待朋友，因為父母親出海的時光是屬於家人的，經常只請親人及我們的同學一起出海。

香港早期很少人有私人遊艇，所以我們能去到許多未受污染的海灘，那時海水清朗沙灘潔淨，可將挖到的貝蛤帶回家吃。我們在一般人無法來到的島嶼，可以觀察並觸摸到不同的海洋生物，我曾經摸過一條小章魚，及在淺水地方看到小鯛沙魚徐徐遊過，出海時在我們船邊還見過海馬，我也曾用手帕捉到透明的海蝦。我們的船伕都是住在香港海邊艇仔的水上蛋家人，由這些人之中我們學到很多海洋生物的名稱和生態。

父親是個非常有公德心的人，當他讓我們盡情在海灘玩耍的時候，他就和船伕一起清理海灘的垃圾，收集棄置的瓶罐和尖銳的石塊。我因耳疾，始終無法學會游泳，但在淺水的海灘我自己學會了

游泳，我一定要將頭抬高過水面，否則很容易得中耳炎。退潮時我喜歡守在岸邊看著沖上沙灘的有趣小生物，即使現在我去海邊，還是喜歡等海水退潮。

記得有一次我們的船靠在一個有很多水母的海灣，這些有像雞爪般的毒水母對人體有害，父親便要船伏儘量的將水母撈到岸上，牠們在太陽之下就融化成水。

夏天因陽光炙烈，我們都在午後出海喝下午茶，有時也在船上吃晚飯。遊畢回到港口時，水面被萬家燈火倒映得燦耀燦爛，我依然記得那種帶有鹹味的海風輕拂在面上的感覺，這些珍貴的時光都是我最美好的回憶。現在新增的填海地皮令香港海灣狹窄，及航行交通擁擠不堪，以往風貌已不復有。

冬季我們就早上開船，中午在外野餐，飯後休息片刻就在外島徒步遊覽。在這些小島上我們見到非常簡陋的墓穴，和子孫為先人撿骨的骨罈。我們也見過百年以上殘破老屋及蕃薯田，這是島上原有漁民、農民和種香木外銷中國大陸的工人居住的。看到這些村民生活的情況，令我驚嘆不已，世代相傳至今，他們的生活毫無改變，也未受香港發展影響。我們多半在傍晚轉涼之前返航。直到現在，若我們冬季返港的話，我還是喜歡去外島走走。

在這些小島上，週年都可看見漁船傍晚返航，有一次我們在岸邊時，一個漁人向父親兜售狀如半開扇的一種干貝，蛋家人稱它沙又，我很驚訝的在他打開的干貝殼內發現有小珍珠，漁人告訴我們，這些有珍珠的貝類是他們從海底採集干貝肉時撈起來的，但失望的是父親什麼也沒買。

在海上我們最愛用漁線釣魚，常釣到色彩鮮艷的魚類，但我父母親就不釣魚。對我們釣上的各種魚類，總有問不完的問題討教船伕，而學到不少海洋生物的知識。有幾次在海上遇到漁船靠近我們遊艇售賣活魚，從他們打開的船艙中可見到許多色彩鮮艷的活魚，父母親會買一兩條回家吃晚飯。

我最喜歡一九五〇年代中我們的第三艘遊艇富都號，因為它夠大，我可以和同學、堂兄弟姐妹和叔叔姑姐，一起在船上野餐。四個孩子中我交遊最廣，對這類戶外活動也最有興趣。船上孩子多的時候，四位船伕為照顧我們忙得團團轉，孩子游泳時又要警告他們躲避水母，有一次一個親戚的孩子正從船邊游泳扶梯爬出水面時，被一隻藍色水母的黃觸鬚碰了一下，立刻中毒，必須緊急送醫治

療。

## 利行和大屋

利

行家中客廳窗外景觀很美，可見山坡及瀑布，其中一個的瀑布下方，有人用石塊堆積成小池，夏天時街頭孩子常去池中戲水，雖然我們不准下去，但我喜歡看他們玩。

祖父在大屋園中遍植木瓜、龍眼、番石榴、枇杷、芒果、黃皮和荔枝等果樹。孩子最喜歡從樹上採水果吃，木瓜成熟時，因樹幹太直太高爬不上去，我們就在木瓜樹下鋪件舊雨衣，再用長竹桿將成熟的木瓜挑下來，大家立刻就地大吃起來。我們這些孩子在園中蕩鞦韆、溜滑梯、騎單車，和踩二叔為我們做的高蹺，還常在噴水魚池中撈蝌蚪、看金魚，大孩子可在園中籃球場打球。

偶爾，我們會去大屋向祖母請安，她總是很嚴肅的坐在同一張椅子上。有時也會和大屋持槍的錫克警衛南星聊天，他還給我們看過他捉到的蛇。傍晚工人四處找我們回家洗澡時，我們就躲在祖父在園中造的假山山洞裡。

利家人住利行和大屋時，大家走的很近，我們常去向二祖母、四祖母，及幾位叔叔、姑姐請安。大屋中有供奉祖先牌位的神台，特殊節日時我們會去祭拜。但二祖母和四祖母在她們自己家中，都設有佛堂供奉菩薩，我們比較常去二祖母處，因為她是父親的親生母親，看到她對信仰的虔誠，和一種自然流露的平和寧靜，令我心神嚮往。我也最喜歡看她咕嚕咕嚕的抽水煙，然後吐出嫋嫋餘煙。二祖母每天一定在上午和下午固定時間，在自己佛堂內，換上褐色拜佛布袍來燒香拜佛，她跪在佛像前，口裡唸著佛經，手中捻著佛珠，她拜佛唸經時全神貫注，不知我們常在她身後調皮搗蛋做鬼臉。

二祖母樂天知命，我從未聽過她有任何抱怨，與家人和睦相處從無糾紛，提起祖父時總是充滿尊敬的口吻。身材瘦小的二祖母，以堅定樂觀的天性，得到全家人的敬重，祖母去世後，她便成為家



中的大家長。

每逢父親農曆生日時，二祖母一定不假人手，親自在院中用乾稻草，古法慢火燜一道芋頭鴨給父親吃，這是父親童年最愛吃的鄉下菜。後來在五〇年代由利行搬到嘉蘭大廈後，她就改在較為現代化的廚房做這道菜。

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時，父親被選為第四及五屆的亞洲及遠東地區經濟委員會香港代表，五〇年代初，又擔任許多政府不同委員會的委員，同時亦是市政局議員。因他在政府和工商界的社會關係，父親常須設宴招待各方朋友，所以母親是個非常忙碌的女主人，我們雖住利行，但宴客都在大屋，我記得那時父母親穿戴整齊，由利行走下花園去大屋的樣子。雖然宴會菜餚都是酒樓預備，但母親仍須細心安排菜單、鮮花、客人名單、安排座次，及擺設佈置等細節。父親在社交圈有句名言：「客散主人安」，父母親舉辦的宴會都以早聚早散聞名。

五〇年代初時，大屋一直是我們的生活的重心焦點所在，所有重要的家庭團聚、聖誕宴會和婚禮，都在大屋大廳舉行。農曆年初一，女孩子都要穿上不是紅即粉紅的棉袍，我還要戴上小金耳環和手鐲，跟隨父母親去向祖母拜年。然後在大年初二，穿同樣的新衣去外祖父家拜年，與母親的家人團聚。中國人喜歡代表吉祥的紅色，所以我幼年的衣服不是紅色就是粉紅色，令我日後對紅和粉紅色的衣服非常有排斥感，差不多在四十年後，我才再穿粉紅色衣物，但還是不穿紅色。

外祖母偶而來利行看我們時，就住在我們樓下空置的單位，因他們住九龍，當時過海不甚方便。有一天我放學回家，剛好外祖母由利舞台看完愛路扶連(Elmer Flyn)的戰爭片回來，有點頭痛，便向一位工人索冰袋敷頭，豈知工人回來時，當年才六十多歲的外祖母就因中風去世。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經歷失去親人，在我心目中她永遠是慈祥美麗的外祖母。



## 僕人和小販

當

時香港富有的家庭都有大批的僕人，包括有廚子、洗衫婦、保姆、一個或兩個做一般家務的僕人，另外還有幾個園丁和一位司機。二祖母一直有個小女孩「妹仔」在她身邊，中國窮苦人家無法養育子女時，常將年幼女兒送給有錢人家做「妹仔」。依照中國舊時的習俗，「妹仔」的薪酬多交給她的父母，但兒子決不送人。「妹仔」到新家學做家事，以換取食宿，長大後，她的主人必須為她找個人家嫁出去，但也常有「妹仔」遭受虐待事件發生。二祖母的「妹仔」除了做輕家務之外，也為她按摩。

雖然父親自始一直反對「妹仔」制度，但從未干涉他母親，直到戰後香港政府禁止私有「妹仔」制度之後，父親才出面要二祖母遣散她的「妹仔」。我不清楚二祖母有否將「妹仔」嫁出去，但我猜想多半是送她回家，因為她只是個小孩子。在我們自己家中每個工人都有支薪，所以我對這個風俗不甚了解。我一直以為只因僕人年紀小，所以才叫「妹仔」。

有一天我放學後，一位父母親朋友的「妹仔」即將嫁到美國，所以來我們家辭行。她告訴母親她正在學英文，做赴美準備。我聽後才開始對「妹仔」習俗多些了解。

我注意到父親在日常生活中，對他周圍的人十分關心，經常與手下員工交談，幫助不同的人。每天我都可以看到他對待我們身邊的員工，從無一句重話，只有體諒和關懷，總是儘量想辦法改善他們生活，有時甚至員工能有更好的發展須離開我們，不再為我們工作。

我弟弟嬰兒時有個保姆叫阿南，有一天她發現自己吐血，沮喪地要自殺。母親帶她看過醫生後，發現她患有肺結核，父親便負擔費用讓她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並讓她長期接受治療。阿南病癒後便沒有再出去幫傭，結婚後生了幾個孩子。五〇年代初恩平路上的嘉蘭大廈剛落成不久，阿南請求父親幫她做個小生意，父親便在嘉蘭大廈靠街面，行人來往的樓梯間旁，給了她一個攤位賣拖鞋和書報雜誌，生意不錯。從那時開始她就要免費送我們全家她賣的東西，因為她拒不收錢，我們只好告訴她家人不看她賣的這類書報雜誌，但她堅稱拖鞋總可派上用場，所以就硬將拖鞋塞給我們。父

親去世後母親搬離崇明大廈時，我還見過阿南一面，崇明大廈就在她擺攤位的嘉蘭大廈對面。

我們家在一九五一年搬到使館大廈後，有個男工叫阿文，父親覺得阿文天資聰穎，應該繼續讀書充實自己，便送他去夜校讀英文，後來學製圖。有時父母親在家中舉行宴會那天正逢阿文須要上課或考試，但若父母親實在需要他幫手，阿文也只好缺課。我記得他去上課時，常穿著父親給他的西裝和領帶，儀表非常整齊。阿文還會用母親的英文食譜學英文，能做出很好吃的橙味鬆軟蛋糕。阿文唸完製圖課程後，就離開我們家另謀高就。

一九六〇年代末，有一次我們回香港時，見到家中的新廚子阿吳，她是我們從前所住崇明大廈的清潔工。父親見她工作非常勤奮，便要她來我們家學做廚房家務。阿吳後來在我們家工作多年，中間有時因和母親有些意見不和曾經中斷過，但最後總是會回來工作。對我和我們的孩子來說，她就像自己家人一樣。她在我們家工作期間，父親還幫她們夫婦買了一間公寓，讓他們不愁住處可安心工作。父親去世阿吳退休後，她覺得對父親的恩德難以回報，在母親晚年時阿吳還回來照顧她。最後一次在一九九六年十月母親的追思禮拜中，我還見到阿吳。

父親雖然稱得上是有錢人，但他身上永遠只有少許零錢。李樂君是在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初期，為父親工作的秘書，大家都稱她李姑娘。她說若扒手要偷父親的口袋，那才真是白費心機！但身上沒錢有時總是不方便，李姑娘記得有一次父親在希慎道上的辦公大廈前，見到一個水果攤販，便想向買他幾個梨，但身上沒錢，上到辦公室後就要李姑娘去為他買幾個梨帶回家。李姑娘便差辦公室的小雜工下去買，他對小販說：「我是大老闆利先生派我來的」，嚇得違規設攤的小販連忙說：「我馬上就走」。後來當小販聽小雜工說父親只是要向他買幾個梨時，立刻要免費贈送，但父親定下規矩決不受禮，所以原本十元買八個梨，結果小販給了二十個<sup>③</sup>。父親對梨價完全不知，還以是公平交易呢。

# 使館大廈

當

年逃至香港暫住利行的親友，在五〇年代初時都相繼離開，此時我們家正預備遷至位於希慎道上的使館大廈新居，使館大廈是利氏家族的第一幢大廈。

我們搬進使館大廈前，父親常將大樓設計圖帶回家研究，我們住頂樓兩層，有全層的屋頂花園，由母親親自設計佈置，父母親常在香港大街小巷，搜購各種有趣的裝飾品和古董，用來裝潢新居，他們非常興奮從此不必再去大屋請客，可在自己家中招待朋友。

大樓頂層設有大水塔儲水，每當大廈輪水時，便先將水輸送至水塔內，大廈住客就可免受水壓不夠無水之苦，我知道父親不只是為我們自己方便，同時也是為其他住戶著想。日後我們家族其他的大廈都沿用這個設計。父親對利家建造的建築物非常引以為榮，這些大廈不但設想週全而且堅厚牢固，颱風來襲時分毫無損，不像許多其他高樓遇狂風暴雨時常發生塌樓危險。

搬進使館大廈後，父親一如以往早上自己開車送我們上學，順路也送其他學生。我一位姓程的同學家離我們家最近，父親也常接她上學，接了她再去大屋門口接阿煥，她是祖母廚子的女兒，在聖心學校讀書。

我的生活在搬進使館大廈後有了極大的轉變，沒有花園讓我嬉戲玩耍，我變得非常用功讀書。如同多數的香港學生一樣，我也有個家庭教師，陳小姐每天放學後來教我數學。所有學科中除了數學之外，其他科目幾乎是不可能得八十分以上，所以為提高我的平均分數，我必須要在三項數學科目考試拿滿分。

我中學第一年的校長Bobby Kotewall小姐，在學年成績揭曉後當天晚上打電話告訴母親，我得了全班四十名學生第一名的好消息，令母親聽後興奮的整晚睡不著覺。聖保羅男女中學素以學業高水準聞名，能得第一實非易事，我認為陳小姐的功勞很大。其中有一位老師在第二年問我：「以妳的家庭背景，我真不明白妳這麼用功做什麼！」這句話到現在還有人問我。

父母親對我的表現非常欣慰，還特別在家中設謝師宴，請我的老師吃中飯。我的美術老師送了一幅很大的國畫給父母親，是他自己所作的桃花，色調與我們家淺藍色的飯廳十分協調。父母親非常欣賞這幅畫，直到母親去世前一直掛在飯廳。

搬到使館大廈後，我就開始學國畫，而且學得非常投入，暑假時每天早上都去上國畫課。我第一位老師是香港很有名的畫家鮑少游，住的離我們不遠，所以我常自己走過去上課。我也學過鋼琴和聲樂，但聲樂只學了一年，因為我發現自己音域不夠廣，雖然我還是很喜歡唱歌，但沒有繼續學下去。所有的課餘活動中，繪畫還是最愛。十三、四歲時，我整天埋頭苦讀，毫無興趣出去玩樂，閒時就是畫畫。我臥房內另外有長畫檯與書桌完全分開，所以我的畫具紙筆永遠在我手邊，不必為做功課而移開我的畫具。在七〇年左右，父親找到一些我初學作畫的作品，還特別寄來多倫多給我。

搬到使館的頭幾年，我和哥哥常在課後或周末去南華體育場騎單車、放風箏，但令人洩氣的是我老是無法讓風箏飛起來，大概只有一次成功的飛起了風箏。夏天將盡時我們自己做捕蟲網，在住處對面利園部份夷平的山坡上，捉到很多大蜻蜓。有一年過中國新年，哥哥將炮竹放在玻璃瓶內燃放，像炸彈一般爆炸開。

住希慎道使館大廈期間，對面的利園山逐漸在我眼前消失，只見山坡一天天的變低，男女工人不斷的將砂石泥土，由山坡一擔擔的挑下，倒在卡車運走。偶爾會聽到炸藥開山的爆炸聲，父親珍藏了許多在炸開的山石中所發現的天然水晶，他將幾塊大的水晶配上雕花木座，部份送人之後，其餘自己留下。

開關利園山時還發生了在山坡挖到觀音像的趣事，為忌觸犯神明，無人敢移動這尊神像，令工程停頓，所以只好請和尚尼姑到工地燒香誦經，然後挑選黃道吉日，經他們做好各種法事準備工作之後，才很正式的將這尊觀音像移至新界的一座廟宇供奉，這樣利園開山工程才得以繼續。

開山期間還有一口古鐘出土，根據鐘上日期記載，此鐘是約在二百多年前嘉慶元年時，一戶盧姓農家為還神謝恩，將這刻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古鐘捐獻給當地廟宇。父親對這口數百斤重



的鎮山古鐘非常引以為榮，並特別訂製巨型的紫檀雕花木架懸掛此鐘，此後便成了我們客廳最主要的陳列品。

住進使館大廈後，我就可以看到父母親在宴客時如何招待朋友，宴會都在樓上舉行，臥房全在樓下。父母親請客時，都是酒樓廚子來我們家做中式酒席，酒樓將爐灶鍋盤等廚房器具，全搬來我們樓上的宴客用廚房（平日做飯的廚房在樓下），做準備工夫及烹調。放學後我喜歡去廚房看看菜式，若菜單內有冬瓜盅的話，湯內的菜蔬都精雕成各種不同的魚、鳥和蝴蝶形狀，然後再去看母親的鮮花擺飾，決定明天要畫的題材。就寢之前我最愛躲在中國屏風後面，看著燭光下閃閃發光的銀燭台和清亮的水晶，杯觥交錯間聽大人的談笑。宴客時母親一定用最美的中國鈎花檯布和餐巾，中式宴會就排三圓檯每桌八人，西式宴會（中國食物西式上菜）就用二十四人的長檯。我們家請客只吃中餐，父母親的猶太朋友，因為只能吃合猶太教律潔淨的食物，所以他們都在家中先吃過晚餐才來我們家參加晚宴。

在那幾年父母親請客時，我常見到國偉三叔和三嬸來我們家，國偉三叔是父親的堂弟，當時在恒生銀行任職，父親對他非常看重，認為他極有發展潛力，所以盡量利用機會，介紹他多結識自己的朋友。時至今日國偉三叔已是爵士，為香港社會的知名人士，不但擁有許多其他銜頭，亦是恒生銀行現任的董事長。

熟知父親的人都知道他的作風，他從不看電影，最令母親失望的是，他也不跳舞。若有任何公司的董事會需要與明星周旋的話，他決不加入。他也從不賭錢，我們家平日不許打麻將，母親只有一年一次在她生日的時候，才可以和她的姐妹打麻將。父親熱愛他的工作，他唯一的休閒活動就是坐船出海享受大自然。

有一次父親一位生意朋友開的五月花舞廳開幕，邀請父親參加開幕酒會，父親對這類應酬從不參加，但樹源叔公一定要拉父親同去。去到見舞廳設在二樓，只有電扶梯可上，結果父親上了電扶梯到二樓，轉頭就搭電扶梯下樓出來，這樣就表示他已參加過了酒會。

我們搬到使館大廈後，每年的家族聖誕團聚都在我們家舉行，雖只限近親，但人數也超過一百，



每個孩子和男女青少年都有禮物，同時也會預備幾份禮物給大人抽獎。我最有趣參與預備各種聖誕禮物，其中包括不少日本玩具。

一九五三年聖誕我們沒有在家請客，因為父母親應父親老友「泰國米王」馬祿臣的邀請，帶著我和弟弟一起，坐馬家由香港返回泰國的商船去曼谷，這是我初次坐船旅遊，那真是一個奇妙美好的旅程。我們有自己的私人艙房，並與丹麥船長及他的副手同檯用餐。看到海上的飛魚在我們船邊滑躍而過，令我雀躍不已。

在船上有一天清早，父親叫我們起來看船駛入曼谷方向的海灣，旭日初昇，兩岸水邊叢林繁密，只見曼谷廟宇的輪廓，出現在橙黃色天空的背景中，然後再見一個火紅的光球由廟宇後面冉冉升起，不禁驚嘆造物的神奇了。

在泰國我們住進東方酒店，在河邊的餐廳用餐時，餐桌上都置有蚊香驅蚊，日後旅館改建，便將餐廳由室外改為室內。馬家也數次招待我們去他們家和上酒店用餐。我覺得泰國的青年到十八歲時便須服兵役，或出家做幾年和尚，是很明智的政策，因為不是每個青年都喜歡接受軍事訓練。

在泰國時，我們還被邀請去曼谷的美國大使館看「綜合大電影」，這是我們首次看到用三部最新的七十釐米放映機，同時在三個弧形銀幕放映電影。父母親並帶我們參觀了蘭花養殖園、稻田，和坐船遊覽參觀兩邊河岸泰族人的生活情形。

離開泰國之前，父親覺得大家都玩得如此愉快，便想順道再去新加坡玩幾天，但我不依。理由是一月份回去時，學校立刻就有考試，我須要回去讀書，父親只好接受我的理由，全體打道回府。

# 第七章

## 邁向種族和諧：香港鄉村俱樂部

**父** 親永遠無法忘記在一九二七年，他二十二歲由英國返港時，只因他是華人，而被拒加入香港會的恥辱，香港會在十九世紀末期之前稱為香港英國會。日後香港會反邀父親入會，但為父親所拒，我年紀稍長後很能體會父親當時的感受。

一九五〇年代有一天我放學回家時，被引見兩位訪客，他們是葛量洪總督及夫人。葛量洪夫人是位非常友善的美國人，她說我長得很像父親，他們告辭之前來我房間說再見時，夫人又覺得我像母親，然後她說：「聽我亂說些什麼？我想妳長得像爸爸也像媽媽。」他們走了之後，父親對我說：「在學校別提這件事，因為總督的身份不可以在中國人家做客的。」我心中一直有疑惑，在這塊我們以此為家的地方，畢竟我們還是屬於二等公民。

## 多元種族俱樂部

**父** 親與幾位有同樣理念的朋友，於戰後非常積極的籌劃在香港成立一個多元種族化的家庭社交俱樂部。直到六〇年代以前，香港的社交俱樂部都是以種族、國籍及宗教信仰來區分，如香港英國會即是香港會的前身，後來又有中國會、猶太會、葡萄牙人的西洋會、德國會及美國會，另外一些例外的團體僅為體育或特殊目的而設。

十五年來在父親及他的友人共同努力之下，才有多元種族俱樂部的組成，他們包括香港匯豐銀行的法律顧問瓊斯(J. R. Jones)、怡和洋行大班藍道(D. F. Landale)。我小時候就見過藍道，他是父親的老朋友，曾請我們去過他在匯豐銀行大廈頂樓的住處，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時，藍道曾向香港會及石澳鄉村俱樂部請求以二百元會費讓華人加入成為會員，但未得批准<sup>①</sup>。藍道在一九五六年退休後，由巴頓(Hugh D. M. Barton)接任，繼續共同努力促成此多元種族俱樂部。

一九四七年時父親和瓊斯將此會的初步籌劃書交給布政司麥道軒(D. M. MacDougall)，由於麥道軒頗能接受多元種族俱樂部的設會宗旨，故與政府交涉相當順利，並選中交通便利的南朗山作為俱樂部會址。祖父去世時曾大力支持父親的匯豐銀行總經理Sir Arthur Morse，加上父親和其他數位人士與麥道軒舉行非正式會議，列出一百五十萬元的建會預算。瓊斯並發出信函給各國領事館代表、銀行主席及國際人士闡釋此俱樂部的宗旨和初步方案的大綱。

興建俱樂部計劃在此非正式小組工作之下順利進行，一九四八年六月於香港匯豐銀行會議室開會，研討政府所提以年租七千二百元，將七公畝半的臨海地區，撥租給俱樂部，為期二十一年的提案。

一九四五年舉行大會，一部份非正式小組的委員不在香港，或在度假中，故委員的組成有所變更。此次會議將原名國際俱樂部，改為香港鄉村俱樂部。有趣的是，會議中有五十六位不同國籍社團代表，其中僅有父親和羅文惠兩位為華人代表，並由他們二人代表華人表示此俱樂部成立後華人的入會意願，會議中又成立三個附屬委員會：法律、財務及建築委員會。財務委員會透過層面較廣的籌募委員會，得到各公司行號及私人認捐，籌募到兩百萬元的建會經費。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中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香港人普遍覺得前途未卜，但俱樂部與政府之間仍持續協商。直到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香港載貨禁運，俱樂部委員決定將所有進展工作全部暫停。

一九五一年五月，俱樂部委員去函香港政府，請求政府對俱樂部預定土地仍予保留，以待時機成熟。此時麥道軒已非布政司，政府覆信中告知俱樂部委員會，政府不可能無限期保留預定土地，若

有其他單位同時申請該地，政府將公開拍賣。針對此意外的通牒書，父親與瓊斯、羅文惠及C. L. Wilson 立刻組團，與布政司R. J. Nicoll會談，會後同意將預定土地保留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其後每半年再由瓊斯向政府口頭報告俱樂部動向，同時所有工作暫停。

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鄉村俱樂部的計劃仍無改變，一九五八年五月，署理布政司E. B. Teesdale再度警告俱樂部之預定土地將不再無限期保留，必須由俱樂部的贊助人提交建會具體方案，但俱樂部贊助會員的反應並不熱衷，令建會計劃瀕臨流產邊緣。

一九五九年一月政府再次降下最後通牒，限在四月一日前遞交具體方案，否則俱樂部將喪失會址預定地。於是父親及瓊斯便請教羅兵咸律師行的會計師Sidney Gordon，和羅文錦律師樓的律師簡悅強，商討興建俱樂部之可行性。會議中一致同意繼續促成建立此俱樂部，尤其來自中國富有的難民增加後，確有必要成立俱樂部供會員使用。瓊斯立刻召集以前臨時小組的委員，成立新的十人委員會，由於瓊斯新任政府薪俸調整委員會委員職務繁忙，故由巴頓出任召集人，三叔為秘書。

一九五九年五月鄉村俱樂部成立聯合組織委員會，包括五位華人、三位英國人、兩位美國人，及葡萄牙、荷蘭、法國、北歐、瑞士及義大利代表各一人。並由巴頓、瓊斯及父親組成代表團謁見香港總督，請求支持。結果政府同意將南朗山五又四分之一英畝土地，以年租十元一畝，租給鄉村俱樂部，但須保證地上建築物的費用為一百萬元。土地問題解決後，委員會決定以發行債券方式籌募所需資金，每一債券五千元，至一九六〇年二月時，基金已達目標。年底俱樂部正式組成公司，共售出四百二十張無息債券，債券持有人即為俱樂部首批基本會員。此後俱樂部一切興建工作，在利家友人甘洛工程師的監督下順利進行。

父親為香港成立多元種族俱樂部的夢想，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實現，當時雖然建築工程尚未完全竣工，但因認為牛年開張較來年虎年為吉，所以挑選一月二十九日正式開幕。鄉村俱樂部由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Sir Michael Hogan)親臨開幕，致辭中說到：

這個俱樂部使得各種不同國籍社團人士，在他們習慣的俱樂部氣氛下，輕鬆愉快的聚集在舒

適的環境……這也是各國籍、社團人士相聚交換意見、發表理念、友善辯論的場所……我深信鄉村俱樂部必能促進香港未來社會更為鞏固安定。<sup>(2)</sup>

俱樂部工程於二月完工，正式開放給會員使用。九月份時首批組織委員之一 Jerry O'Donnell，提出舉辦由全球八個城市提供的二十款最新潮流的服裝表演，並邀請母親和巴頓夫人組織婦女委員會，推展服裝表演，於是便成為鄉村俱樂部的首屆娛樂委員會<sup>(3)</sup>。

## 邁向種族和諧

**父** 親堅信所有種族應和平共處，鄉村俱樂部特殊之處即是它的多元文化種族的會員結構，亦是此俱樂部創會的主要宗旨，入會章程中規定，普通會員及初級會員均按國籍比例分配；美籍百分之十、英籍百分之二十、華籍半數、其他國籍百分之二十，因當時仍存有反日情結，所以在最後一組又須再訂配額，以維持俱樂部真正多元種族之特性<sup>(4)</sup>。會長一年一任，首任會長為巴頓，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第二任會長由父親擔任。

一九六五年時，瓊斯、巴頓和父親被提名為永遠名譽會員，父親去世後，由母親繼承父親的會員資格。在致贈永遠名譽會員資格給瓊斯時，當時的會長利國偉三叔說：

瓊斯博士對鄉村俱樂部的貢獻是無法衡量的，若沒有他專注投入的熱心努力，今天我們不可能有這個國際化的俱樂部。

瓊斯致答辭時提到父親是：



由最初期的建築委員會開始我們即密切合作，銘澤兄努力將俱樂部奠下健全的基礎，邁向成功，成為今日大家所見的事實。<sup>(5)</sup>

俱樂部開幕後成為香港家庭社交生活的一大部份，這個俱樂部為父親帶來許多喜悅和榮耀。雖然在創辦初期的十五年因發展過速，俱樂部財務一直虧損。我們常在俱樂部餐廳享用美味的中、西式的午餐和晚餐，一家人都喜歡這個俱樂部樸實無華、賓至如歸的氣氛，和許多其他香港居民一樣，它成了我們的第二個家。

有一年聖誕節我們回香港時，長子偉雄才三歲，他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多倫多和香港鄉村俱樂部都有聖誕老人，而香港的聖誕老人卻是女人嗓子！又一年學校放春假我們帶孩子回香港，正巧是復活節，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俱樂部舉辦的復活節慶祝活動中的魔術表演和尋找復活蛋。

七〇年代俱樂部開始接受公司企業會員，業務開始轉虧為盈，收入增加後，俱樂部得以重新裝修美化。雖然此時香港亦有其他新俱樂部成立，但鄉村俱樂部所具備的純樸友善及多元國籍的特質，加上各種康樂設施、游泳池、兒童遊樂場及出色的兒童活動、成人社交節目，再加上可供家庭聚餐及正式宴會的餐廳等優良條件，令此俱樂部成為有條件人士熱衷加入的俱樂部。後來俱樂部經由專業人士管理，業務更加興盛。到一九八〇年代時，公司行號須要輪候繳交百萬元的會費加入成為會員，令父親感到非常欣慰。

## 俱樂部晨泳

大家都知道父親每天清早五點左右便去俱樂部晨泳，俱樂部一早就特別開放，讓他一人獨自晨泳。我們回港探親時，父親晨泳完畢一定趕回來和我們一起用早餐，雖然在這樣的行程下，他還是可以最早到辦公室。

有一天父親在去晨泳途中，被警察攔截做例行檢查，要父親出示每位香港居民都應有的身份證，

但父親從未想到要申請過身份證，多數的香港人都認識父親。我想父親若不是自己開著一部德國福士的高而富小車，而是坐有司機駕駛的豪華車，警察大概不會攔他。不過到了辦公室，父親告訴秘書李姑娘這件事後，要李姑娘立刻為他申請身份證，政府還特別開例不需父親本人親自去申請。

父親在晨泳途中，每天還是順路接幾個住在附近村內，須自己走路上學的貧苦學童，他認得好幾個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有一天早上，一個父親經常送小學的孩子不在，但孩子的爸爸在守候父親，請求父親幫助他病重的妻子。父親就立刻送他們去醫院，並安排孩子的母親受到妥善的照顧。

一九七二年香港置地公司想要父親幫忙收購牛奶公司。牛奶公司的主席及大股東是父親好友周錫年爵士，香港置地的主席也是父親好友渣甸集團首腦John Keswick的姪子亨利賈士域(Henry Keswick)。亨利知道很難與父親約時間在辦公室見面，便利用父親在俱樂部晨泳的機會，央求父親幫忙。父親在池中游泳，他就在池邊跑前跑後的試圖說服父親出面幫忙。總算亨利的努力能有回報，收購任務圓滿達成。香港置地公司及牛奶公司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合併<sup>⑤</sup>。此後大家都常笑亨利有個好澤叔，幫他收購了牛奶公司<sup>⑥</sup>。

# 第八章

## 利氏家族企業

戰

後重整家族事業困難重重、進展緩慢，因家中許多地契證件在戰爭中遺失。父親和他戰後第一個秘書江蕙蘭（後來和父親堂弟結婚，成為我們的嘉驥四孀），常一起去政府田土註冊處找文件正本，八叔公（祖父堂弟）在田土註冊處上班，幫了不少忙。最麻煩的是祖父購買地產時，部份置在祖母及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名下，另一部份又在代表祖父後裔的利緯餘堂公司名下<sup>(1)</sup>。

因戰爭的破壞，利家許多物業亟待修葺，有些古老的舊樓甚至沒有抽水馬桶衛生設備。戰後政府限制房東不得將屋租提高超過戰前的水準，有些業主所收租金僅能勉強支付稅金，令許多業主無力修葺物業，我們有些舊樓的單位僅收月租港幣二十元。而且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有些租客離開香港逃至中國之後，空置單位被他人強佔，當時流行多次租用及多層分租，所以合法與非法租客混淆不清難以分辨<sup>(2)</sup>。

在屋租限制下的唯一受惠者是，交付戰前租金而以現時租價租給新三房客的二房東，及在物價平均上漲百分之十至十二後，仍享受舊樓低租做生意的店家。

戰前建造的舊樓問題直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才得以解決，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九日，父親被選為香港業主聯會主席，因為利家擁有大批戰前舊樓，對這方面的困難甚為了解，可代表此類業主發表意見。為求對業主及所有租客公平起見，父親對政府請求准許業主加租<sup>(3)</sup>。

利家的家族公司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在一九四六年時搬至一幢叫做亞歷山大行的舊樓，由我們稱

為徐叔的徐鏡波管理。我特別記得這幢舊樓的地板總是吱嘎作響。所有利氏兄弟在世時，都在同一地方一起工作。有時放學後我去寫字樓等父親一起回家時，最喜歡玩打字機。漢釗哥印象最深的是，三叔的寫字間窗口有冷氣機，在戰後這是非常稀有先進的。

當年利家有兩家租務公司；一家是利緯餘堂，專收祖母名下產業的租金，另一家是利東，負責為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收租<sup>(4)</sup>。定昌堂弟是律師，由一九八〇年代初開始成為家族企業的董事及總經理，他告訴我，戰後多年家族公司業務及決策均以舊式的口說或字據為憑，所有憑據早已不復存在。他後來費了很多心血去搜尋公司的舊文件、地契、公司會議紀錄或物業買賣合約，但成效不大<sup>(5)</sup>。

七〇年代初時，利氏兄弟決定改變傳統經營家族事業的保守風格<sup>(6)</sup>。經好友Hon. J.D. Clague介紹父親與一位興建九龍重慶大廈的著名建築商陳德泰認識。陳德泰建議由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提供建地，投資者提供所需資金，以此投資合作的關係，在銅鑼灣地區建造希慎道一號及禮頓中心兩幢新廈，陳德泰本人亦作小額投資<sup>(7)</sup>。一九七〇年興利建設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在此計劃發展之前，由於利、林兩家為世交，所以所有利家名下的戰前舊樓全為林家的聯益建築公司建造，至七〇年代初期開始家族企業才將工程對外招標。公司既有新的作風，就須加入新血，才能有企業化的經營。利氏兄弟認為最適合的人選就是二叔長子，利家的第一個孫子漢釗，一九七六年時他正在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工作，四叔便要他返港為家族公司效勞。當時漢釗堂哥四十多歲，已有家室，他同意返港工作後，妻子玉蟬則留在美國照顧孩子，以免他們在美國的教育中斷。

## 利舞台

利舞台在一九四六年重新營業，袁耀鴻再度出任民樂公司總經理，經理為董梓君。戰後吳慶塘仍在新加坡華僑聯合銀行工作，即將調去上海分行，但父親說服吳慶塘，認為他為利家工作更有前途，吳便返回香港成為利舞台戲院的經理。利舞台重新裝璜後，有最好的銀幕和燈光設備，還有

舒適的坐椅<sup>(2)</sup>。

電視尚未問世之前，利家孩子最大的享受就是星期天早上去利舞台欣賞卡通片和看三傻電影。去戲院時一定坐最好的B號包廂保留座位，我們很少去其他的戲院看戲，因為利舞台放映的都是最好的首輪片子，有時我也和其他家人去利舞台看美國出品的電影，但那時英文程度不夠，除了泰山和西部牛仔電影之外，其他都看不太懂。當時粵語片漸次流行，但都是些戰爭悲情片，我覺得看戲是一種娛樂，不喜歡看哭哭啼啼的悲劇，所以就不再看粵語片。那時我注意到父親從不看電影，因他對工作更有興趣。

一九四八年倫敦電影公司要求民樂公司成為中國的代理，於是民樂公司總經理袁耀鴻和利舞台經理吳慶塘，帶著倫敦電影公司的《月宮寶盒》、《鴉血忠魂》、《四羽毛》及《伏象神童》四部極受歡迎的大製作，去上海試探市場行情。但結果非常令人失望，上海的戲院根本不知道這些電影在世界各地有多賣座，二人甚至連盤纏都未賺到<sup>(3)</sup>。可是他們在上海遇到名製片人夏雲瑚和導演蔡楚生，他們很想和利家建立商業關係，後來將他們製作導演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八千里路雲和月》送到利舞台放映，這些描述戰時國人生活及批評國民政府的悲劇片，在香港非常賣座。雖然這兩部電影的製作人及導演都親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二人都遇害。<sup>(10)</sup>

在袁耀鴻與吳慶塘離開上海不久之後，該地就被共產黨解放。

五〇年代中至六〇年代中，最出名的仙鳳鳴粵劇團經常在利舞台演出，粵劇當時極受市民喜愛及政府的推動。但後來中國大戲在利舞台的演出逐漸減少之後，戲院便成為來自世界各國藝術團體的表演場地。我最喜歡的是Xavier Cougat 和 Abby Lane 的拉丁美洲舞團，經常也有魔術表演及舉辦國際選美比賽。利園酒店於七〇年代初期落成之後，經常有選美活動，母親的姐妹最喜歡去利園酒店看各方佳麗。八〇年末時，四叔與我有一天經過利舞台，他告訴我那年的國際華裔小姐選美在利舞台舉辦，有位候選華裔小姐來自安大略省的士嘉堡市，我告訴他那次的安省華裔小姐選美，是由士嘉堡市的華商會主辦，而我正是評審委員之一。

父親安排外祖父黃茂霖八十多歲時仍在民樂公司做會計，只為讓他保持忙碌有事可做，外祖父在



辦公室時大家都非常照顧他，近九十歲時頭腦仍非常清楚，直到九十二歲辭世<sup>(三)</sup>。

## 發展地產

### 缺乏平坦土地，

一直是香港建築發展業長久以來不斷面對的難題，我們利家亦是如此。若我們計劃在利園山的山地建造更多的物業，不但須先夷平山地，還須先經政府批准，才能將開闢山地的砂石泥土棄置於指定地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利園山夷平一小部份之後，將砂石運至北角填海，然後再從政府手中買回所填的新生地，建了兩間工廠，一間是鐵釘廠，一間是國光油漆廠。鐵釘廠後來賣給另一位中國製造商，國光油漆廠在一九四八年為太古收購<sup>(二)</sup>，成立國光漆廠<sup>(三)</sup>。太古公司以公司股份支付利家，做為收購漆廠的交換條件，令利氏家族在日後成為太古的主要股東之一，並與太古集團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四叔曾任太古工業的董事，三叔亦成為太古旗下國泰航空企業的董事<sup>(四)</sup>。

戰後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的首次地產發展，仍是開闢利園山的山地，香港政府准許將開山砂石運至柴灣及香港仔。將利園山夷為平地之後，即須開拓馬路，便將主要道路以祖父名，稱為希慎道，希慎道的下一條路即以祖母名，稱為蘭芳道。其他道路則以廣東鄉下祖祠及鄰近鄉村為中心的四邑為名，分別是新寧道、新會道、開平道及恩平道。另外有白沙道，以明代著名學者陳白沙為名，他是祖居所在的新會人，及啟超道，是以世紀初的新會著名學者梁啟超為名，當然還有利園山道。這些道路日後都交由政府使用。

記得在五〇年代時，我們剛由利行搬至希慎道上的使館大廈，有一天早上父親開車送我上學途中，由開平道轉向希慎道上時，遇到一個男子慢吞吞的走過馬路，父親是個很沒有耐性的人，便對他說：「走快點啦！」那男子說：「我愛走多久就走多久，又不是你的路！」父親回答：「正是我的路！」

為了籌措新建物業的資金，家族出售了部份十分殘舊的樓宇和排屋。戰後由家族企業興建的第一

座公寓大廈，是位於希慎道南面的新寧樓，新寧樓是香港第一幢單位住戶為獨立業主的公寓大廈<sup>(15)</sup>。建築物為馬蹄形，短的一面朝希慎道。初期香港人尚未有購置公寓的觀念，部份面向希慎道的單位便賣給由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及上海商業銀行合股的光利公司，用來經營有五十二間房間的小型旅館，即新寧招待所。父親是光利公司的主席，三叔、徐鏡波、朱汝堂及上海商業銀行的王昌林分別擔任董事<sup>(16)</sup>。

新寧招待所於一九四九年開幕，由吳慶塘任經理，招待所開幕時正逢共產黨接管中國政權，佔了天時之利，經上海商業銀行的關係，許多上海的工商界要人逃至香港之後，便暫住新寧招待所<sup>(17)</sup>，所以招待所業務繁忙。招待所的香檳廳更成了新寧的招牌，是五〇年代香港人氣最旺的地方。每星期三晚上，客人可以隨著麗的呼聲廣播電台<sup>(18)</sup>的Three Bubbles音樂輕歌曼舞，成了香港夜生活的著名場所。香檳廳的客人必須服裝整齊，男士須打領帶，我記得五〇年代時，報章提過一件香檳廳拒絕讓一位牧師入場的趣事，因為他穿著的牧師裝只有領圈沒打領帶。後來亦有海蒂樂瑪(Hedy Lamarr)、奇勒基寶(Clark Gable)、愛娃嘉娜(Ava Gardner)、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和烈打希和芙(Rita Hayworth)等國際明星光顧過香檳廳。對遊客來說，若未去香檳廳等於沒到過香港<sup>(19)</sup>。

利家的下一個工程即是在希慎道上的使館大廈，這是家族擁有的第一幢大廈，完工之後我們家、五叔家和三祖母，便相繼搬入使館大廈。位於希慎道和恩平道交叉口的嘉蘭大廈竣工後，住在利行的親人也陸續住進嘉蘭大廈。

利行就又像祖父在世時一樣，全部出租給外人。利氏家族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祖父的妻、妾、子女可在自家的產業免費選擇自己喜歡的住處，也因著這個原因家人可就近相聚一處，這個傳統到我們第三代就沒有再繼續下去。

利園山夷平之後，利家在一九五四年又蓋了嘉蘭大廈和崇明大廈，這兩座新樓，離我們住的使館大廈僅十數步之隔，我們周末若不坐船出海，父親就會走到這兩座新廈的頂層，查看施工情形。

五〇年代時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利舞台、新寧招待所的香檳廳，和戰後利家擁有的士巴汽水廠。我們去汽水廠時，不但可以很起勁的看汽水製造裝瓶過程，還可以盡情的喝各種飲料。那時有

一種葡萄飲料銷路最好<sup>(20)</sup>，但我最喜歡的是櫻桃口味的紅色飲品，後來我才知道這種飲料只是糖水加色素。

一九五三年七叔由波士頓大學畢業回香港，便和三叔買下士巴飲料有限公司的大部股權，然後成立聯合汽水廠有限公司，此後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在士巴飲料僅有名義上的乾股。一九五五年聯合汽水廠得到玉泉汽水的連鎖代理權，一年後又得到七喜及另一家日本啤酒的代理，家族的孩子仍繼續受歡迎去飲料廠，還可自己挑選喜歡的汽水送到家中。七叔時常自己坐在送貨車上跟著送貨，他的美國作風令本地人看得頗不順眼<sup>(21)</sup>。我還記得七叔公司的貨車，在聖保羅男女學校上課中間休息時，免費送七喜汽水給學生喝，這真是個很好的市場推銷方法。七叔後來在飲料界非常成功，他將7-Up命名為七喜之後，所有中國的喜慶宴會為討吉利，都喜歡用七喜。

## 利園酒店

利園山在五〇年代末期完全夷為平地，此時有位蜂農是家中鄉下友人，在利園山養蜂採蜜，他擔心一旦土地為建築物佔據時，他將無處可養殖蜜蜂，所以求助於利氏兄弟，他們便准許他在祖父堂弟利樹源名下位於沙田的一塊土地上繼續養蜂<sup>(22)</sup>。

第一期工程即是後來的利園酒店，於一九六四年開工，原本計劃建造住宅及出租辦公室大廈，一至六樓租給香港政府的醫療和教育部門，街面租給店家營業。後來因為中國文化大革命及香港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住宅部份完全停工。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由於附近隧道完成，加上當時香港旅館房間短缺，家族才決定繼續建造旅館。擁有九百間房間的旅館全部工程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年底完竣<sup>(23)</sup>。

利園酒店是私人公司，除了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為主要股東之外，其他股份屬於太古國泰企業、匯豐銀行、香港置地、大昌貿易集團和一家丹麥公司。又因利氏家族與太古集團的關係密切，便邀請太古主席H.J.C. Browne擔任利園酒店的第一任主席<sup>(24)</sup>，其後即為三叔任酒店主席，在三叔猝然逝

世後，就由父親接任主席遺缺。父親由上任開始即積極參與酒店各項業務，他並透過私人關係，由中國天津特別訂製酒店前廳的地毯，同時因為父親與日本社團的關係，日本旅遊團來香港時多半在利園酒店住宿。

當時利園酒店是香港少數幾家具有國際水準的酒店，初期與洲際酒店（C）企業的連鎖旅館合作。多年來利園酒店以在銅鑼灣便利的地點，成為亞洲旅客最喜歡住的酒店。酒店落成之後，香港地圖又再一次的呈現「利園」二字。

後來母親年事漸高，覺得在家宴客太過傷神，所以自從利園酒店開幕後，父母親便只在利園舉行宴會請客。利園酒店內有幾家不同的餐廳，但父母親最喜歡的是中餐部的彩虹廳，他們請客時多半用私人房（有可坐二十四人的圓桌），或是包下整個餐廳。父母親對利園酒店餐廳的水準十分驕傲，父親常說利園的北京烤鴨水準全港第一，甚至比北京本地的烤鴨還要好吃。父親喜歡對客人介紹來自中國的特別菜，他們在彩虹廳招待過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利園酒店完工後，所有利園山的土地皆已開發。希慎道旁所種的洋紫荊，就是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代表花，用廣東四邑為名的街道兩旁，則種植一種開黃花的樹木。父親曾非常自豪的指給我看這些花木，因為這些樹不僅是在我們冬天回香港時才開花，而且也是父親特別安排由華南移植來香港的。

## 父親和漢釗

漢釗哥返回香港時，家族公司辦公地點正遷移至新近完工的希慎道一號，他開始由公司基層學習企業經營，和商業大廈的租務管理。雖然三叔預備將漢釗哥安置在二十二樓工作，可同時監管的同一層樓工作的員工，但父親將漢釗哥的寫字間設在二十一樓的邊間，與其他叔叔一起工作，由他的寫字間可俯視禮頓中心的工程進展，以便實際監督（20）。父親又將他自己在家族建築所負責的監視產業工程進度的任務，都交付給漢釗哥。



大家都知道父親是個很沒有耐性的人，叔侄二人每天利用一起喝咖啡的時間，由漢釗哥對父親做「不超過十五分鐘」的報告。父親必須知道不同工程的進度，若漢釗哥有任何困難的話，父親就利用他各種不同的關係，多半可在半個鐘頭之內為他解決<sup>(27)</sup>。漢釗哥返港後，父親建議他加入鄉村俱樂部，雖然等候入會名單很長，但因父親的創會會員身份，他姪兒的加入不成問題。漢釗哥非常感激父親當年介紹他認識許多父親的朋友，像葉謀遵和姚剛等人<sup>(28)</sup>，日後對他事業助益極大。

父親和漢釗哥二人常在星期日坐船出海，母親七〇年代末時對出海已無甚興趣，所以很少同行。但若我們當中有人在香港的話，她還是喜歡一同出海。父親此時已不喜歡太晚在外逗留，所以下午四點以前一定回到皇后碼頭。父親一心要培植漢釗哥成為未來利氏家族眾多企業的領導人。

一九七八年，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收到一項政府非強制命令的指令：在利氏家族名下位於軒尼詩道上的空地應予使用。利家兄弟從未急於使用這塊土地<sup>(29)</sup>，一九七六年，三叔曾和萬國寶通銀行「花旗銀行」商量合作發展此地的可能性，但未有任何結果。此時這塊地的四周都已大廈林立，唯獨這塊土地空置，香港市民都在懷疑利氏兄弟不使用這高價空地的原因，其實只是因為大家都忙，實在沒有時間處理這件事。漢釗哥回港後發展這塊空地即成為他的責任，並負責監管興利建設有限公司名下，在怡和街上興利中心各種工程進展。此發展計劃仍為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與其他投資人合作興建。

當興利中心破土之後，漢釗哥每天必赴工地查看，甚至在星期日出海野餐回來都要去視察，有時父親也會和他一起去。當時地基挖掘工程因有困難一直無法到達底層，令工程顧問馬奇(S. Mackey)教授和負責地基的包工非常困擾，馬奇是香港大學退休的工程教授。父親對地基工程進度的拖延非常不耐，每位工作人員包括漢釗哥在內，都被父親催促得暈頭轉向，所以漢釗哥對父親的例行周日晨間咖啡會報完畢後，就會打電話給馬奇教授查問進度。日後他笑著對我說：「地基工程挖不到底層就是挖不到，怎樣向人追逼也快不了啊！」

有一天，馬奇教授決定和甘洛工程公司的結構工程師Stanley Weber，一起去地基底層查看狀況，他們勘查之後終於點頭認可大廈地基工程，令大家都鬆了口氣。漢釗哥說：「馬奇教授說可



以，那就行了！」

利氏兄弟對設計圖的頂樓和底層有不同意見。四叔原本要將底層建為大戲和國樂演出場所，但大家認為不合經濟效益，便將藍圖交給漢釗哥重新策劃，以滿足各兄弟的要求。他決定將戲院預定的空間改為停車場，原先地下停車場位置改為零售業出租攤位。又經過多次討論之後，終於同意將頂樓兩層保留，專租給私人俱樂部，後來由香港日本人俱樂部租下。在執行家族事業時，利氏兄弟常有不同意見，但問題一定在家族內部解決，對外則是同一陣線<sup>(30)</sup>。興利中心於一九八一年落成。

家族事業的下一步計劃是將新寧招待所和新寧樓重建為新寧中心。新寧招待所是個小型旅館，入口在希慎道上，後方則是有六十間公寓單位的大廈，每個公寓單位的業主皆是聯合地產的股東，他們對重建計劃書內容有不同意見及問題，結果須用投票方式表決，才能定案。漢釗哥表示這是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創業七十四年以來「祖父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創辦此公司」，唯一一次須以投票方式決定政策，原因是新寧樓有太多外間股東。新寧中心由貝聿銘負責工程設計，於一九八〇年動工。

## 股票上市公司

由於禮頓中心、希慎道一號、興利中心、新寧中心和新寧樓的產業分別由不同的外界投資者，及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持有，而組成不同股份持有的公司架構。為求合併統一起見，利氏兄弟便決定將七〇年代成立的興利公司，在一九八一年改組為希慎興業有限公司<sup>(31)</sup>，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市場公開上市，八月份有五億普通股發行，父親為公司主席，漢釗哥及四叔另組委員會研究細節。漢釗哥對父親的咖啡工作晨報，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sup>(32)</sup>。

獲多利公司(Wardley Limited)是家族企業的往來銀行代表，建議希慎興業有限公司除了租務之外，應有更多其他地產發展買賣計劃，以吸引更多投資。此項建議是將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名下，位於堅尼地道七十四至八十六號的祖宅大屋<sup>(33)</sup>、利行及四周花園佔地，轉至希慎興業有限公司重新發展。並由仲量行對這片地產重新估價，但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名下並無現金可購買利希慎置業有限

公司的這些產業，於是便做出以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價值港幣八億七千五百萬元的股票，為交換這些地產的安排。希慎興業有限公司接收這批土地後，在一九八五年將此地發展為竹林苑豪華綜合大廈區，共有三百四十五個公寓單位。母親在父親去世後，和許多家族成員相繼搬入新廈。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股票在一九八一年上市時，每股面值一元，但後來股市不振跌至三十九分。部份原因是公司股東之一陳德泰去世後，他的兒子決定拋售手上所有希慎興業的股票，令公司股價下跌不少。身為公司主席的父親和總經理漢釗哥，都深感責任的重大和憂慮，父親公開請求股東對公司繼續保持信心，勿輕易出售公司股票，並保證股價一定會再回升。時間證明父親的看法是正確的。

一九八〇年代初，父親和漢釗哥坐亞特蘭大號遊艇出海，告訴他：「不要希望每個人都讚美你，若沒有人說你壞話，你已經做得不錯了。」漢釗哥對父親這些充滿智慧的訓勉，永遠牢記在心。父親在一九八三年逝世後，由四叔接任主席數年，然後由漢釗哥<sup>(3)</sup>繼任至今。

八〇年代初時香港開始面臨經濟嚴重衰退，我記得回港時耳聞目睹皆是一片悲觀論調，除了我們家，父親仍是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這段時期正是中、英雙方為香港回歸中國問題作為期數年的談判期間。由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不僅在香港，也在中國、新加坡及舊金山投資發展地產。至九〇年代初，香港股票逐漸回升，市場開始復甦，但父親卻再也無法見證這一切了。

一九九四年時，希慎興業有限公司與恒生銀行合作發展嘉蘭中心，公司股票跳升至三十二元一股。在香港歷史最久的華人地產公司，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控制下的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商譽極高，被評為東南亞十大地產公司之一。公司保守穩健的作風，及對高價位租客的吸引力，令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在地產界有「精品店」的美譽<sup>(4)</sup>，父親在世的話，對今天公司的成就應該非常驕傲。

香港股市在一九九七年底時，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普遍受挫。雖然希慎興業有限公司股價亦有下跌，但公司盈利仍保持穩定成長，遠景繼續看好。

# 第九章

## 吾家有女初長成

父

母親在一九五四年計劃由使館大廈搬至希慎道上，家族新造的崇明大廈頂層和樓下半層的樓面，於是我們在一年後遷入新居。

## 祖母的喪禮

一

九五六年初祖母開始病重，同年初夏於醫院病逝，享年七十六歲。家人為她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傳統佛教喪禮。因天氣炎熱，祖母棺木須放在冰上，停柩於大屋觀音池旁七七四十九日，並在觀音池旁的竹園搭起大竹棚，內設靈堂，右方坐男家眷，女眷則坐左方，子孫輩輪流換上黑袍或白袍守靈。每天放學後我就換上作為孫女兒穿的白袍，在棚內靈堂與家人一起坐在臨時搭建舖有草蓆的地板上，吃很簡單的素齋晚餐。

尾七將盡，家人請了成群的和尚尼姑來替祖母打齋誦經超渡，我想他們大概來自不同的宗派寺院，因他們穿著不同的袍子。出殯那天，儀式過程共數小時，喪禮過後全體家人返回大屋。我曾聽說人死了以後，他的靈魂會化為飛鳥或蝴蝶顯靈，當我正站在大廳凝視掛在後牆中央祖母的相片時，突然間我看到有隻蝴蝶飛進來停在祖母相片上，然後飛出陽台轉眼就不見了。

出殯當晚全體家人一起吃晚飯，然後在陽台燒紙紮的房屋、僕人、金銀元寶，還有一部紙車給祖母

在陰間享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座紙橋，沒有橋她就過不了對岸的世界。這些東西被熊熊烈火化為灰燼時我正看得入神，五姑丈簡悅慶走過來對我說：「我想阿嬤去了美國，妳看那紙車的駕駛盤是在左邊的哩！」

當晚我們家族一起在大屋吃飯，共有好幾桌親人，我記得母親和幾位姑姑那晚都穿素服，表示祖母入土後，家人進入另一階段的服孝期。

幾天以後，所有兒子在晚飯後都要回到大屋等祖母回靈，他們在大屋內外走了一大圈，讓祖母的靈魂知道兒子在迎接她。在花園時有人開玩笑說，千萬不可隨地解手，因為靈魂是無所不在的。

記得祖母去世時漢釗哥正預備去美國結婚，但照中國習俗，子孫為祖母守孝期間不得辦喜事。漢釗哥的未婚妻黃玉嬋是華裔美國公民，他們結婚後漢釗哥才可在美國居留工作，而且時間緊迫，他急須離港赴美向公司報到。父親此時出來說話，不許家族成員反對漢釗哥成婚，表示若有任何人反對的話，就要在香港為漢釗哥提供一份同樣好的工作機會，於是漢釗哥得以順利結婚，婚後在美國一住就是二十年。

## 父親和我的英國教育

父親在英國所受的教育和經驗令他終生受益，他要自己的子女能同樣受惠，所以一九五〇年代開始時，已將哥哥和姐姐送到英國求學，因我個性不同，父親將我留在家中。直到我十五歲時，才同意父親的決定去英國讀書。

一九五六年父母親在啟德機場送我上機。政府早在一九四〇年末即開始討論為啟德場建新跑道，但至五〇年代此計劃仍未定案。當時的啟德機場非常簡陋，僅有一道閘門供旅客出入<sup>①</sup>。

當年我和姐姐及另一友人李國寶<sup>②</sup>一起搭機去英國讀書。姐姐和李國寶是暑假結束再度返英，而我則是初次離家。



在飛機降落之前，我一直無法想像聞名於世倫敦大霧的景象，傍晚到達倫敦時，只見一片迷茫整個城市都在霧中，濃厚的黃煙霧令我透不過氣。父親的老朋友利安，坐著由緬甸司機阿永開的班特利豪華座車來接我們，我們三人在利叔夫婦家中住了幾天，他們家在倫敦市郊的蘇瑞市，庭園環境非常優美。有一次在利叔的餐廳，我想嚐試菜單上叫做「雜碎」的一道菜，但餐廳侍應生不肯給我，他說這道菜不能賣給中國人，原來雜碎就是剩菜大雜燴的意思。

當時因姐姐在英國南部維德島沙克林的上谷女子中學(Upper Chine School)讀書，我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之間，也在此校讀書。這是一間限制非常嚴格的私立女校，規模不大，全校學生僅二百人左右，從中學八年級到十三年級，師資極為優秀。程度好的學生可編入特別班，我的數學課班制最小，全班僅有我和另外一位泰國來的學生。

學校沿上谷河而建，其實這條河只是條小溪，校園環境優美，有十位全職園丁維修，夏季對外開放。春暖花開時溪邊至校園內開滿了水仙花，暑期班時校園內可見各種不同的玫瑰，玫瑰花一直可開至秋天，風和日麗時我們還可在戶外上課，冬天則是灰暗濕冷很不好過。

我在上谷女校時由九年班跳升至十一班。因為我原本計劃入牛津讀大學，所以必須一次考完六項普通初級的必修科，我第一年就修六科初級科目和高級中文，第二年修的科目更多，還得全班第一名，父母親對我的成績表現非常欣慰，但我自己卻一點也不快樂。

我並非不喜歡這間學校，而是對英國公校制度覺得厭煩。因我本身是個非常能自律，而且在藝術方面需要有所發揮的人，這樣的教育制度對我完全不適合。我最不喜歡別人命令我何時、何日、做何事，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現在六至八個女孩住同一房間，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隱私。在家時，我從不需要父母親催促我上床，現在要按時熄燈就寢。總之吃飯、睡覺、寫家信、洗澡沖涼都要規定時間（學校規定周日可洗三次，周末隨意，所以我一周洗五次，不像在家可天天洗），甚至幾乎到了連呼吸時間都有規定的地步，因為不論氣溫多低，我們都須出外活動，下午又一定要運動，我對體育最沒有興趣，所以下午就和幾個也不喜歡運動的中東國家的女孩一起散步。

由於校舍沒有暖氣設備，我總是覺得飢寒交迫，因為宿舍規定不准關窗睡覺，天冷時雪花都會飄



進屋內，睡覺時我總是穿幾層厚厚的衣服，再蓋九張毛毯，加上腳下還要有個暖水壺。父親為了要我每天有足夠的新鮮水果可吃，特別安排我下課時去廚房取兩個蘋果。他也知道我經常覺得吃不飽，還要吉百利(Cadbury)公司每學期送許多巧克力餅乾給我，但學校只准學生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才能吃校外食物，這是我一生中最胖的時期，而且腳長滿了凍瘡。

我很不贊成學校只收女生，覺得女校的環境非常不自然，很多無聊的事在男、女同校的環境就會發生。所以無論我功課再好，我多喜歡學校的老師，我還是覺得不屬於這種環境。

母親在一九五七年春天來英國看我們，她先去英國諾定咸看在那裡讀書的哥哥。她第一次發現哥哥精神有些不正常，但在學校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母親要他去看心理醫生，從此我父母親的生活再不同以往。

我對哥哥的病情一直不甚了解，因為父母親很難接受哥哥有精神病的事實，所以極少談論這件事。我在上谷女校第二年時，知道哥哥住在倫敦郊區醫院就醫，那年聖誕節，我在學校的家政課做了生平唯一的聖誕蛋糕後，和一位住在英國的堂姑姐，帶著蛋糕去醫院看哥哥。見到哥哥時，覺得我們孩提時兄妹的親近在漸漸的消失，他的病症令他對家人有排斥感，病情時好時壞，有幾年還不錯。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哥哥有先天性的精神分裂症，存在於百分之一的兒童中，潛伏至十幾二十歲時發作。

在上谷女校的第二年，我寫信回家稟告父母親，我年底即回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讀中學最後一年，在信中我沒有給父母親任何理由，因為我不要他們改變我的決定，當年我是個非常任性的孩子。

父親非常失望，因為他對英國的公校教育制度極有信心。任何外人看來我的行為是一種失敗的表現，但我用成績來表現我的決心，我回港第二年又得全班第一，不但修足許多普通級的學分，而且還以高分通過中級數學測試。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回到香港的初期，父親對我自做主張離開英國仍舊非常不悅，所以不大理睬我，我想他也知道我不會依照他的計劃去英國讀大學。在聖保羅男女中學最後一年時，我的人生方

向有所轉變，我決定不照英國上谷中學老師為我安排的計劃進大學讀數學（母親一直認為以我優異的成績應該讀法律，倒是父親從未表示過意見），我要改讀文科歷史。由於我從理科轉文科，加上學制的改變，我必須在一年之內讀完兩年的課程，才能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於是我向舊同學借筆記，在一年之內追上兩年的進度，但因時間緊迫，我的成績並不如以前理想。

一九五八年姐姐進牛津大學讀醫，此時六叔剛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得博士學位回港，他建議我既然不願回英國讀書，不如申請美國大學，但父親反對，他堅持他的孩子決不受美國教育，我從不知父親反美的原因。於是我就申請了兩間加拿大的大學，一間是滿地可的麥基爾大學，另一間是多倫多大學，然後父親為我決定去麥基爾大學就讀。

回到香港後我就專心讀書，對香港周遭所發生的事全然不知，課後除了坐船出海，就在屋頂花園讀書。父親在我們離家出外讀書後，身邊只有志剛弟一個孩子，尤其沒有我在一旁招兵買馬邀朋友上船，父母親也沒有興趣和太多人出海野餐，就換了一艘比富都號小一些的亞特蘭大號遊艇。何寧是我們家最後一位看管遊艇的船工。為我們工作超過二十年。為調劑讀書緊張的情緒，我又開始畫水彩畫，並專畫臉孔。

在回港的同一年，我要求父母親不要再叫我May，而用我正式在學校的Vivienne。母親說：「現在要我們改口太晚了，反正妳到了加拿大也沒有人知道我們叫妳May，人家只知妳是Vivienne。」

在成長過程中，我為自己做了許多決定。

## 麥基爾大學，結婚成家

一九五九年八月母親帶我來到加拿大，一如以往由父親安排旅程，我們先到西岸的洛磯山脈。母親的表姐林美娥和她丈夫伍英才，邀請我們去渥太華他們家住幾天，但因我們想先去看尼亞加拉大瀑布，所以伍英才和他兒子衛權便來多倫多機場接機，在多倫多停留期間，由他們開車帶我們

去看尼亞加拉瀑布，然後再一起去渥太華幾天。母親和我再由渥太華飛到滿地可，待我在麥基爾大學宿舍安頓好之後，母親就去紐約轉英國看哥哥和姐姐，再回香港。

我進入麥基爾大學讀二年級，此時衛權也正在校讀醫科最後一年。在麥基爾讀書的幾年極為愉快，但我忙於和衛權交往，學校成績並不很理想，但那時讀書成績不是我最在乎的事。母親對這件事頗為不悅，因為她對我的將來另有安排，父親倒不反對我和衛權戀愛，因為他欣賞有才華的人。

一九六一年，衛權寫信去香港正式向我父親提親，但父親認為我仍在大學讀書，一切尚言之過早。同年底我就告訴父母親，我二十一歲大學畢業後預備結婚的計劃。父母親知道我自小雖然個性剛強，但很有理性。父親頗能接受衛權，但母親卻十分失望，幾年都不理睬我，她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選擇一個「窮家子」。我知道金錢不能換到真愛和快樂，所以不同意母親的看法，在當時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看過許多有錢人痛苦的婚姻，我決不加入他們的行列。正如衛權自己所說，除了他的專業和才幹之外，他一無所有，但對我來說這就夠了，我要嫁一個我自己愛的人，父親對這點非常了解。

由於母親不贊成這門親事，對我的婚禮全不理會，我必須自己打點每個細節，這時我一面讀書考期終考，一面預備婚禮，另外衛權和我還須找地方住。為了方便父親遠道而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和婚禮，所以這兩件大事必須在數日之內同時舉行。於是在兩個星期之內，我旋風式的過二十一歲生日、大學畢業、又要舉行我們的婚禮。畢業典禮過後，父親問我怎麼只拿到普通榮譽而不是一級榮譽，他真不明白我過去幾個月來所承受的壓力有多大，但也很感激他相信我有能力可有更好的成績。

我們結婚那年，衛權正在滿地可的麥基爾大學做燒傷研究和解剖學，同時攻讀外科碩士學位，次年進入麥基爾大學整型外科開始接受訓練。一九六四年衛權得到Molson研究獎學金，去英國Middlesex以整型外科研究中心知名的維能(Vernon)山醫院受訓一年，我也同時在倫敦大學的考古學系讀書。衛權在七月一日開始於維能山醫院工作之前，我們只用二十五元一天的旅費，駕車在歐

洲中部四處遊覽，對我們二人來說這是美好的一年。

在英國時我們常去倫敦探望志翀大哥，那時他已婚並有個兒子。一九六五年春天，我和衛權坐郵輪的普通艙去地中海遊覽，並在復活節時開車去蘇格蘭和威爾斯。當時父母親也正在英國，我便去向他們請安，還帶著一束紅玫瑰花給母親，但她對我仍是不甚理睬，反而父親說話很多。母親對我敵對的態度，令父親非常尷尬，父親的體貼我實在非常感激。

那年夏天我和衛權回到加拿大滿地可，衛權繼續在滿地可總醫院受訓。九月時長子偉雄出世，次年滿地可正在積極預備一九六七年世界博覽會，魁北克省開始有獨立分離主義的運動。

一九六七年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時衛權正在參加院士考試，魁北克省開始有分化危機，滿地可街頭及許多信箱內都有炸彈爆炸的恐怖事件。雖然當時麥基爾大學已聘衛權為初級醫療人員，但因為魁北克省政局不穩，所以在衛權收到安大略省士嘉堡總醫院的整型外科部駐院醫師聘書後，我們便舉家遷到安大略省。

母親在一九六八年二月經過一次輕微心臟病之後，便聽從醫生囑咐出外旅遊調劑心情，母親原本就計劃去美國和加拿大溫哥華探訪親友，她便利用這個機會，帶表哥的女兒陳之昭去美國讀書。母親患心臟病後對我的態度大有改變，她在溫哥華時要我過去與她見面，我便在夏天帶著兩歲半的偉雄去溫哥華拜見母親。母親對我態度的軟化，令父親心境舒暢許多，從此以後，父母親每年都會來加拿大看我們。

父母親來多倫多看我們的時候，父親對多倫多市區到處都有公園，及住宅區內繁茂的樹木，非常欣賞。父親熱愛大自然，常說香港人口稠密的地區植樹太少。他知道我熱衷園藝，對我提過他的好朋友羅富齊爵士(Sir Evelyn de Rothschild)也有同好。

父母親在一九七〇年來多倫多看我們時，我們的租屋在一鎮屋型社區內，衛權當時是士嘉堡總醫院中唯一沒有自置房子的醫生。父親覺得偉雄及一九六九年出世的俊雄正在成長，這間住屋不夠大，應該要一幢有院子的房子。但我心目中，對我憧憬的房屋有很特別的構想，因孩子們的藝術薰陶對我來說十分重要，我要有一間美術室與廚房相連，但市面上的房子根本沒有這樣的隔間，唯一



的方法是儲備足夠建屋費用自建。我從未想過向父母親開口，但父親非常慷慨地願意幫助我們，讓我們在早已預購的土地上開始自建住宅。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們搬入新屋後，父母親便來多倫多。父親見到我們超大的客廳，便要像他為利園酒店大廳所訂製的天津地毯一樣，也特別要為我們的客廳訂製一張天津地毯。但是他說地毯製造加上運送過程，至少要等一年的時間，或者我願意選擇兩塊地毯雙併式用的話，馬上就有現貨可運來多倫多，但我寧可等。後來我還收到寄來的地毯圖樣讓我挑選，至於地毯的顏色，是特別照我由雜誌中剪下花卉的色版訂做，色調與客廳壁磚相襯。父親也讓我挑選一張普通尺碼的地毯，來配襯我們藍色的飯廳。我們果真在一年之後才收到地毯，但等待的確是值得的。父親對我們實在是關愛，要如此費心的送地毯給我們。

一九七二年志剛弟由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父親便培植他接受國際財經訓練，安排他去日內瓦、紐約華爾街、最後一站去東京，在山一證券公司及富士銀行實習。富士銀行總裁吉岡義之與父親是朋友<sup>(2)</sup>，這是弟弟大好的學習機會。

當時弟弟已婚，並有一子。他們由日內瓦赴紐約的途中，特別來多倫多探訪我們，大家相處得非常愉快。說也奇怪，弟弟在那次探訪時對我說：「二家姐，我不會活得太長，或者最多只有十五年，但在這之前，我一定要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作為！」，雖然那時他過胖，但臨離開香港之前的健康檢查報告顯示他一切正常。

志剛一家到紐約不久，父親就打電話告訴我志剛在紐約去世的消息，當時他才二十五歲。衛權和我立刻飛去紐約，父親則獨自一人由香港前來料理弟弟的後事，母親沒有同行。

原來志剛去世當天正和朋友於午餐時間在外走路，突然倒地不起。所有在紐約的利氏親戚接到消息後，都前來安慰我們，幫助父親料理志剛後事，在堪色斯大學任教的六叔也特別趕來。我和志剛一向姐弟情深，但我的悲慟又如何能與父親的喪子椎心之痛，或妙玲弟婦喪夫的悲傷相比，幸好他們的嬰兒稚子尚不懂事，不知什麼是人間慘事。

父親辦完志剛後事，便帶著承武孫和妙玲次媳回香港，負起照顧承武未來的責任，由那時開始，



他既是承武的嚴父亦是承武的慈祖。承武稍長，他們祖孫二人每星期六早上必在一起，父親帶承武去他的辦公室，看著承武向公司裡一位擅長中國書法的梁小姐學寫毛筆字。

七〇年代初期我已開始注意到香港的主權問題，父母親來加拿大看我們時，提起中國領導人對父親保證，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一切維持現狀，五十年不變，所以父親覺得可放心繼續投資及照常經營他的企業。

我們每年必返港探親，在一九七六年聖誕節回去時，父親招待我們一家坐Rassaband號郵輪，由新加坡去峇里島旅遊。使得偉雄、俊雄和一九七一年出世的迪雄都興奮不已，以為上了電視節目中的愛之船，這是他們第一次坐郵輪旅行。我們住新加坡期間，父親沒有為我們訂最好的文華酒店，因為酒店老闆是父親的朋友，若知道是父親訂房間的話，一定不肯收費。

一九七八年二月是父母親金婚紀念日，父親並不要什麼特別儀式，他本人連自己生日都不慶祝，他不喜歡麻煩人。但四叔堅持這是值得紀念的日子，要利家全體一起慶祝，令母親非常高興。因為金婚紀念日是在二月，只有我和幼子迪雄能回去慶賀，兩個大孩子須要上學，由衛權留在家中照顧他們。

慶祝酒會在利園酒店舉行，當晚父母親都非常愉快，賓客都是至親好友，慶祝蛋糕上綴滿了金色的蘭花。父親致詞時說到，五十年前他和母親在利園結婚時，就是站在現在他所站的地方，所不同的是，一九二八年的利園高高在利園山上，現在重建的利園酒店已在夷平的地面上了。同時父親也提供了他與母親維繫美滿長久的婚姻秘訣是，「偶爾吵吵小架！」

## 與父親同遊中國

一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對父親提起，想和衛權帶孩子回中國看看。那時除了中國政府安排的團體之外，中國觀光尚未對外開放。我們在父親事先經由北京安排之下，去渥太華的中國大使館取得

了中國的簽證。

父親為我們安排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旅程，我們先回香港過聖誕節，再坐火車進大陸。那時只要一過邊界，立刻可以覺得是兩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一下子由高樓大廈滿街汽車，轉為田野和單車。政府人員在廣州火車站安排我們辦理入境清關手續，然後有位導遊一路照顧我們整個行程。

我們由廣州飛抵北京，然後一路往南走，參觀了所有主要名勝及非觀光區的小地方。這次行程中，我們與母親的表哥陳耀真教授和他太太毛文書見面<sup>①</sup>，他特別為我們安排參觀北京城外平常不對外開放的整型外科醫院。衛權非常訝異國內的醫生在這般簡陋的設備環境中，能有如此高的水準。我們在北京中央醫院還看到用針灸麻醉動手術，及其他各種不同的中國傳統醫療方法。這是我第一次在手術房內，看到正在進行扁桃腺切除的病人，還能清醒的和護士交談，覺得非常驚奇。

我們去了長城和紫禁城，然後到杭州和桂林，每到一個地方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時國人都穿毛裝，彼此稱同志，也沒有現代化的旅館，住的地方清早無水可用，我們都在一般的飯堂吃飯。我注意到在共產黨統治下，星期天早上必有自由市場，人們可自由交易<sup>②</sup>。

當我們抵達桂林時，二子俊雄開始生病，衛權診斷是得了猩紅熱，馬上給他服下抗生素。在桂林的最後一天俊雄已覺得舒服許多，便和我們一起四處遊覽，然後我們在除夕由桂林飛回廣州與父親會面。

因父親的關係，我們在廣州期間成了廣州市政府的貴賓，特別安排住在政要所住的賓館。因為孩子想放炮仗，父親便帶我們坐小巴士上街找炮仗，結果炮仗沒買到，倒是參觀了廣州市區。父親還指給我看在一九三〇年代，他在廣州市政府工作時參與興建的一座歐式橋樑。

當晚因廣東省省長不在廣州，便由副省長請我們在賓館餐廳晚餐，令我上了一課就是：世上任何國家的官方宴飲，包括貧窮的共產國家在內，水準都不會差。

父親計劃第二天一早和我們一家人坐車去嘉密村祖祠，所以只有在飯後才有時間帶我看看賓館的花園。我們原本預備全家一起和他散步，但俊雄說他無法走路，因為他的膝蓋已開始腫脹，衛權便抱他回房休息，只有我和父親在園中散步。

我回房時見俊雄所服的抗生素不起作用，又開始發燒，便立刻找醫生，結果這位女醫生建議我們送孩子去醫院驗血。衛權便抱著俊雄，我們一起跑到醫院，俊雄一眼瞥見醫院急診室的情況，就要求「不要留我在這裡」，當然我們也不會將他留在那樣的醫院。因為是新年除夕，醫院的化驗室休息兩天無人值班，我當機立斷決定立刻帶俊雄回香港。

回到賓館時父親早已就寢，我便去他房間叫醒他：「爸爸，我要馬上帶俊雄回香港，你可不可以儘快幫我們找頭班飛機的機票？」父親知道我必有理由做此決定，所以也不多問醫院的情形。只說：「明天是新年，大概會很難」，我說：「那末找部車，我們馬上開車回香港」，「那更麻煩，路上情況不好再加上邊界的檢查站，我更難安排你們一路順利回香港，讓我先想辦法再說。明天嘉寮村還有人等著我去，偉雄和迪雄可以跟我走。」但可惜迪雄沒有單獨護照，不能跟父親去，因為他的名字附在我的護照上，所以他一定要隨我們回香港。

父親為我們做安排的時候，我和衛權開始收拾行李。一位政府官員告訴我，第二天早上五點他可以送我們去機場，但不能保證飛香港的頭班機能否有四個機位給我們，不過他會儘量想辦法。此時父親亦與母親聯絡，要她通知七叔的小兒科醫生朋友過來看俊雄，因為過年期間幾乎沒有私家醫生願意出診。父親同時聯絡香港機場準備輪椅，及要利園酒店派車接我們回酒店（當年除非我一人或只帶一個孩子回香港時才住自己家中，否則都住利園酒店，免得為父母親及家中工人帶來不便），利園酒店就在父母親住處對面。父親做完這些安排後才再回房休息。

第二天我們一早起床，賓館廚房還為我們預備了豐盛的早餐，但我們心焦得一點胃口都沒有。和父親及偉雄分手後，我們幸好能坐到頭班機，在二十五分鐘後就回到香港。一切照父親的安排回到利園酒店，母親打電話過來告訴我們醫院方面七叔已安排妥當，然後七叔說他已派司機來接我們去養和醫院的急診室，他會在醫院等我們。

七叔在養和醫院為我們介紹了一位在美國受訓，醫術非常好的小兒科醫生，他確定俊雄是得了猩紅熱，必須繼續服用較高單位的抗生素數日。養和醫院到現在都屬貴族醫院，收費高昂，所以當七叔告訴我醫藥費「全免」，他已和醫院結清帳單時，我們都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我和他的關係一直很

特別，他像我的朋友而非長輩叔叔，他只比衛權年長十歲。回港當天下午俊雄已舒服許多，第二天已經可以和我們一起去利舞台看電影了。

這一切使我感到我和父親的個性是多麼相像，我們不必多說一字，彼此即能互相了解對方。我知道當時換了我在父親的處境下，我也會做同樣的安排。

此時父親帶著偉雄在新會祖祠，令偉雄受到畢生難忘貴賓式的款待。父親原本亦要帶我們全家去離新會不遠也是四邑之一的新寧，即衛權家的祖祠，現在雖然我們不能前去，但父親還是單獨帶偉雄去了新寧，他覺得讓孩子對父母雙方的祖先都有所認識，是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到了新寧，偉雄沒有想到村民會送禮物給他們，其中還有活生生的雞。

偉雄回到香港對我們描述他在中國的見聞時，他說：「公公帶我去一間炮竹廠，他們任我在外面儘放炮仗；在發電廠水壩河邊的大榕樹上有上千的白鷺；我還和公公去泡溫泉，在溫泉煮蛋。但是和公公同房睡就很麻煩，他睡覺時打鼾好大聲！」

父親非常高興見到俊雄康復不少，看偉雄玩得如此開心，便對俊雄說：「下次公公帶你返鄉下。」

父親在中國時，心境總是非常愉快。

# 第十章

## 由動亂至改革：對高等教育的遠見

香

港社會在一九五〇年代分為親共、親國民黨，及親英與其他不同的派系，因為我們在家從不談政治，所以我無從知道父母親的政治傾向。中國政府對香港態度較為軟化之後，在一九五六年，中、

港邊界應民眾需要再度開放，內陸中國居民只要有回鄉證，即可自由進入香港。由二月至九月，共有六萬多人由大陸來港滯留不歸<sup>①</sup>，令水荒問題更加嚴重，於是迫使香港政府又將邊界封鎖。同年我去英國求學不久，國民黨在慶祝雙十國慶時，與支持共產黨的市民及反英殖民政府派民眾發生暴動鬥爭。暴動持續數日，英方調動英軍武力鎮暴後才平息，暴動中有數十人喪生，數千人被逮捕入獄或被驅逐出境。

香港政府通過一連串的法律加緊控制人口，並有權查封觸犯政治條例的報社，將出版人以政治罪名判罪入獄。條文規定組成任何社團，均須經警務處處長批准，街頭超過九人以上並無關係人士之集會均屬犯罪行為。在這些規定之下，市民只要不企圖計劃推翻殖民政權，仍有某些程度的自由。那段時間我已開始懂事，對此時政府法規有所了解，並影響我對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態度。

中國在六〇年代所經歷的恐怖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波及香港之後引起政治和社會的騷亂和暴動，當時局勢令市民驚恐不已。但對社會不滿的示威行動，則有正面效應，引致日後社會革新。



## 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

一 九六五年九月毛澤東開始積極整肅異己份子，導至發生文化大革命。國內年輕人可以任意攻擊批判文化及學習方式，最令人痛心的是對國內亟需的學者人才大肆蹂躪摧殘。一九六六年夏天八支紅衛兵隊伍，總數一千五百萬青年在天安門廣場會師。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紅衛兵藉口英人在香港有暴力行為，開始攻打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將大使館閘門攻破，投擲汽油罐，令大使館起火燃燒，結果須由周恩來總理下令調派公安武警和人民解放軍，才將英國大使館外交人員救出。

國內的文化大革命並未能阻礙父母親在六〇年代去中國旅行，他們在新華社秘書何銘思陪同下到重慶，重遊戰時他們住過的地方。正當父親對何銘思敘述他在重慶的往事時，他們被成群的紅衛兵包圍，令何銘思驚恐不已。所幸這些紅衛兵並沒有什麼行動，他們只是對父母親感到好奇，因為父母親雖然在外表衣著上已盡量做當地人的裝扮，但他們看來仍是與眾有異。

一九六六年香港一群年輕人反對渡輪加價，作出平和抗議行動，引發心懷不滿的勞工階級青年對社會上不平而無出路的積怨，演變成一連數日的暴動。後來須調動用警察武力，才能制止暴動，其中有一輕年人遇害，許多人被捕及一名示威者事後自殺身亡。除此之外，國內局勢的動盪不安，亦波及香港。

工廠工潮在一九六七年演變成共產黨學校學生反政府的示威，及零星的學生及工人暴力行動。有些香港共產黨或自命為紅衛兵的恐怖份子，在家中自製俗稱為「菠蘿」的土製炸彈，置於公眾場合造成騷動，有些是真炸彈，曾炸死數人，有些只是假炸彈。吳慶塘當時任香港文華酒店的副總經理，他說那時雖然酒店照常營業，但幾乎生意全無。警方直到夏天才開始採取行動，對共產黨的商店、工會及學校進行突擊搜捕，搜捕行動中有數人死亡，多人被捕。在這些動亂期間有數百個社區團體，公開表示支持香港政府和反對共產黨。

加拿大籍的Ruth Hayhoe在香港親眼目睹一名共產黨員，被他自己的炸彈炸傷。在寄給她住英

國的母親的家信中，形容這些土製炸彈是「小而無害的」。她也提到在她任教的協恩中學所遭受到的困難，她說有位四年級的學生在學校佈告欄內張貼公開信，指責英國政府的「奴化教育」政策，「協恩中學是基督教教會學校」還在校外懸掛一面紅旗。學生受校方譴責後態度非常蠻橫不服，並將她父親帶到學校與校方理論，她父親甚至怒擲班導師。一九六七年的香港社會，瀰漫著一片騷動不安的氣氛<sup>(9)</sup>。

香港街頭發生暴民對公車投擲石塊及毆打司機事件後，倫敦保險協會命令香港保險公司取消所有的暴動險。九龍巴士公司總經理在與太古集團保險公司經理姚剛見面時，請求該公司勿取消巴士的暴動險，以防萬一發生暴動時對司機能有所補償<sup>(10)</sup>。更有人散佈謠言稱紅衛兵正向香港進軍，造成香港居民人心惶惶，開始囤積糧食，將商店貨架物品搶購一空。那年夏天父母親正在歐洲旅遊，坊間便流傳，像利銘澤夫婦這種人物都已離開香港，香港局勢必更加惡化，父母親聽到這消息後，立刻返回香港以正視聽。

父親覺得此刻他有責任在香港盡一份力量，為香港請求中國政府勿再煽動群眾，或許能有所幫助。父親的朋友姬達(Jack Cate)當時是香港政府的保安司，在情況最混亂的時候每天都到父親的辦公室向父親求助<sup>(11)</sup>。後來父親便請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及《大公報》發行人費彝民，代向周恩來請求勿讓暴動在香港蔓延下去<sup>(12)</sup>。事實上，當時香港的暴動和中國並無太大關係，後來周恩來總理特別指示香港新華社，在香港的立場要維持不變。

此時香港的情勢，令母親憶起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時的恐怖景象，她非常驚怕，但父親卻毫無畏懼，他決不考慮離開香港，他願用生命來保護這塊土地。父親於是率先發表公開談話安撫人心，並指責共產黨的行動對香港社會造成動盪混亂的現象<sup>(13)</sup>。

但此時中國大陸的局面更趨惡化，任何人都有受紅衛兵批鬥的可能。母親的表哥陳耀真教授和他太太毛文書教授二人都是眼科專家，文革時被紅衛兵當眾辱罵、毆打、趕出家門，他們的莫須有罪名就是知識份子，成份不好，尤其陳耀真更是美國哈普金斯醫學院出來的醫生。幸好他們總算苟存性命，下放他方，直到七〇年代初，父母親才輾轉找到他們夫婦二人。一九七八年底我們在北京和

陳教授夫婦見面時，陳教授還給我看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藏起來的一頂法國扁呢帽和一雙西式皮鞋，那時他若被紅衛兵發現這些所謂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夫婦二人怕早就沒命了。

當紅衛兵像蝗蟲般啃蝕中國大陸時，香港海面常見有大陸飄流過來的死屍<sup>三</sup>。死狀之慘令香港居民極為憂慮和恐懼，只因家家都有親人留在國內。

幸而後來香港局勢逐漸好轉，一九六九年年初已大致恢復正常。

## 社會改革

### 香

港一九六六年的暴動，令香港政府在教育上增加三倍經費，使年輕人有更多機會受教育，並改善公共屋宇、健康醫療制度和社會福利。一九六七年，殖民地政府覺悟到不能只靠十九世紀的中、英條約來維持一個合法政府的威信，而須靠政府的施政及投入社會才能贏得民心。

由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子女，在一九七〇年代時均已長大成人。一九七一年人口調查顯示，香港本土出生人口首次佔香港總人口的大多數。老一輩的難民在香港去世後，亦葬在香港，令他們的子孫對香港開始有了歸屬感。那些在五〇及六〇年代，為香港工商業起飛貢獻過心力的人，現在開始可以享受他們半生辛勞的成果。

政府在教育制度方面的改善，令許多文盲父母的子女有機會受到基本的高中教育。並在一九六九年開始，政府設有獎助學金制度，使家境清貧的子弟在香港能有讀本地大學的機會，值得給予機會接受教育的子弟，會對社會經濟做出更多貢獻，及對香港有歸屬感。香港人醒覺到他們不但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亦對香港付出心力，使香港有今天的成就，便開始對政府作出非政治性，而是改善經濟及社會的要求。

這段期間不斷有大學生、教師、社工、傳教士、護士及工會人士組成的罷工和抗議活動。這些活動基本上都十分理性和守秩序，他們非常自制的藉罷工行動來表達一些有意義的信息，但同時也觸

犯了非法聚會的條例。罷工活動中有極少數的暴力事件，起因皆是由於警方過於干涉而引起<sup>(1)</sup>。

當時大學生發起中文合法化運動，請求政府將中文與英文地位平等，使之皆為法定官方語言。經過多次靜坐示威和公開論壇討論，及在社區團體均廣泛支持此提案下，政府終於同意在大多數政府行政及管理事務方面，可用中文〔粵語〕表達。

香港貪污行為素來猖獗。直至七〇年代，方由大學生及宗教團體代表，組織成千上萬的市民在街頭示威抗議，矛頭直指警務處人員及其他政府機構。一九七三年總督麥理浩任命高等法院克爾法官(Sir Alastair Blair Kerr)，為主持調查皇家<sup>(2)</sup>香港警務處總督司葛柏(Peter Godhun)案件的一人調查委員會委員。葛柏因涉嫌貪污遭停職調查時逃離香港。克爾的兩份調查報告，加上後來社會大眾群情洶湧，導致政府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成立了廉政專員公署，由姬達(Jack Carter)任此新部門的長官。葛柏後來由英國遞解回香港受審<sup>(3)</sup>。當時還有許多其他警官被控，亦有不少人辭職，警務處被迫重新改組。後來廉政專員公署訂定：公務人員受禮為犯法行為。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若干教會團體在整個七〇年代不斷組織勞工抗議示威，在共產黨及國民黨的勢力之外發展了無政治背景的工運，促使政府修改勞工條例。繼護士罷工之後小學教師罷工成功，組成了教師工會。白領階層及藍領階層的工會紛紛成立，對政府當局的專制權力正面挑戰。在香港的遮打公園、維多利亞公園、政府大廈前的廣場及督憲府門前，都是大家熟知的公眾集會場所。雖然政府明令禁止在公眾場所非法集會，但社團申請集會亦逐漸減少，到後來甚至警察還保護遊行示威者的安全，及遊行時為他們指揮交通，讓示威群眾向政府當局呈遞請願書<sup>(4)</sup>。

政府在群眾示威後，做了相當大的讓步。在此過程中，香港社會及政府雙方結構都更加鞏固，香港政府一改其殖民方式作風，對民眾在教育及語言方面的要求較為順應，政府部門的服務提高，社會公正亦有改進。擁有最高權力的殖民地政府，在七〇年代初期的行政運作方面有了極大的改變。

父母親認為從七〇年代開始，香港總督只屬外交官身份，再不能使香港市民唯命是從了。



## 父親和教育

父親畢生對教育熱衷支持，一九六九年以前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一直未設有獎學金，時常有家境清貧的子弟考入大學，但無力支付學雜費，而向私人求助。父親常接到這類信件，他總是放在衣袋中，隨時提醒自已抽時間處理，父親會先查閱這些學生的成績紀錄，若是值得幫助的好學生，父親便會在經濟上資助他們學費、食宿費用及零用錢。父親在晚年時，為防自己有任何不測，常在一年前就預先支付所有的費用，幫助這些學生讀書<sup>(16)</sup>。

有些學生曾說過，父親是香港唯一不怕麻煩給他們回信的富人。父親對這些學生從不要求回報，有些受父親幫助過的學生日後非常有成就，他們對父親的幫助永誌在心。父親在為青年教育方面所付出的心力，全不受個人因素的左右，他本人是基督徒，但他一樣熱心去主持孔聖堂中學的開幕典禮。父親對創辦旺角勞工子弟學校這類教育機構最為熱心，更大力支持籌募建校基金的活動<sup>(17)</sup>。

陳之昭是母親表兄妹陳耀真和毛文書的女兒之一，文化大革命時她同一位中山大學醫科同學，由大陸坐船和其他難民一起逃到香港。她和母親聯絡上之後，我父母親就負責照顧她生活起居和教育，父母親還送她去美國學英文，後來再進入哈普金斯醫學院讀書。陳之昭初到美國讀書時須用英文由頭學起，她能和父親當年一樣，在哈普金斯醫學院讀完眼睛專科，實非易事。她現在是美國馬利蘭州貝西斯大的國家眼科研究所的免疫病理科主任<sup>(18)</sup>。

父親的秘書胡太太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退休，父親屬意利氏企業旗下的華利貿易公司工作的李樂君，來做他的私人秘書。李姑娘告訴我父親要用她的原因，是她在工作空閒時不像其他的秘書小姐只看些八卦書報，父親去華利貿易公司，時常見她在讀書，但父親不知李姑娘是在準備國外大學入學托福(TOEFL)〔以英語為外國語言的測驗〕考試。那時李姑娘才十九歲，她覺得年紀太小不夠經驗，但父親告訴她將來可在他身邊學到很多新事物，才讓她有信心開始為父親工作。

父親喜歡見人進修充實自己，所以要李姑娘去香港大學夜校讀英文。李姑娘說她連生病都不敢缺



課，因為憑父親與大學的關係，她缺一堂課父親都會知道。她剛開始為父親工作的頭三個月，因情緒緊張經常失眠，多年來做父親的秘書，因他的直脾氣，令李姑娘常掉眼淚，但她也知道父親的批評都是善意。李姑娘對自己的英文電話會話能力很沒有信心，但在父親的辦公室又非常需要，所以第二年父親便經香港大學安排送她去英國牛津大學，讀六個星期的英文暑期班。暑期班在七月才開始，但父親早在一月份就付清全部費用。李姑娘在英國時由她妹妹暫代父親秘書的職位。

父親一直樂意幫助有意向學的清貧子弟讀書。有一位學生叫譚麗芬，當時正在英國拿兩年獎學金讀大學。她寫信告訴父親，想進香港大學讀醫，但家境不許可。經父親查證她確是獎學金學生，父母親是《大公報》的記者，父親便答應，只要她能申請進香港大學醫科，父親就資助她完成學業，譚後來成為一位婦產科醫生。父親去世後，經由他生前所建立的各種關係，譚還幫李樂君的先生找到一份工作。

譚麗芬目前在香港衛生署助理署長，在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八年香港盛行家禽流行性感冒，與中國協商進口健康雞隻來香港的負責人即是譚麗芬。

李姑娘非常了解父親的為人，她不但每天在工作上和父親相處，同時父親的支票也經她開出。她告訴我：「你父親要我按月開出八百元的支票，給一位得了肺結核的看更子女讀書，至於他所資助的每個大學生，都是在一年前就預付所有費用。」

李姑娘後來嫁給父親老朋友亦是利氏企業職員徐鏡波的兒子。七〇年代後期李姑娘有了家庭，父親不出海時，就把遊艇借給李姑娘和她的丈夫與孩子使用。

## 高等教育

### 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的內戰接踵而來，大量中國難民湧入香港，對教育需求極大，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更為迫切。

在六〇年代中期，香港僅有一所大學。香港大學於一九一一年創立，創校的目的是作為中、英學

術交流中心，以推進中、英了解及友好關係，換言之，非為香港社會大眾而設。太平洋戰爭之前，這所大學只是學習西方文化的一個前哨站，學生多來自東南亞、中國及香港。一九四六年時，為維持英國在遠東地區的地位與聲望，確有必要重組此大學。一九四八年父親好友賴廉士成為大學校長，父親亦加入大學校務委員會為委員。

一九五〇年調查報告，認為香港大學應反映香港本地社會需要，而非僅為維持英國聯邦在遠東的地位。

由於國內時局不穩，一些國際學術機構撤離，國際文化活動中斷，令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上更顯重要。

香港工業化產生對高等教育的需要，難民人口中有大量國內中學生無法回到國內繼續升學，須在香港繼續學業。但在香港大學學位不足，又採用英語教學，中文中學的學生，能進入大學的機會非常微渺。

港督葛量洪委任一特別委員會，負責檢討高等教育問題。委員會發表的《賈士域報告書》(Kewick)，是第一份公開文件，提議香港高等教育必須適應香港市民需要，並建議香港大學仍是本港唯一頒授學位的學府。政府便立刻撥款給予香港大學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學年開設中文課程，校方對開辦中文課程建議在教務會中獲得通過，但在校董會卻遭否決。校董深恐開辦中文課程之後，最終會使大學有所改變，而且認為香港大學在戰後當急之務應在鞏固方面，而非發展新方向。

一九五三年，英國大學行政管理專家曾寧士(Ivor Jennings)和盧根(Douglas Logan)，受邀對香港大學發展提出意見。在他們發表的《曾寧士、盧根報告書》中，主張香港大學仍應維持以英語為授課語言的大學，他們二人認為政府只須在中文中學與英文大學之間填補缺口，即可銜接中文中學畢業生進入大學，於是便有金文泰中學特別二年制的設立，但因受惠學生不多，未能解決問題。

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是分開中、英文教學，英文學校的學生有小學至大學的完整體制，而中文學校則止於高中。在一九四九年前，香港中文中學畢業學生可去中國繼續升學，因香港中文學校完全依照中國國民黨政府制訂的學制，用上海出版的教科書，同時香港的中文學校多與廣州的學校有聯

繫。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香港學生便無法前去升學，加重教育制度負擔。尤其在大量中國難民學生流入香港後，問題更加嚴重。

來自中國難民中有富辦學經驗的學者，便在香港承擔起新的挑戰。這些學者和專業人士之中，有些人是以發揚中國文化和培育知識青年為己任的教育理念興學，但亦有為求謀生，開始以設備簡陋和租來的課室，創辦起所謂「難民學校」或稱「流亡書院」。根據香港政府在一九五二年的調查，共有三十多所這類學校，程度及課程長短參差不齊。有九所程度較高的機構開設四年制文、商課程，其中新亞<sup>(10)</sup>、崇基和聯合書院前身的院校，成為日後香港中文大學的基本成員書院。這些書院全有賴於國際友人的支持得以維持，如崇基書院建校得到基督教會大力援助，另外在香港聖公會會督何明華不斷的奔走努力爭取之下，政府終於同意在馬料水撥地建校，成為日後香港中文大學重要的資產。

到了一九五六年，這三所書院所頒授的學位已獲歐、美許多大學承認，有些大學甚至還對傑出的書院畢業生提供獎學金。但是在香港，書院畢業生的學歷在公職就業或職業訓練時卻全不獲政府承認。三所書院屬私人機構，財務上完全沒有政府的資助，但卻受教育署及一九五二年教育條例管轄。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三所書院聯合向政府爭取香港政府的資助與承認。

三所書院的代表經過協商之後，雅禮(Yale-in Asia)協會駐新亞書院代表兼董事郎家恒(Charles Long)，於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向教育司高詩雅(D.J.S. Crozier)，提出建議書。指出私立院校不應被規範於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例，因該法例只適用於香港的中小學。政府應另外訂立具有大學程度的大專學院法例。再者，作為香港教育制度中的一部份，院校不能全靠外國機構、教會或私人資助，香港政府一定要負起責任提供基本設備與經費的支持。他又提到在現行教育制度之下，僅有香港大學是唯一頒授學位的學術機構，令上千的優秀學生選擇往外地及台灣升學，造成未來領導人材的流失。建議書結論並稱，無法與香港大學獲同等地位的專上院校，亦很難對大學教育作出最佳貢獻，因此專上院校必須獲得頒授學位的資格。這份文件成為政府創立香港中文大學的第一批公文檔案。

一九五六年一月教育署副教育司毛勤(J.G.Morgan)，在討論如何解決香港學生升學問題時，提到根據觀察結果，政府每年津貼香港大學八百萬元經費，給予英文中學學生，但對中文中學學生升學卻極少或毫無資助，令中文中學深感不平。毛勤在同年十月的另一份備忘錄中，舉出五項不同辦法，以應付中文中學學生的全盤需要，其中最具意義的是提到「建立一所具有自己的大學條例和擁有頒授學位資格的中文大學」<sup>(21)</sup>。但備忘錄結論仍強調以加強現有香港大學的發展以配合社會需要才是最佳的辦法。一九五六年十月，香港的擁護國民黨人士，和親共人士衝突，發生流血暴動，令香港政府覺醒不可再忽視市民對更多大專教育的要求<sup>(22)</sup>。一九五七年一月崇基、新亞及聯合三所「流亡書院」代表在教育署開會，聖公會會督何明華和雅禮協會駐新亞書院代表朗家恒亦同時出席，但未能達成任何決定。三院隨即在二月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為香港中文大學建校之路邁進一大步。經過多次會議協商之後，一九五八年八月各方代表終於同意在香港成立一所新的大學。

## 一所新大學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香港政府正式宣佈，將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新大學。港督柏立基(Sir Robert Black)聘請多年來擔任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及導師富爾敦爵士(Sir John Fulcon)為顧問「他也曾是父親及歷任港督柏立基，和麥理浩Sir Murray Maclehoze的老師」。他在一九五九年完成《香港專上學院發展報告書》，於一九六〇年三月呈交港督。在此份報告書中他指出學術自由、大學自主、研究工作和結合中、西文化，對形成新大學的基本特性尤為重要<sup>(23)</sup>。

馬臨教授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七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他認為後來被封勳爵的富爾敦爵士，應該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催生功臣。又因父親與富爾敦爵士的私交甚篤，父親曾親自赴英國富爾敦退休所住的約克郡，與他當面談及香港中文大學，令富爾敦對未來的香港中文大學有更多的了解。父親在這方面非常有說服力<sup>(24)</sup>。



三所書院在此之前的發展經驗，多源自中國及早期與美國教育基金會及和美國大學的關係，但缺乏英國方面的經驗與聯繫。此時富爾敦爵士便為香港中文大學帶來英國牛津、威爾斯及塞撒斯三所不同大學的發展運作經驗。一九六〇年及一九六一年英國文化協會和香港大學多次舉行座談會，討論交換意見。《富爾敦報告書》完成後，隨即委任由二十人組成的大學臨時校董會，校董會成員包括兩名政府官員，三間書院的院長，香港大學校長賴廉士，及其他社會知名人士，主席由關祖堯擔任，父親是副主席。校董會在短時間內即決定將大學命名為「香港中文大學」，父親同時亦被任命為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和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的主席。由此時開始，直到父親去世，父親為香港中文大學在建校及成長過程中，付出無限精力和心血。父親對香港中文大學的情感一如他自己的子女，馬臨教授對我說過，若沒有父親對香港中文大學所做的各種貢獻，香港中文大學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sup>(1)</sup>。

在校董會向政府極力爭取之下，政府終於同意將位於馬料水<sup>(2)</sup>，毗連崇基書院，面積達三百英畝，風景優美的大幅土地，撥給香港中文大學作為建校及將來擴充校舍之用。一九六三年九月，香港中文大學條例在立法局通過，大學成立典禮在同年十月十七日，由香港總督柏立基以大學監督身份親臨主持。

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首次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會議在公爵大廈父親的辦公室舉行。這些會議後來繼續在父親不同地點的辦公室舉行，直到一九七七年才改到利園酒店開會。一九八三年父親去世之前，他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這個委員會及校董會服務。

監管興建大學校舍的職務，對身為土木工程師的父親極為適合，工作任務非常重大，整個建校計劃就如同在一片須先將山地夷平的土地上，建築一個小型的市區一樣。山石泥土運到對面吐露港的船灣淡水湖工地，做建壩工程之用<sup>(3)</sup>。除原有的崇基書院校舍之外，委員會須在全無道路及下水道的新生地上，策劃興建校舍細節。在一九六六年的會議紀錄中提到，因無法確定政府是否在未來兩年內有由沙田淨水廠鋪設水管來校園的計劃，所以校園廁所衛生設備須用海水。另外在一九六七年會議紀錄中亦建議，因部份山坡地斜度太大，無法鋪植草皮，須立刻在斜坡地種植樹木以保持水



土。

香港中文大學非常得益於父親在香港政府的人際關係，能請到父親友人司徒惠為大學的建築師，另外又請船灣工程公司的工程師為香港中文大學工作。建校初期，父親還請司徒惠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學觀摩，司徒惠在一九六〇年代中開始設計香港中文大學建築之前，曾走訪了十五所世界上最著名也最美麗的大學校園<sup>(2)</sup>。

父親身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的副主席，一年須主持一、兩次校董會。父親主持的會議向來以速戰速決聞名，而且絕對準時開會，會議過程極少超過四十五分鐘。一次會議中一位校董遲到十分鐘，等他坐下來開會時，他的會議部份已經結束了<sup>(3)</sup>。

父母親來多倫多探望我們時，常聽父親談到設立香港中文大學對香港華人居民的重要性。父親不但不辭辛勞的為香港中文大學與政府交涉，完成校舍的興建，同時對大學基金亦做出巨額的捐獻。父親對香港中文大學最具體的信心表現，就是讓志剛弟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直至畢業。弟弟初入大學時住學校宿舍，他告訴父親學校的床墊不很舒服，結果父親將宿舍所有床墊全部換新！

一九八三年初，父親想要試驗製造一種用來釀造中國米酒，亦作中藥用的生酵母。他便請教馬臨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化驗室製作這生酵母的可能性，結果父親非常高興試驗成功，並計劃在家中自行試驗發酵。他對不同的醫藥一直深感興趣。

父親對香港中文大學的前途極為關心，在父親的遺囑中，對待香港中文大學就如同他的子女一樣。父親去世後，母親繼續對香港中文大學熱心支持，也將香港中文大學視如自己兒女一樣。利氏家族中亦有其他成員，受父親影響對香港中文大學慷慨資助。祖父時期的藝術品中，我最欣賞的是一座長毛巨象的象牙雕刻，整座象牙上有雕工精美的三國演義故事，這件珍貴的藝術品，現在正巍然的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陳列。

母親在父親去世不久，便在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外科科學部設立利銘澤金牌獎，獎勵成績最優異的應屆畢業生，以紀念父親。

一九八七年九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一項命名典禮，將大學科學館演講大樓命名為「銘澤樓」，

以紀念父親生前對香港社會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卓越貢獻。一九八八年十月香港中文大學因母親在公益慈善方面的熱心，及對香港中文大學的繼續支持，給她特別頒贈榮譽博士學位。

# 第十一章

## 日本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人在香港創業顯然有極大困難。父親雖然在戰時曾參與抗日工作，但他認為日子太平後，大家都應不再計較過去。父親的遠見是，日本在戰後不久的將來經濟必會蓬勃，所以父親希望與日本建立長遠的良好關係，為香港人帶來繁榮。

一位在東京早稻田大學唸書的華人學者，創立了一個屬於學術研討性質的逍遙會。因父親思想進步，所以常被邀請參與這個日本商業高層人士在香港所組成的月會<sup>①</sup>，月會每次都是十二人一桌聚餐晚宴，事後父親必會再回請他們。日本人對父親極為敬重，任何日本商人包括日本總領事在內，到達香港之後，必先對父親做禮貌上的拜訪以示尊敬<sup>②</sup>。

當日本人俱樂部於一九五五年在香港創會時，父親是最先願意提供協助的人士之一<sup>③</sup>。日本人俱樂部原本設於海港酒店，共有一百〇六個企業及私人會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時會員已增加至二萬五千個，俱樂部除了餐廳設施之外，尚有中、英文班、娃娃製作班、國畫及書法班等活動<sup>④</sup>。日本人俱樂部在香港發展史上，會址多設在利氏家族的物業內<sup>⑤</sup>。由七〇年代開始，父母親每年定期在利園酒店宴請所有在香港的日本企業人士，介紹他們與中國商界認識，促進雙方交流。

六〇年代末期，日本財經機構為求生存，必須與香港的商界巨頭結合，在香港設立分公司。曾有多家日本企業邀請父親入股<sup>⑥</sup>，但父親立場是一概不參與，唯獨教育方面是例外。

## 日本學校

父親為日僑子弟在香港建立日本學校出力不少。父親協助日本學校申請到外人在港經營外國學校的政府許可，及取得教育署、工務局的認可，通過衛生、防火條例。根據日本駐香港總事對日本政府的報告中表示，香港日本學校若沒有父親的大力襄助，建校過程將會困難而冗長。

父親獲悉日本學校建校計劃時，建議將校址設在希慎道 upper 利氏家族的崇明大廈內，因設在該廈的香港教育署預備遷移至對街即將完工的利園酒店出租樓面內<sup>(5)</sup>，但因當時日本學校的籌備建校委員會尚未組成而作罷<sup>(8)</sup>。

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的租務向由五叔管理，當時有許多人表示有意承租香港教育署遷出後的空間，但父親執意堅持將空樓保留給未付分毫租金及訂金的日本學校。在樓面空置半年之後，至一九六六年一月，日本政府才撥出香港日本學校建校預算，此時香港日本學校才有能力支付租金，及簽訂租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香港日本學校<sup>(9)</sup>正式開課，校舍設在希慎道崇明大廈<sup>(10)</sup>二樓和三樓，共有七十名學生。開學第二天，五叔即到學校去見藤田一郎校長，遵照父親的指示，將一月至三月的租金退回校方。學校每個人對父親的慷慨大度都覺得難以置信<sup>(11)</sup>。

父親對日本學校的發展極為關切，經常對藤田一郎校長提出不同的建議。學校後來在嶺英商場擴充課室<sup>(12)</sup>，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日本學校小學部在藍塘道正式開課，學校繼續擴展後又將初中部設在寶馬山道，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開始上課。日本學校各校的開幕典禮，父親都被邀請為出席貴賓。在寶馬山中學部開學儀式中，校長藤田一郎對來賓和師生面前發表演說時，特別提到他與父親之間的珍貴友誼，及對父親的感激，更介紹父親是「香港日本學校的大恩人」<sup>(13)</sup>。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父親受日本天皇賜封勳三等瑞寶章，是日本在一八八八年所創的第三級最高榮譽勳章<sup>(14)</sup>，授勳典禮於寶珊道二十四號，日本駐香港總領事岡田晃官邸舉行。父親對這枚日本勳章感到非常光榮，雖然英女皇在幾年之後才准許父親佩戴這枚日本勳章，及使用勳銜，並規定

在使用勳銜時必須用全銜，以免和他的英國勳銜混淆不清<sup>(15)</sup>。

## 中國與日本之間

日本政府在一九六〇年代亟欲與中國重建外交關係，由於無法直接與中國官方聯繫，便交由駐港總領事進行籌劃，此時日本駐香港總領事是岡田晃，與父親頗有交情。在岡田晃的《水鳥外交秘話》著書中，提到他們夫婦二人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日，接受我父母親邀請坐船出海時，他和父親討論到中、日之間重新建立邦交的可能性。當時父親表示願意循他在北京朋友，周恩來和廖承志的渠道，來做橋樑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駐港總領事岡田晃在日本與日本首相佐藤見面，商討中、日關係的問題。日本首相明確指示岡田晃須注意下列事項：日本同意視台灣為中國一省的看法；同時日本不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但認為中國應停止干涉日本內政；並聲明雖然日本同意台灣在聯合國會席位僅是臨時性，但亦不會贊成在短時間內要求台灣退出聯合國；及日本政府須知道今後進行中、日邦交正常化應走的方向，因為至目前為止，中國全不接受日本官方代表訪問。日本首相希望岡田晃經由他在香港的友人，進行與北京作適當的接觸，首相更准許岡田晃必要時赴北京完成此任務。由於此事在日本外交事務上事關重大，所以岡田晃可以越過外交部直接向首相報告。

身負重任的岡田晃總領事於九月十四日返回香港，原本可求助於和他交情很深的一位周恩來在南開大學的同學唐炳源，但不幸唐炳源在六月十七日去世。憑父親與中國的關係，及與岡田晃個人的私交，他認為父親是在中間促成此事的最佳人選。但不巧父親離港外出數星期，岡田晃便求助於恒生銀行的國偉三叔，他是父親的堂弟。他與岡田晃是因恒生銀行關係而相識，但與中國官方往來則全經由父親<sup>(16)</sup>。國偉三叔與岡田晃第二天見面後，立刻將岡田晃介紹給父親的好友《大公報》發行人費彝民，請他代將日本政府的意向傳達至北京。

九月十六日，周恩來總理接見了來華訪問的日本國會代表川崎秀，會面時周恩來表示：在日本同



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並接受台灣是中國一省的原則下，中國歡迎日本官方代表來華訪問。岡田晃相信北京方面的迅速反應，必和國偉三叔的中間工作有關。國偉三叔與岡田晃在九月十七日會面時，他表示在香港的中國官員，與岡田晃會面應無問題，但正式與日本外交部會談，那就要看北京政府的決定。他提議佐藤首相親自提出建議，經非官方的日本訪客赴北京送交周恩來。九月二十日岡田晃向首相辦公室作電話報告時，得知佐藤首相尚未考慮致私函給周恩來。

九月二十一日，香港盛傳毛澤東因病逝世，為此取消十月一日的國慶活動，加上又有報導，日本政府會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中國代表權問題」。由於這些形勢的變化，岡田晃懷疑中國政府方面能否在九月二十三日以前作出答覆。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岡田晃接到國偉三叔的緊急電話，稱北京因突發重大事件亟需處理，無法與日本政府代表會面，商談雙方關係正常化的事宜，希望岡田晃能諒解。後來才知所指的突發事件是林彪事件。

林彪發起印製小紅皮書「毛語錄」，又在一九六五年發行「人民戰爭萬歲」的小冊，鼓吹中國只要動員落後國家的民眾，就像毛澤東動員中國貧農一樣，便可征服全世界。一九六九年四月舉行的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林彪被提名為唯一的副主席，及毛澤東正式接班人。林彪和妻子葉群在一九七〇年四月時也許已經感覺到毛澤東對他們的態度有所轉變，而開始秘密進行反叛毛澤東的計劃<sup>(1)</sup>。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清晨，蒙古外交部召見中國駐烏蘭巴托大使，告知一架中國飛機（載有林彪夫婦和兒子林立果），闖入蒙古領空，在前一天清晨二時墜毀。

中國方面將此消息封鎖數月，外國傳媒至一年以後才獲悉，甚至在一九七二年春天時，日本媒體仍繼續報導林彪，一似他仍在世<sup>(2)</sup>。

國偉三叔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詢問岡田晃是否願意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澳大利亞國慶酒會上，與《大公報》發行人費彝民非正式會面。酒會見面時費彝民向岡田晃證實國偉三叔為中、日關係所說及所做的一切，但由於情勢變化，請日方耐心等待來自北京的進一步指示。同一天，在十月二十五日

聯合國通過決議，承認中國政府有聯合國代表權，日本支持台灣的提案遭到否決。國偉三叔相信若非因為林彪事件，使岡田晃無法在駐香港總領事任內，完成中、日復交的任務，否則岡田晃一定可以成為二次大戰後，中、日恢復邦交的首任日本駐華大使<sup>(10)</sup>。

## 山一證券

一 九六〇年代時，父親再度和牛津求學時期一起打拳的同學小池厚之助重拾舊日友誼，他們常在香港與東京之間互相探訪。小池厚之助是山一證券家族的長子<sup>(11)</sup>，及日本山一證券的主席。一九六四年山一證券因財務困難，求助於日本興業銀行帶頭的各日本主要銀行，小池厚之助便辭去主席職位，由興業銀行的日高輝接任。一九六五年五月，山一財務每況愈下，便再向日本銀行及中央銀行求援。

一九七〇年初山一證券財務好轉後，想要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因父親與該公司前任主席小池厚之助的關係，山一證券的主管便帶著小池厚之助的信函拜訪父親，請求父親幫助山一在香港開業。當時小池厚之助為表示對山一管理不善負責而辭職的遭遇，促起父親同情之念，他憶起當年祖父遇害後，家中財務困難的日子。現在他的好友亦是家中長子繼承父業，需要幫助的時候，父親便表示，若他本人加入香港山一證券能對他的好友有所幫助的話，他會樂意去做。並立刻對公司建議與數位可能成為董事和股東的人士聯繫<sup>(12)</sup>。

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正式營業，日高輝為主席，父親是副主席<sup>(13)</sup>，小池厚之助則是名譽顧問。父親為公司帶入許多具影響力的人士成為董事，並介紹許多重要的顧客。

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訂於八月十六日在香港文華酒店舉行開幕酒會，那天氣候惡劣風球高掛，渡輪已在傍晚停航。幸好風雨並未阻礙貴賓的來臨，有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出席，山一公司認為是因父親的情面，來賓才會風雨無阻的捧場<sup>(14)</sup>。

白石信一<sup>(25)</sup>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sup>(26)</sup>的業務經理，負責拓展香港業務，常與父親會面，報告東京股市行情和香港公司業務。父親見到公司在香港穩定成長，感到十分欣慰。小池厚之助每年都會參加七月在香港舉行的股東大會，父親總是非常高興能與他見面。白石信一說晚宴時父親招呼小池厚之助夫婦最多，雖則日高輝才是「大老闆」<sup>(26)</sup>。

山一證券公司在一九八二年時計劃成為獨資公司，便請教父親向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股東買回所有在外股份的可能性，父親一本他樂於助人的性格，便承擔下這個任務，開始進行向公司的香港股東及董事，買回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的股份，使山一成為獨資公司，令日本山一的股東和董事對父親感激不已<sup>(27)</sup>。

母親告訴我銅鑼灣一帶因父親的日本朋友開設的商業機構而繁榮起來。銅鑼灣是祖父早年購買的銅鑼灣山地，後來利氏子孫繼續發展地產土地，也是大多數利氏家族成員，包括我們家在內，於五〇至八〇年代居住的地方。銅鑼灣吸引了許多日本企業在此投資，日本第一家百貨公司大丸百貨公司便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此設連鎖店。由於需要一位中國經理與日本管理配合，父親便介紹了一位能說日文的台灣朋友劉火炎擔任這個職位<sup>(28)</sup>。日本崇光百貨也在一九八五年五月於銅鑼灣開第一家商店，後來在香港各地都設有分店。另外尚有以高級貨品著名的三越百貨店、日本人俱樂部及日本商會都設在此區。

這些公司在香港開業時，父親總是大力支持，他為三越（香港）百貨公司開幕剪綵後，三越集團主席岡田茂在給父親的感謝信中說：

•••本人堅信是由於閣下的人品和情面，本公司在香港推展業務活動中，才能有如此眾多的社會賢達和知名人士出席支持，在此致上本人最深的謝意。<sup>(29)</sup>

八〇年代時，日本投資已成香港經濟主力，為香港帶來繁榮，父親當年與日本所建立的良好關係，對此有相當大的幫助。

一九九七年日本第四大證券交易公司的山一證券公司，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不幸破產。香港的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則以公司淨值港幣八千八百萬元的售價賣給台灣的京華證券體系<sup>(30)</sup>，在當時經濟不景的情況下，山一的顧問皆認為售價甚為理想。京華證券體系肯投資買下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是想利用山一的國際金融地位以開展中國大陸的業務，公司新名稱為京華山一證券公司。

山一前副總裁白石信一在給我的信中寫到：

當年幸得令尊大人和府上諸位親人的大力相助，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才能在一九七一年開始於香港營業。過去二十七年中，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不僅在香港，同時在亞洲地區建立起良好的商譽，公司財務健全並有精幹敬業的員工。

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過去幾年在經營有關中國方面的股票，亦十分活躍。<sup>(31)</sup>

以目前的情況，對父親非常可告慰的是，在京華證券體系的承購協議書中，同意所有一百二十一位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的员工，得以保留原有職位<sup>(32)</sup>。

# 第十二章

## 愛國華人

中國的領導人稱父親是愛國者，表示父親對中國政府的忠誠。但我認為父親的愛國思想有不同的意義，他愛的是中國人民，不論他們在什麼政府統治之下。

父親年輕時寫給母校的一封信，已表示身以中國人為榮，並對國事非常關心。我在四〇年代末時年事稍長，漸能觀察父親平日為人作風，他一直是盡其所能的減輕中國和香港人民所受的苦難，他雖然單獨一人，但他相信總會有所影響。

母親有一次提起她初遇父親時，父親說英語帶有牛津口音，但後來「我懂英文以後」卻帶中國口音。母親相信他是故意改掉的，大多數人必會以帶有牛津口音的英語炫耀，一輩子不會改，但父親不同。父親素以香港為榮，多年來他曾自費安排英國牛津的學生來香港實地學習，拓展他們的經驗<sup>二</sup>。

父親對政治的冷漠，令他在助人方面更為有力。父親與中國領導人的友誼，常令人誤以為他是共產黨員，他總是說：「我不是共產黨員，就算我想入黨的話也沒資格，因為我是個資本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蔣介石國民黨與毛澤東共產黨在國內展開如火如荼的內戰。父親此時便退居香港，認為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只是暫時由英國管轄。他相信在香港一樣可以為民服務，改善大眾生活。所以由那時開始，他便專心香港事務，但從未忘記他在中國的根，只是在等適當的時機再為中國效力。父親的自我要求是做一個世界上盡忠職守的好公民。

每年的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在一九五〇年代時，父親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受



邀參加慶祝國慶的香港（「非共產黨」）人士<sup>①</sup>。父親多半都會參加，因為他覺得他不但應珍惜與中國領導人的友誼，同時也認為他與中國政要的特殊關係，能為香港居民帶來福祉。香港在各方面都仰賴中國，中國不僅是香港的貨物集散地，同時在食物及飲水方面無一不靠中國供給。

## 解決水荒

香港難民人口不斷增加，水荒問題日趨嚴重。當時香港用水全靠水庫積存雨季帶來的雨水供應，政府雖然不斷增建水庫，但仍無法應付用水需要。五〇年代的配水制度只能暫時解決困難，初期是一日供水數小時，後來隔日限時供水，最後每三日供水一次，六〇年代初期雨水稀少，造成香港嚴重的水荒危機。

香港有困難時，父親總是一如以往當為己責。他常在報章呼籲民眾節約用水。不斷公開地向市民解釋制水原因，和政府正盡全力解決水荒問題<sup>②</sup>。事實上，唯一能夠解決水荒的主要辦法就是由中國取水供應香港，由於北京當局不承認英國在香港的合法關係，不肯和倫敦方面商討有關香港的問題，所以香港只能經由在港華人與中國交涉供水問題。當時在香港僅有父親能與中國政府高層人士溝通，所以與中方協商的責任，便落在父親的肩上。

香港新華通訊社在一九四七年設立，是中國駐香港的非官方領事館，五〇年代初由父親好友梁威林任社長。香港向中國的取水事件便由梁威林居中，和港方代表周竣年及父親，與中國政府代表第一書記陶鑄及廣東省省長陳郁開始協商<sup>③</sup>。

一九六三年五月，周恩來總理允許香港運水輪船每日進出珠江取水，同時中國政府為永久解決香港用水問題，下令相關部門著手研究由廣東東江取水運至香港的可行性。

父親當時非常深入的參與討論向中國取水的方法，在各方積極設法解決用水問題的同時，大家都擔心香港水庫即將乾涸無水可用。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父親再度公開呼籲民眾節約用水，並對民眾解釋由大陸運水不但困難重重，而且僅是暫時救急終非長久之計。他也提到正和中國協商，為

香港永久性的解決缺水問題<sup>(1)</sup>。

香港在六〇年代初期水荒問題極為嚴重，政府宣佈由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起，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僅可每四日供水四小時，人口較少的地區，每四日供水三小時<sup>(2)</sup>。

香港政府終於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和廣東水利局達成協議，正式簽訂供水協定。由東江引水至深圳水庫的水管工程立刻動工<sup>(3)</sup>，完工之後可對香港輸送用水。《華僑日報》在一九六五年一月訪問父親，談到父親對新年的展望時，父親除了祝賀市民新年萬事如意之外，也希望東江引水至香港的工程能如期在三月一日順利完工<sup>(4)</sup>。

工程於一九六五年一月完工，三月開始對香港供水。由每年六千萬立方米<sup>(5)</sup>開始，到夏天時香港三分之二的總用水量，皆由東江引進<sup>(6)</sup>。深圳供水典禮中，父母親是僅有的香港人士，周竣年爵士原本亦想參加，但未得英方許可<sup>(7)</sup>，但卻無人能阻父親前去深圳。

一九六七年暴動令中國對香港供水受到影響，原本中國同意香港水務署要求，在十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之間，對香港供水一百五十億加侖，外加十八億加侖，但在六月初時，香港已用罄中國同意的供水量。香港希望中國在七月份能額外供水二十萬加侖，但中國在六月二十八日仍遲遲未能答覆。於是工務局局長Michael Wright決定在中國未答覆之前，由六月初開始每日供水八小時，至六月二十九日起隔日僅供水四小時<sup>(8)</sup>。根據當時香港與中國的供水協議，要到十月一日才再度開始對香港供水。

香港水荒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時更加嚴重，政府由七月十三日開始，每四日只供水四小時<sup>(9)</sup>。沒有人知道中國不理會香港請求增加供水的真正原因，只能臆測中國當時忙於應付文化大革命混亂，而無暇顧及香港市民的需求。

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生活才逐漸恢復正常，後來又相繼增建兩期由東江引水至香港的工程，第一期由一九七六年開始至一九七八年完工，第二期一九八一年開工，將供水量增加到一年六億六千萬立方米<sup>(10)</sup>，為香港居民永久解決了民生用水問題。

## 香港與中國之間

父

親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在六〇年代引起部份人士的妒忌和猜疑。雖然父親曾為香港出力解決用水問題<sup>(15)</sup>，但有些人批評父親在協商過程中，偏袒中方利益<sup>(16)</sup>。香港殖民政府需要中國支持時就要父親幫忙，但又希望父親與中國保持距離。可是父親絕不會背棄在中國友誼深遠的朋友，所以父親和戴麟趾(David Trench)總督〔任期1964年至1971年〕經常意見不和有衝突。水荒嚴重時，若非中國在緊要關頭伸出援手，為香港解決供水問題，香港根本已不適居住。

父親認為中國人只要中國方面准許入境，就有權去中國探親訪友，無論如何他是個有自由的人，所以當殖民政府禁止父親回國甚至母親返鄉探親，父親的盛怒可想而知。父親一開始就看不起戴麟趾，認為他根本不夠資格做香港總督<sup>(17)</sup>，他相信戴麟趾既要利用中國人，但又對中國人很差，令父親對他極為反感。李國寶當時與父親每星期至少見面一次，日後他告訴我，父親當時雖屬親英，卻無法忍受殖民政府對中國人的侮蔑，在多次爭執後，父親憤而辭去所有香港政府義務工作的職務<sup>(18)</sup>。

此時大家都公認父親是下一位被英女王封為爵士的人選，母親還特別選購了一個非常美麗的青花瓶，上面繪有引喻福、祿、壽的鹿、松及一隻獼猴捧著桃子，來慶祝這件事，豈知父親回來竟告訴母親他已辭職的消息。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父母親由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返港時，有幾位非官守立法議員在機場接機，由簡悅強交給父親一份政府接受他辭職的信函<sup>(19)</sup>。一九六六年時父親已辭去所有香港義務性的公職，他的辭職表示今後他的所做所為不須得到香港政府認可，但並不表示父親不再為香港民眾服務，從此以後他只代表自己而非香港政府。

後來東亞銀行的李國寶赴倫敦，問及有關人士有為什麼父親對香港社會曾作多方貢獻而未被封爵的原因，竟是香港殖民地政府某些官員，將父親列入黑名單之內<sup>(20)</sup>。

父親與中國建立良好關係，並不只是因為父親與許多中國政要是老朋友，而是父親知道香港終須回到中國，他希望能先為主權順利移交做好鋪路工作。父親曾多次告訴我：「主權移交過程必須在平和及互利的情況下進行，絕不可涉及武力。」北京領導人深知父親的誠意，非常尊重父親。父親深信應由港人治港，香港的將來絕不能單靠英國或中國<sup>(2)</sup>。可惜父親無法親眼見到香港主權和平轉移。

父親和國偉三叔似乎是香港最先知道鄧小平對香港一國兩制，及香港保持五十年不變政策的人士。在七〇年代初，父親和國偉三叔一起去中國時，某政要召父親入室，告知一些特別消息。父親對國偉三叔說：「國偉，你也進來，我要你聽聽談話內容。」<sup>(3)</sup>當時中國政要對父親保證香港主權移交後，一切維持現狀不變。

父母親在七〇年代初來多倫多探望我們時，父親曾和我談到中國問題。他認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國已足夠苦難，二十一世紀是屬於中國人的，而我一定可以見到中國再富強起來。我才發現他對中國及中國人民的關切有多深。

父親一直認為中國與香港政府和市民關係歧見太深，一九八二年六月父親在德國法蘭克福的國際會議中，對香港經濟機會的演講中說到：

中、港政府之間的關係，無可置疑的存在緊張情況，表面看來比實際的嚴重。這大都由於殖民政府以前官員的淺見和倫敦殖民部政策。但香港市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卻並非如此。

這段話是指一九六〇年代的情形，後來父親又提到一九七〇年代總督麥理浩所作的改善：

在總督任期內，因他獨到長遠的眼光，和治事的能力，令中國與香港的關係開始有了顯著的改進。<sup>(4)</sup>

## 中國關係

**對** 父親來說，七〇年代是他致力為香港與中國政府之間做橋樑工作的日子。他與殖民地政府關係決裂後，政府再也不能批評父親言行。當年香港商人根本不願進入中國旅遊或投資，事實上，中國是港商避而不去的地方。

父親為香港主權移交能順利進行，認為雙方需要對話。為了促進香港與中國雙方的交流，父親每年春節都會舉辦春茗，邀請願意與中國接觸，認識中方代表的工商界領袖、政府要員和父親自己的外國友人參加。因父親在香港的人際關係，受邀者幾乎都會出席，如此一來雙方便能開始交往，繼續使所有人獲益。

新華社亦十分願意與香港工商界及立法、行政兩局議員多接觸，當時的新華社社長梁威林日後告訴我：「若由我發帖邀請這些人，沒有人會到，但你爸爸出面就不同了，大家都會來。」<sup>[14]</sup>父親每年春節在利園酒店舉辦的春茗，就像香港名人集會，後來成為香港一年一度的社交盛事。

父親的春茗只請男賓，女眷不在邀請之內，但女性議員仍被邀請。父親的秘書李姑娘在會場招呼賓客入座後，宴席開始之前即須離場。一本名流雜誌中有段花邊新聞報導，說父親有位外籍友人初到香港受邀參加春茗，不知春茗慣例，帶了妻子一起赴宴，到了利園酒店才知僅有男客可參加宴席，連忙將太太送回旅館，再獨自回到會場<sup>[15]</sup>。

有一年我們回香港時，正逢父親舉辦春茗，但只有衛權可去，父親便要我當晚帶孩子們去利舞台看魔術表演，因為我不能參加。雖然父親認為春茗是男人的宴會，但他去世後卻由從未出席過春茗的母親出面擔任榮譽主席，繼續數年舉辦春茗，父親有知的話不知作何感想！

父親也和其他中國人一樣常回鄉下故居祖祠。嘉寮村是戰後父親最先著手幫助的地方，他見到幼年和祖父坐船運送曾祖父遺體經過的舊橋已破損不堪，便捐造新橋。我們在九〇年代回去時，一到嘉寮村，村民就急著帶我們去看這座他們非常引以為榮的新橋樑。



我們同時也參觀了父親和銘洽二叔合資贈建的新校舍及學童遊樂場，另外還有一家父親幫助村民開創的小型製帽廠，廠房是一間十分整潔光亮的大房間。日後我們再次返回嘉寮村時，這家製帽廠已開始兼做海外名牌帽子，村民對他們的成就非常驕傲。

多年來父親和他的弟弟都一本國人飲水思源的傳統，在故鄉興學建醫院，並對祖祠故居新會出力。一九九二年，新會市政當局特別頒贈新會榮譽市民金鑰給母親，以紀念父親對故鄉的貢獻。由於曾祖父早年由開平移居新會，開平在一九九三年亦對母親頒贈金鑰。

因父母親常去中國旅遊，所以父親對中國的見聞非常廣博。新華社的何銘思常陪同他們進入中國訪問，他說父親在旅途中，對大城市發展及鄉村僻野的各種大小事情都充滿興趣。

一九七七年他們遠赴中國西北部旅遊甘肅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次年一月父親還在香港華商銀行公會作《祖國西北行》的演講，放映上百張的彩色風景及劉家峽水電站的幻燈片，甚至還展示了他的新疆戈壁沙漠帶回的石塊<sup>(5)</sup>。父親對特殊的石頭非常欣賞，他對喜愛的事物有感染性的狂熱。

父母親在一九七八年來多倫多時，對我們提到許多新疆、甘肅旅行的趣聞。並給我們一些相片留念，我最喜歡的是父親騎單峰駱駝的一張。在新疆自治區的烏魯木齊時，當地族長以貴賓宴席款待父母親一行人，他們第一次吃到新鮮的髮菜。髮菜是中國人在年節為討其名吉利而常用的吉祥菜，因為音近廣州話的「發財」，一般人都不知髮菜是一種沙漠植物，還以為是海產。族長為了要對遠道而來父母親表示歡迎的誠意，特別準備了一道當地最名貴的上菜，就是羊眼。母親說：「當我看見盆中羊頭的那對眼睛瞪著我看的時候，我已經要作嘔了！」

在文化交流方面父親亦曾出力推廣。一九六八年，在河北省滿城出土的西漢（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十四年）劉勝墓<sup>(6)</sup>，內有中山靖王后寶綰的「金縷玉衣」，長約一百八十八公分。《大公報》費彝民希望能將這些從未在海外展示過的「金縷玉衣」及其他在一九六九年甘肅武威東漢墓出土的銅奔馬，即一般人稱為「踏燕飛馬」、鍍金銅宮燈和秦陵將軍俑等古物<sup>(7)</sup>安排在香港展出。便請父親協助統籌展覽，父親得到霍英東同意將展覽場地設在星光行，並安排保險、警衛安全及售票等事宜。展覽規模相當龐大，共佔地三層，參觀民眾反應非常熱烈。此次中國歷代文物國寶能在香港首

次展出深具意義，令殖民地市民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留下深刻印象<sup>(29)</sup>。

中國官方時常經由香港新華社在年節時將一些特別的禮物，像香港市面買不到的中國特產水果，和春節的牡丹花、金桔樹和小蜜柑送給父親表示敬意，父親對中國送他的禮物覺得非常榮幸。父親去世後，中國官方仍繼續送禮物給母親。

七〇年代有一天李姑娘接到香港新華社的電話，用廣東話說有「一粒荔枝」特別由中國運來香港給父親，要李姑娘派部大車去取，她不明白為什麼要用大車去取一粒荔枝。李姑娘誤以為新華社的人用俗語將「粒」字的發音改為近「籬」字的發音，但她還是派了大車去取，結果取回一大籬的荔枝。原來音近「粒」字發音的「籬」年輕人已不大用<sup>(30)</sup>，所以把李姑娘搞糊塗了，這是她一輩子的不會忘記的笑話。那天所有公司同仁都有分食到荔枝。

父親一生中助人無數，常有人送禮到家中或寫字樓。其中有一兩位對父親的成就非常妒忌，故意送鐘給父親，令李姑娘非常反感，因為國人送禮最忌送鐘，廣東民俗「送鐘」有咒人早死之意。但父親毫不迷信，他說「如果他們要送鐘給我，也沒什麼不好。<sup>(31)</sup>」

父親是戰後香港首位經常赴中國旅遊的知名人士，以父親的名氣，當年國內有許多青年男子自稱是父親的兒子，但他們不知報章上提到父親訪問大陸時，母親都有同行，同時也必有中國官員陪同隨行。父親對這類無聊流言全不理會，「同樣地，國內也有許多年青女子自稱是母親的乾女兒，因為她們無法說是母親的親生女兒，只好自認是乾女兒」辦公室員工每次聽到有人要向父親歸宗認祖時，都當笑話談論。樹源叔公和公司同仁都認為若是妄指別人的話還有可信度，但這些人想要與父親扯上關係的話，就應事先做些調查工作再開口<sup>(32)</sup>。

父親和香港太古集團的姚剛在七〇年代時成為好朋友<sup>(33)</sup>，雖然父親身為利氏家族企業的主席，而且利氏家族與太古集團在一九四八年開始就建立了良好的商業關係，但父親和姚剛是在一九七二年，姚剛成為共濟會「美生會」分會主席之後，才開始成為好友。在共濟會的會議中，他們二人經常坐在一起，每年一月在日本舉行的共濟會會議他們也常一起出席，父親開始對他產生信任，在私事和公事上常請姚剛參與。

姚剛在中國工作多年，有豐富的經歷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加上他能說多種中國方言，每當父親有國內的朋友訪問香港時，任何飯局聚餐，父親總是要姚剛一起參加。正因如此姚剛得以結識多位來港做非官式訪問的官員，如廣東省省長、副總理及各部門的首長等<sup>(34)</sup>。父親樂於利用他和中國領導人的特殊關係，幫助各方人士的熱心，令姚剛非常欽佩。

一九七八年中國對外開放投資，中國政府便邀請太古集團訪問北京。太古集團由一八〇〇年代開始在中國即有業務，當公司宣佈駐中國代表人選時，父親表示反對，父親堅持應由姚剛代表太古集團，雖然姚剛覺得自己年事已高，公司應派年輕代表駐中國，但父親認為有姚剛居中對雙方都有益處，所以姚剛還是去了北京。

一九八一年有一天父親打電話給姚剛，要姚剛在下星期三騰出整天時間，幫父親接待一位由中國來香港訪問的部長，父親並要姚剛為這位北京來訪有工程學識背景的部長，安排計劃當日訪問行程。那天早上八點三十分，漢釗哥也同在利園酒店，父親為姚剛介紹認識了當時是電子工業部部長的江澤民，父親對姚剛說：「姚剛，好好招呼這位客人，他是個前途不可限量的人。」姚剛帶江澤民參觀機場設施，特別是太古集團的國泰航空公司飛機維修部門，及政府在九龍興建的廉價屋宇，江澤民特別感到興趣。姚剛並以豐盛的午宴款待江澤民，二人就財經方面問題交換不少意見。父親認為姚剛與江澤民都來自上海，有許多共同話題，是接待江澤民的最佳人選。後來才知道江澤民的副部長魏鳴一，與姚剛是北京大學的同室校友，在一九四八年時，是魏建議姚剛去英國為太古集團工作。江澤民由香港結束訪問返國後，即出任上海市市長，姚剛還去上海拜訪過他，並成了朋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後，江澤民成為黨總書記，魏鳴一成了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泰富集團的主席<sup>(35)</sup>。姚剛深信父親是個有遠見的人，和許多其他人一樣，都認為父親對人的觀察力極有眼光。

麥理浩總督是第一位接受中國邀請，訪問北京及華西的香港總督。在訪問結束時，並赴廣州出席廣九鐵路直通車<sup>(36)</sup>通車典禮。當時父母親正在新華社社長王匡<sup>(37)</sup>陪同下往海南島旅遊，為了要讓父母親能參加通車典禮，還特別派專機來海南島接父母親前往廣州。但當時風大，飛機被迫由北轉西

飛至肇慶，然後再從肇慶趕赴廣州<sup>(38)</sup>。通車典禮對父親意義重大，它代表中、英雙方誠意溝通的重要開端<sup>(39)</sup>。

父親不但為中國及香港建立良好關係，亦將企業觸角延伸至歐洲及日本，如英國倫敦的羅富齊銀行、丹麥的摩勒集團及日本的山一證券公司。在香港投資的外商，後來亦相繼赴中國投資。父親在忙於經營企業及開展新事業的同時，他的聲望也不斷提升。父親認為與人交往相識之後，便有可能成為生意的夥伴，當中國在七〇年代末開放外人投資時，父親便率先回應投資與中國合作。

父親在一九七〇年代時，不但已得到香港社會各階層人士和政府官員的尊敬與信賴，中國領導人對父親亦是敬重有加。國際上都稱他是香港的「決策性人物」之一<sup>(40)</sup>。此時香港政府在順應民意方面所做的改善，令父親非常欣慰，這些改善可為將來和平的主權移交，奠下良好的基礎。在這段非常重要的年月裡，他不但為中、港雙方設立了商業的橋樑，亦為香港未來政府的基礎架構做了極大的努力。

當時各界都認為父親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後，最理想的特區首長人選。每當我聽到這種說辭時，我總是提醒對方，一九九七年時父親將年達九十二歲了。

我認為父親以七十八歲高齡，仍能像三十五歲的壯年人一樣有活力的工作，是因為他充滿了不同的理想，永遠想要開始新的計劃。一九八〇年代初，父親又在中國進行了兩項新計劃，一是將廣州國際長途電話系統現代化，及在深圳、廣州之間鋪設雙軌鐵路，可惜父親臨終之前未能見到這些計劃實現<sup>(41)</sup>。

中國在一九八二年一月首次在貿易上超過日本成為香港最大的物資供應國家。父親相信中、港貿易增加後，更須改善中國本身的運輸系統：

為應付日漸增加的中、港貿易，中國廣東與香港之間的交通勢必須要改善，以加速貨物的輸送，減低運送及處理成本。應第一優先建立廣州至深圳的鐵路，而且必須是雙軌鐵路，連接九龍。香港是南中國海岸唯一有現代化設施的深水港，加上日後往返香港與廣州兩地的貨櫃



數量增多，所以海上交通運輸應儘速改為鐵路，由較為便捷及運費較低的雙軌鐵路輸送，將使香港、中國及全世界都可受惠。<sup>(12)</sup>

我們家在一九八五年回廣州參加花園酒店開幕典禮時，我能毫無困難的由旅館房間直接打電話回加拿大多倫多，與未能同來廣州的兒子通話，令我非常感動。

## 花園酒店

中國開放外人投資時，為表示對中國政府的信心，父親率先回應。那時國內旅館水準落後，他計劃要在中國建造一間最大、最華麗的現代化旅館。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七〇年代尚未有與外人投資合作經驗，父親是首位外人在國內投資，政府繁文縟節加上冗長無謂的會商，非常影響工程進度，令投資成本不斷增高。

父親原本計劃在北京興建新酒店，但中方建議將酒店建在海南島，父親認為參與合作計劃的中方人員，缺乏經營企業的概念。七〇年代的海南島，尚未有足夠的基本設施，來承受如此龐大的計劃。

父親後來決定在廣州離火車站不遠，廠商前來貿易展覽會場頗為方便的黃金地段選擇建地。結果選定在廣州空防重地白雲山飛機場附近，興建花園酒店。中國官方便向父親提出，花園酒店須在屋頂裝置高射炮，及地下須有防空壕的要求。父親向當時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尚昆，就北京的要求多次耐心協商，後來北京方面終於同意放棄，但仍堅持酒店須有自己的緊急發電設施，直到今日仍是非常必要的設施。

花園酒店〔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後，便與廣州嶺南置業公司在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sup>(13)</sup>合作協議<sup>(14)</sup>，在位於廣州白雲賓館南方，環市東路青菜崗，原為菜園佔地五萬二千六百平方公尺的



土地上建造廣州花園酒店<sup>(4)</sup>。花園酒店由廣州珠江外資工程公司分兩期工程建造，第一期工程一千三百房間，第二期九百四十間，旅館房間每間造價約五萬美元<sup>(5)</sup>。整個計劃包括旅館、會議中心及公寓大樓。

父親經由友人及銀行籌措興建花園酒店的資金，除父親本人為主要股東外，並有許多友人支持他。另外在姚剛遊說之下，太古集團亦一反公司投資的原則做了小股東。直到今日仍和利氏家族不同企業保持密切聯系的丹麥摩勒公司，當年也因父親的關係，成為花園酒店股東之一。此計劃外資總投資額為港幣七億元<sup>(6)</sup>。

我仍記得父親談論這個計劃時的興奮和期盼，他說花園酒店落成開幕時，不但將是中國首間五星級最大的觀光旅館，同時也是世界上最美、最大的旅館之一，這是他給中國的獻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楊尚昆為花園酒店破土奠基，父親在奠基典禮中表示，希望花園酒店的落成能為中國的現代化盡一份微薄的力量<sup>(7)</sup>。

花園酒店的建築師是父親友人司徒惠，他亦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設計建築師。在最初的設計建策圖中，中國資方要求全部旅館房間皆為一式的雙人房<sup>(8)</sup>，引起不同的爭議。父親希望將來花園酒店落成後吳慶塘父子能負責管理，他們父子二人認為一個現代化的酒店，應具備有大小不同功能的旅館房間，同時他們覺得酒店附近無甚風景，因此酒店頂樓不適合設旋轉餐廳。這些歧見令工程進度頗受影響，後來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將旅館房間重新設計，具有不同大小的房間，並增添套房以應市場需要，但旋轉餐廳仍照原計劃進行。此次爭議，導致吳慶塘父子和資方意見不合，雙方產生惡感<sup>(9)</sup>。

一九八三年初因財務管理不善，酒店建費不斷追加。建造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令父親精神壓力很大<sup>(10)</sup>。父親在七月去世後，北京方面便要求母親擔任花園酒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主席<sup>(11)</sup>，新任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出面宴請所有中國資方代表和母親共餐後，母親同意出任主席，承擔解決花園酒店財務危機的重任。雖然太古集團僅是小股東，但仍由姚剛出面幫助解決困難，他應允花園酒店中方代表，在太古可派稽核員赴中國查帳的條件下，太古將再代為籌措足夠資金。但太古

的稽核人員發現帳目根本無從查起，因為這一億美金的支出，居然全無紀錄可循。雖然如此，為了要使酒店工程能繼續起見，仍要求原有投資者追加投資金額，並非只是因為中方的要求，而且亦是為紀念父親對此計劃所付出的心血。太古集團首先再增加投資金額，同時表示若有任何股東不願繼續投資，差額皆由太古取代。並將現任花園酒店會計師停職，然後酒店才逐漸步向完工的階段<sup>(53)</sup>。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花園酒店開放營業，主要租客有美國及日本的領事館<sup>(54)</sup>，領事官邸則設在同屬花園酒店建築的公寓大樓內<sup>(55)</sup>。父母親的老友緒方鈴子亦在花園酒店內，成立聯絡日本政府和商務的辦事處，後來到一九八八年時，她一直在東京為花園酒店推展業務。

花園酒店於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式舉行盛大開幕典禮，邀請來賓在酒店作客三天。我們特別飛回香港與家人一起赴廣州慶祝，當時由香港赴廣州的直通車許多車廂都被來賓包下，其實慶祝活動從香港火車站就已開始了。

到達酒店時，我們受到貴賓式的歡迎，正如我所料，花園酒店是一座雄偉壯觀而華麗酒店。看到母親優雅地站在台上以國語致辭時，我非常為母親驕傲，多麼希望父親也能在場與我們分享這一切。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全國經濟都受影響，花園酒店業務亦受牽連，全無收入可支付銀行貸款的利息<sup>(56)</sup>，面臨被銀行接收的命運。母親決定親赴北京請求支援，計劃正式拜訪國家主席楊尚昆，他是一個很切實際的人，而且對我父母親非常尊重。

一九九〇年初，母親在新華社一位高級官員陪同下，正式與國家主席楊尚昆會面，楊並在釣魚台設晚宴款待母親<sup>(57)</sup>。母親對楊尚昆表示，花園酒店的股東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逼不得已只有請中國政府接收，或關門結束營業。楊尚昆對母親說：「利太太，請放心，花園酒店決不會關門的。」母親返港後一個月，中國銀行通知花園酒店（香港）有限公司，表示銀行願意以無抵押信用方式，貸款美金二千五百萬元給花園酒店，母親的「救亡」任務算是圓滿達成。所幸花園酒店業務後來逐漸回復正常，故未動用這筆貸款，日後在短短幾年之內，所有其他貸款亦全部還清<sup>(58)</sup>。

構，父親晚年時，有人問他為何將錢放在只有四厘利息的中國銀行，而不放在其他利息較高的金融機構，父親說：「我不會將錢提取出來的，中國是我的國家」<sup>(5)</sup>。

# 第十三章

## 生意人

父親對利姓的解釋是「勝利的利，利益的利」<sup>(1)</sup>，而父親也的確具備贏家的心智。其實父親根本稱不上是個「成功」的生意人，真正的生意人凡事皆以利為出發點，人們常說以父親的條件應該有更多的財富，但父親不同，他是個有社會良知的生意人，他的出發點是人的福祉為先，獲利其次。他認為金錢應用在社會大眾，而非貪圖個人享受。一九七五年《南華早報》Berta Manson在她的「企業王國創造者」的系列專題報導，引述父親在專訪時，非常遺憾的表示，香港富有的大企業「對香港社會廣大的貧窮青年做得太少」<sup>(2)</sup>。

香港有許多做投機生意一夕致富的人<sup>(3)</sup>，父親對這種事最為憎恨。因為他們不但搞亂經濟，提高物價，還使一般市民生活更加困難，他認為投機份子是社会禍亂的根源。雖然利氏家族在香港擁有大批產業，但每當房價飛漲時，父親總是躊躇不前，因為如此一來居住問題將成為社會大眾無力負擔的民生支出<sup>(4)</sup>。父親在許多公開場合，發表反對屋價上漲的談話，而且對他自己的言論，絕對言行一致。

非投機性的投資，對父親來說才是成功企業的首要條件，他認為「公司一定要有堅固的基礎及長遠的計劃……在長期漸進式的穩定發展中，才能有最佳的改進」<sup>(5)</sup>，在一九八二年的演講中：他說

這些商業活動〔投機〕也許會令少數人致富，但並不能對整個社會帶來財富，也對全民提供很少就業機會。高投機性的活動性質在新「香港秩序」中將無法獲益。<sup>(6)</sup>

這也是我從父親身上學到的經驗。鑽營投機生意的人，能在一朝之間致富，但也能在一夕之間一無所有，而累及許多無辜受害者。父親認為投資應該是投資在民眾，為社會提供工作機會，及提高市民生活水準。現在的年輕人聽到這種論調，必認為早已不合潮流，但我認為這才是健全社會的基礎。

香港購買樓宇的方式，直到現在仍和世界其他地方不太相同，市民必須通宵不睡漏夜排隊搶頭籌，取得號碼才有機會購買。父親常將他自己的理念灌輸給別人，李姑娘說在七〇年代時，有一天父親在辦公室對員工說，任何人若想買新地盤的公寓樓宇，他可向他熟識的地產發展商幫他們拿到前面的號碼，可有機會先買，但必須保證樓宇是買來自用，而非炒樓花。李姑娘說：「雖然我喪失了炒樓花賺些錢的機會，但我敢背著你爸爸去做這事！」

父親買東西時從不討價還價，他覺得每個人都有權討生活，若覺得價錢太高可以不買。我記得有一年過中國年，和父母親及幾位他們的朋友一起去逛年宵市場，母親的一位朋友想買些桃花<sup>①</sup>回家，便向花販還價，結果被父親勸止，他認為應該讓這些小生意人在過年時多賺點錢。

大家都知道父親是個一絲不苟的人，他每著手開始一個計劃，一定事必躬親的去完成。身為許多企業的主席，公司的年度報告其實並非父親的責任，但父親必親自修正逐字評讀後才可付印<sup>②</sup>。父親有太多事業的構想及廣泛的社會關係，他只對生意交涉及開創過程最為熱衷，對公司運作營業及細節並無太大興趣。所以有時會誤信管理階層，令公司營業虧損<sup>③</sup>。父親生性耿直，他以為手下處事態度應該與他一致，當他相信一個人的時候，任何人的忠告提示都不會動搖父親的信任，此時最令母親感到無助難過，因為她是旁觀者清，但又無力改變。

戰後除了利氏兄弟的企業外，父親也自己另創事業，像九龍的士公司就不很成功。父親也許是香港第一位買入賓士柴油引擎汽車，做出租汽車的人。但後來因管理不善，在過海隧道完工之後便將公司出售<sup>④</sup>。

雖然父親可以利用很多關係賺大錢，可是我常聽他說，他一點也不想做香港的首富，乍聽起來真不像是生意人的論調。他生性儉省，金錢對他個人來說並無太大意義，就像其他許多利家人一樣，



父親從不穿過份奢華的衣著，也不開最名貴的座車。記得他曾告訴我，勞斯萊斯汽車公司剛來香港對父親推銷時，他說：「我買不起這種奢侈品」，他寧願開他那部福士的高爾富小車。但是父親又會毫不吝嗇的，買最昂貴的首飾珠寶給母親，這也許是他唯一肯花錢的地方。

一九六〇年三月，父親帶領香港貿易訪問團赴西非考察，返港時對香港製造商在貨品包裝、價格、尺碼及市場推銷上，做了若干建議；譬如鞋類包裝紙盒應予改進，因鼠類經常咬壞用漿糊黏製的紙盒；瓷器運送時應裝在有填充物保護的容器內以防破損；服裝尺碼應標準化等。並對廠家因品質低劣而喪失貿易機會感到惋惜，他相信香港貨品在品質改進後，價格可與日本貨品看齊，因為市場對港貨需求極大。又建議所有香港製造商，應聯合印製商品目錄冊，令買家對商品能一目了然，容易訂貨<sup>(二)</sup>。

父親於一九六三年八月應香港政府邀請，組團赴德國法蘭克福參加國際貿易會議。又因德國政府已邀請父親赴德國訪問在先，父親便安排同時在德國開會及訪問。父親第一站到達倫敦時，接到聖詹姆士皇宮送交父親一份信函，邀請父親於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赴白金漢宮接受英女皇賜封大英帝國司令CBE勳章。因為此次母親未能同行，父親便邀請Jack上校及Tom Churchill少將兩位友人同赴白金漢宮觀禮，由於事出突然父親全無準備，只得穿租來的大禮服接受勳銜。

父親常喜歡去歐洲旅行，同年夏天他由倫敦飛去丹麥的阿本若，探訪老朋友Jebens，然後去他們在羅木島的別墅。那時母親留在家中聽到父親在冰冷的海峽游泳時，她說父親大概還以為自己很年輕。然後由另一友人從羅木島開車送父親去德國漢堡，再由兩位德國官方嚮導帶領參觀各大城市。結束德國訪問之後，父親便飛往維也納與國偉三叔會合，考察奧地利的水力發電廠。最後在八月底父親再率團赴法蘭克福參加會議，父親對觀摩學習新的事物從不感到厭倦。

香港的小型工業在六〇年代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對業主來說，工廠用地是一大困難。父親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代表小型工廠業主在立法局會議中替他們請願，反對政府強制收回工廠用地售給發展商。父親在議會中強調，這些工廠既然由政府手中合法取得牌照開工，就應受到保護，政府若須徵用工廠的土地，就應先為廠家另覓新址，以合理的租金租給廠家。政府須標賣工廠用地時，應通

知廠方讓他們有同等機會參加競投。他反對大型工廠併吞小廠的做法，並強調保護這些勤奮工作的工廠業主的重要性，因為他們是香港社會的基層骨幹<sup>(12)</sup>。

那段期間父親對外國資金多投資外地而不來香港，引以為憂。他在一九六三年向立法局提議廢除徵收遺產稅，以吸引更多公司在香港設立，政府可由此獲得大量稅收，比起政府在一九六三年僅收到二千萬元的遺產稅相比較，後者實微不足道<sup>(13)</sup>。可惜他的建議未被採納。

父親除了幫助其他廠家，本身亦參與工業活動，一九六四年父親在香港離島坪洲成立香港鋼管公司，十二月二十一日由Hon. D. R. Holmes主持開幕儀式，父親充滿自信的表示，新成立的工廠將為香港帶來嶄新的產品。為紀念新工廠的設立，董事會每年資助十名坪洲學童，在坪洲兩所學校免費就讀<sup>(14)</sup>。香港鋼管公司採用最好的原料，鋼鐵為日本製鐵株式會社供應，又向八幡製鐵所進口滾筒鋼索捲。父親去世時公司仍正常營業，後來公司才轉讓出售。

父親生意雖多，但從未減少研究解決工程難題的興趣，父親在戰後不久就建議政府由跑馬地至香港仔興建過山隧道，當時根據父親估計建築費約港幣一百多萬元，但政府不感興趣。若干年後此隧道依然需要興建，但造價已高出許多<sup>(15)</sup>。

一九六四年立法局討論英軍在香港石崗及新界地區興建軍事建築議案時，父親提出在設計這些建築物，應考慮到日後僅需少量修繕，即可轉為公眾圖書館、學校或政府辦公室等民事用途，令將來這些建築物由英國歸還中國香港政府時（港人治港），仍為有使用價值的建築物<sup>(16)</sup>。由此可見，父親早已開始為香港做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的準備，亦不願浪費資源。

一九六四年父親在我們所住的崇明大廈屋頂，造了一個太陽能熱水器。他在一張大帆布上放置六條直徑六吋的黑水管，經過黑水管吸收太陽的熱能，使熱水器內的水成為可用的熱水。這座香港首次建造的太陽能熱水器，材料費僅一百元，香港傳媒對此都有廣泛報導，雖然試驗成功，但從未用做商業用途。<sup>(17)</sup>

## 新隧道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政府與民間就不斷公開研討興建跨海大橋，或海底隧道，以改善香港、九龍之間交通問題的可能性。跨海大橋會受氣候影響，尤其在颱風季節安全堪慮，而海底隧道工程牽涉問題又太過複雜，且建費更高。經多年研究討論結果，香港政府終於在一九六三年五月，推翻跨海大橋的設想，全力集中促建海底隧道<sup>(18)</sup>。

香港與九龍之間有海底隧道後，車輛便無須在油麻地汽車渡輪排隊候船渡海。那時若用渡輪載車過海，至少費時一日，所以市民如非必要都是搭渡輪過海，到了對岸再坐的士。我們家只有在特別家庭聚餐或新年時才駕車上船渡海。

一九六三年初，父親與會德豐船務有限公司的馬登(George Marden)及嘉道理，為興建香港與九龍之間的海底隧道，共組維多利亞城市發展有限公司，後來又改為香港隧道有限公司。原本計劃為雙線道隧道行人及汽車均可通行<sup>(19)</sup>，一九六四年一月將計劃藍圖送交布政司和官產及測量部<sup>(20)</sup>。但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香港政府通過海底隧道工程議案時，將隧道改為車輛專用，不受颱風影響二十四小時全天候開放。工程預算為港幣二億一千萬元，下年秋季即可動工，香港政府擁有四分之一新隧道的所有權<sup>(21)</sup>。

香港政府批准海底隧道興建工程之後，父親積極的向英國商業投資銀行籌措到大部份的資金<sup>(22)</sup>，六〇年代香港經濟不景，投資意願不高，僅有父親、利希慎置業公司、馬登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為海底隧道最初的投資者。父親曾嘗試說服油麻地渡輪公司加入投資，因該公司未來營業將受新隧道的影響，但公司主席劉定國反對，直到今天這個決定仍令他引為憾事<sup>(23)</sup>。

在公司籌組過程中，父親曾拜訪《大公報》發行人費彝民，徵詢興建海底隧道時機的意見，我相信父親所指的是政治時機。費彝民告訴父親，香港絕對需要此隧道以解決交通問題，便利市民。並對父親保證香港穩定的政局將會長期維持<sup>(24)</sup>。

父母親在七〇年代初來多倫多時，父親就對我說過建造海底隧道的種種困難。尤其在初期很難說服香港政府給予財務支持，但當法國政府表示有興趣提供資金時，香港政府又立刻改變態度表示有意加入。

監督隧道工程亦成了父親的任務。雖然漢釗哥日後對我說：「今天建造海底隧道易如煲鴨湯」<sup>(25)</sup>，但在六〇年代仍是一件浩大艱巨的工程，父親所學是土木工程，所以喜歡直接參與實際工程。當第一節沉箱沉下海底時，父親便邀請費彝民至工地參觀，在隧道開放通車的前夕，父親又請費彝民與他經海底隧道由香港驅車至九龍。父親並沿途對他解釋通風空氣循環系統，及防海水滲透等工程方面的技術問題<sup>(26)</sup>。費對父親的全程參與每個細節，一絲不苟的治事精神非常佩服。父親對海底隧道的實現非常自傲。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海底隧道正式通車後，香港、九龍之間的交通有了極大的改革<sup>(27)</sup>，駕車渡海不再是件令人頭疼的大事，油麻地渡輪等候過海的車輛長龍已成歷史。但初期海底隧道營業並不十分理想，因為每次使用隧道須付費五元，但使用過的人都喜歡它的方便，加上也沒有其他的方法能開車過海。後來港幣兌英磅匯率十分有利，貸款很快還清，公司也開始有豐厚的利潤<sup>(28)</sup>。

海底隧道通車不久我們回到香港時，堂兄妹便帶我們由九龍開車至香港，其中一位堂妹對我說：「每次我們付五元隧道費時，其中兩元就進了你爸爸的口袋！」我相信她是太過誇大其辭了。

## 電話公司

一九六二年香港電話公司主席H.R.M. Cleland，邀請父親擔任電話公司董事，後來在一九六五年父親成為公司主席<sup>(29)</sup>。

一九六〇年代香港電話系統頗為落後，一九六六年全港只有三十萬條電話線，平均百人之中僅八人有電話，有六萬人申請排隊等候電話。於是父親便決定擴展公司業務，在香港不同地方增建電話



接收站，預備將電話線增加至一百八十萬條。電話公司又在東南亞海底鋪設電纜，以改善通訊品質，同時在技術及管理方面增聘人手，應付日漸增加的需要。同年公司宣佈利潤已增至港幣二千九百萬元<sup>(30)</sup>。

父親一向對德國機器深具信心，所以決定採購德國電訊設備，來改進香港電話系統。當時 Jardine Fleming<sup>(31)</sup>建議父親用瑞士法郎採購，豈知後來法郎兌港幣巨幅升值，令購買成本非常昂貴，但父親仍堅持電話費不漲。此次採購引起不少爭議，也令父親倍受責難。李國寶的父親李福樹亦是電話公司董事之一，認為父親是誤信不當的建議，而導致錯誤的決定<sup>(32)</sup>。

一九六九年時因大眾迫切需要，香港電話線已增加至五十萬條，即每一百人中有一十二點四五人有一條電話線，為亞洲除日本外第二高電話佔有率的城市。待衛星通訊系統在同年裝置完工後，香港的國際電話系統品質將大為改善。一九七〇年公司最重要的工程即是將荔枝角訊號站收發器電腦化，屆時將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電子通訊作業系統，服務範圍可由香港遍佈至新界。公司技術部門有兩千員工接受訓練，並送四名工程師赴英國，六名員工至德國慕尼黑接受技術訓練。電話公司在官塘開始興建員工訓練中心，預計一九七一年四月完工使用<sup>(33)</sup>。

父親擔任電話公司主席期間，發現管理部門問題很多，又傳聞公司有員工受賄，甚至總經理梅爾(Charles Male)都有涉嫌<sup>(34)</sup>。當今的鄧蓮如女男爵亦是政府調查電話公司管理不當的委員之一，但是由於涉案主嫌梅爾早已走避南非，而香港與南非之間無引渡條例，無法將他送返香港接受問話，此案也只有不了了之<sup>(35)</sup>。

此時父親的辦公室在太子大廈二十五樓，電話公司設在四樓，兩個辦公室之間因政府派員調查案情，受到不斷的打擾，令父親不勝其煩。

後來父親便請他的朋友姬達(Jack Catch)<sup>(36)</sup>出任電話公司總經理，但總督麥理浩同時需要姬達掌管一九七四年創立的廉政專員公署。父親衡量輕重之下，覺得公職比電話公司更為重要，便另請 F.L. Walker 擔任總經理。

當香港電話公司風波平息，一切情況正常後，父親便向電話公司提出辭呈。他對費彝民表示過，



香港市民遲早有一日會明白，他對改善香港電話系統所做的一切<sup>(37)</sup>。

## 煤氣公司

一 九六四年父親成為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有史以來第一位華人主席。該公司於一八六二年成立，對香港供應煤氣照明。一九七五年由渣甸集團控制的香港電燈公司欲收購香港中華煤氣公司，但為父親所拒。後來此收購與反收購事件演變成為極為引人注目的商業戰。父親形容港燈的收購企圖是「大魚吃小魚」的做法<sup>(38)</sup>。他不斷在報章及公開場合，勸諭煤氣公司股東拒絕香港電燈公司的收購建議，勿將手中股票出售，父親並宣稱根據香港電燈公司帳目顯示，該公司已預伏向股東套取現金，以應付日後龐大開支對股東有不利做法的趨勢。雖然中華煤氣公司規模遠不及香港電燈，但父親卻能以公司穩定健全的財務和豐厚的利潤，令股東對公司更具信心<sup>(39)</sup>。

除此之外，父親與和記集團大班J.D. Clague，和著名股票經紀人Noel Croucher兩位公司董事多次會商對策。他們在對勸諭客戶拒絕將中華煤氣股票售予香港電燈方面，付出極大心力<sup>(40)</sup>。八月二十日父親及各公司董事成功的防止了港燈收購行動。

中華煤氣公司原本在英國註冊成立，一九八二年時父親決定將公司註冊由英國遷回香港，成為香港公司，轉移註冊時公司二千二百三十八位股東中僅有二人在倫敦登記。事前父親曾對股東解釋，將公司註冊由英國轉移香港的目的，是為使公司免受在英國註冊，根據英國公司法例處理之不利，尤其英國在一九七三年加入歐洲經濟聯盟後，公司管制法更為嚴厲。這些法例主要是為在英國營業的公司而設，實不適用於只在香港營業的公司。此次公司轉移註冊斬斷英國聯系，共花費港幣一百二十萬元。移交特別儀式在新寧大廈漢釗哥的辦公室舉行，此後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終於完全成為香港公司。為紀念公司轉移註冊成功，全體員工均獲頒贈一面一安士重的金幣，公司並對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學院，各贈港幣二十五萬元補助金<sup>(41)</sup>。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一九八〇年的盈利為港幣三千九百萬元，六年之後躍升至二億三千五百萬元。

公司成立一百二十五年後，終於成為香港主要能源供應機構，煤氣已不再只是富人使用的燃料，而成為香港市民每日的民生必需品。

父親在七〇年代開始，就進行經由海底埋管工程，將中國的天然煤氣運來香港使用，此計劃不但能令中國賺取大量外匯，同時香港亦可受惠。但當時因受安全及工程困難的影響，此項計劃可惜未能在父親有生之年實現<sup>(七)</sup>。

父親去世後，中華煤氣公司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主席秦文彩，在一九八五年簽訂備忘錄，同意在不久的將來<sup>(八)</sup>對香港供應天然氣，為香港帶來廉價的天然氣能源。

## 羅富齊銀行

羅

富齊(Rothschild)銀行早已計劃在香港成立分行，並邀請父親做香港分行的創辦董事，一九七三年三月正式成立香港羅富齊銀行。一九七四年一月父親被任命為銀行副主席，大家都明白

這家猶太銀行請父親幫忙的原因，香港甚至還謠傳父親一定受過猶太割禮。事實上，是因為銀行需要一位有聲望的香港知名人士領導，雖然羅富齊是主席，但因他不長住香港，父親便常須主持銀行許多會議，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認為父親實際上是香港羅富齊銀行的首位主席。

父親擔任銀行副主席期間（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八年），曾介紹許多生意機會給銀行，並協助聘用香港本地的行政主管人員。在羅富齊給我的信中，他提到父親還非常熱心的為銀行大門匾額題了以下的字句：

生財有道 致力金融

業羅萬彙 四海匯通

資金富厚 營利至公

輔導經濟 資商惠工

齊心合眾 駿業興隆 (十五)

父親附合潮流的國際觀，令他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商業關係。羅富齊銀行主席羅富齊在一九七九年給父親的信中寫到：

……欣見閣下領導有方，令本公司香港分行業績斐然，實不勝感激。  
……再次多謝閣下各方協助，及對本人的厚愛…… (十五)

## 丹麥關係

一 九六〇年代父親與丹麥的摩勒集團開始合作，該公司並與許多利氏家族的企業有業務往來，雙方合作關係日漸穩固後，更對父親多項計劃投資。父親後來與這位丹麥公司的主席私交甚篤。

這公司是摩勒父子於一九〇四年在丹麥斯文堡創立，原本為一間船務公司。一九六五年老摩勒逝世後，便由兒子將公司發展成為國際化的大企業，旗下擁有運輸船隻、油輪、在丹麥領域的北海鑽油台、鋼鐵造船塢、貨櫃工業、航空業、歐洲汽車的引擎風扇皮帶及剎車護片廠，醫療器材的製造和銷售、文件資料處理的供應和銷售、及丹麥第二大的超級市場連鎖店，及其他多項商業的龐大企業。

當丹麥摩勒公司的執行董事喬金生(Per Jorgensen)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到達香港時，與父親一見如故。那時這家丹麥公司已與利氏家族企業有三項合作計劃，分別是利園酒店、希慎道一號和禮頓大廈兩座商業大廈。喬金生說他初到香港時，尚未有足夠的國際商業經驗，父親對他各方面都非常照顧，並將他帶進香港複雜的企業環境，學習經營管理。父親的坦誠相助，及充滿活力現代化有效率的處事方法，令他佩服不已 (十六)。

我們家與丹麥摩勒家族友誼日深後，父母親在一九八二年七月特別赴丹麥訪問，喬金生夫婦多日

相陪擔任導遊。喬金生告訴我，父親是個興緻極高的遊客，因為他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又有興趣，加上精力充沛，參觀不同城堡時總是有問不完的問題。後來在一九八二年底時，摩勒公司主席還帶著女兒來香港探望我們家人<sup>(註)</sup>，正巧我與衛權也在香港，很榮幸的能在晚宴中和他們見面。

摩勒公司後來繼續對父親的企業大力支持，如利園酒店、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及花園酒店〔香港〕有限公司等。喬金生後來並成為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初期的董事之一。

## 航運公司

父

親與在日本建造許多貨船的香港維達航業有限公司有間接的關係，該公司旗下的輪船皆以「大」字排名，如大鷹、大玉等，大玉是以母親名字瑤璧命名，璧為玉的通稱。

維達航業公司為母親姪女李鄺靈愛的夫家李平山所有，因家族關係，李家便要求父親當公司主席，父親在七〇年代協助此公司成為股票公開上市的公司。

多年來公司營運成績蒸蒸日上，父母親曾多次赴日本參加此航運公司的新輪船下水典禮。後來李平山病重，在逝世前要求父親應允照顧他兩個即將繼承家族事業的兒子。很不幸的在李平山逝世後，他的兩個兒子將他們所繼承的航運公司，以一筆他們認為相當高的價錢，賣給一位在馬來西亞出生的生意人陳松青手下的佳寧投資集團。事實上，大部份的售價是用佳寧投資集團的股票支付。

由於父親對航運公司轉售過程全不知情，當事人事前又未與父親協商，父親便決定與此公司斷絕一切關係，將手中公司股權全部出售。也幸好如此，因為後來維達航業有限公司發生財務問題，拖垮了李家。原因是雖然維達航業公司已出售轉手，但李平山生前對銀行的個人擔保仍由兩個兒子承擔<sup>(註)</sup>。一九八三年購得維達航業有限公司的佳寧投資集團倒閉事件，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業醜聞。馬來西亞銀行界的 Lorrain Osman 及陳松青被控詐騙馬來西亞裕民財務公司港幣六十億元〔美金七億六千九百萬美元〕，馬來西亞裕民財務是馬來西亞裕民銀行的附屬機構，此銀行是馬來西亞

的第二大銀行<sup>(49)</sup>。

## 加拿大關係

一 九八二年六月，父親在德國法蘭克福的演說中曾說：

本人深信香港在中國開發石油計劃中，可在各方面提供支援。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實不容置疑，但我們也不可否認香港須仰賴中國才能生存的事實。將來中國沿海的石油和天然氣能使工業國家的供求平衡嗎？<sup>(50)</sup>

七〇年代末期，加拿大卡格利的Ranger石油公司，希望能與父親合作共組公司在中國勘探石油，但為父親所拒。後來這家公司便向英國的商業銀行倫敦漢堡斯(Hambros)銀行求助，經由銀行與姚剛的關係和父親連繫，計劃成立石油公司在南中國海取得石油開採權。當時大家都認為南中國海域有蘊藏豐富的石油，姚剛認為這是非常好的建議，便與父親聯絡，他們二人認為這項計劃將對中國極有助益。

倫敦Cazenove公司<sup>(51)</sup>的合夥人Victor Lampon，在漢堡斯銀行董事David Lewis陪同下，在希慎道一號的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會議室，參加由父親召開的會議。會中父親同意他們所提的計劃，投資一百萬美元，並在一九八一年成為加華石油有限公司的主席，姚剛為董事之一，另外尚有許多其他投資人，包括父親的香港朋友在內。

父親一直深信中國沿海有蘊藏豐富的石油未被開發，一九八一年底或一九八二年初這家公司在南中國海開始探勘石油時，已有七家外國石油公司在黃海及海南島附近的南中國海同時探勘石油。父親說「這是中國四大現代化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sup>(52)</sup>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間，父親投資的石油公司在南中國海共鑽了三十五口井，但都未發現石油。後來全球石油價格下跌，Ranger公司便買回所有公司股份，將器材設備拍賣，最後加華石油有限公司被迫清盤結束營業。直到一九九七年六月為止，尚未有一家石油公司能在南中國海成功的開採到石油，當年加華石油有限公司的石油勘探計劃，完全是依照最初Ranger公司的地質礦藏報告進行<sup>(2)</sup>。

一九八一年時香港已由中國進口百分之二十的石油產品，父親相信當中國的石油開採成功，石油源源湧出時，將對世界經濟造成極大的影響<sup>(3)</sup>。雖然父親逝世時加華石油有限公司勘探石油計劃仍未成功，但父親一直深信中國沿海必有石油蘊藏。

# 第十四章

## 共濟會：終身的承諾

在

我的記憶中，我在家的時候父親好像總是要去共濟會（美生會）開會，這些會議對我充滿神秘感，因為共濟會是一個會員關係密切的男性社團，直到近年才較為公開。

共濟會是一個以發揚友愛和慈善為道德規範的組織，不只在金錢方面，精神上各會員亦互相勵志真誠以待，全不涉及政治，事實上，共濟會在其會址內嚴禁討論政治<sup>①</sup>。大家基於共同的理念、情誼，將全世界的會員結合在一起。許多人都誤以為香港共濟會的會員非富即貴，其實任何二十一歲以上之正直男性公民皆可申請入會。共濟會會員之間皆以兄弟互稱，新會員入會時即傳授「盡己之責，為世典範」<sup>②</sup>的思想，並以履行修身律己的會旨為榮。

慈善助人為共濟會基本宗旨，共濟會在世界各地幫助經營醫院、照顧殘障、失明人士、精神病患及不良於行的人。並創辦安老院、設立獎助學金、學術研究基金，及會員在各人居住地做各類社區服務。

有些學者在研究共濟會起源時，發現可遠溯至聖經中的伊甸園、中國帝王、甚至日本天皇。在遠東關於東方源流有兩種版本：一是認為中國民間的秘密會社，其習例與共濟會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其次是中國帝王為確使天命攸歸所舉行儒家祭祀儀式，與共濟會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sup>③</sup>。

當今共濟會起源自建造歐洲大教堂的石匠，他們組成石匠團體，以選自教堂建築藝術的中古世紀歷史傳說，融入聖經和民間故事，然後發展演變成一套全球適用的綜合集會儀式。共濟會大分會在歐、美迅速開創後，儀式更為統一化。短短的四十年後，已擴展至遠東。共濟會於一八〇〇年代早期在香港開

始創會，一八四五年成立皇家蘇士分會，其分會泄蘭分會，亦於十八個月之後成立。

父親留英期間其監護人邱吉爾曾邀他入共濟會，父親對共濟會以發揚友愛、慈善與真誠的會旨十分認同。若非祖父遽逝，父親很可能已加入阿波羅大學第三五七分會<sup>(4)</sup>。

一九二九年父親加入香港共濟會第三六六六大學分會。共濟會為富經驗的一般分會會員，設有一個所謂較高階級的頭銜，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父親已成為所有香港分會的高級會員。父親熱心公益，畢生致力服務共濟會，日後更成為香港及遠東區共濟會的區總監。

中日戰爭期間我們住重慶時，父親是個極為熱心的會員，積極參加第二〇一三號原本在廣州集會的華南分會的復會工作，同時父親亦是美國加州大分會設於重慶的堅毅支會的客座會員，雖然兩個支會會址設於同一個城市內，僅數哩之隔，但卻位於水急無橋的長江兩岸。漲潮時水位可在數小時之內上漲四十呎，所以每參加一次會議往返路程都須費時整日<sup>(5)</sup>。

太平洋戰爭後，父親回到香港仍繼續熱衷共濟會活動。一九五〇年時他成為南華〔由重慶遷來〕和康馬克兩個支會的總監，一九五一年又任大學支會的第一首長席位。當時位於堅尼地道一號的泄蘭堂正在興建，雖然共濟會地區工程總監督只是象徵性的職位，但父親仍是一本他治事的認真態度，每天都去工地以土木工程師的身份視察施工進展<sup>(6)</sup>。新的泄蘭堂會址正對著我就讀的聖保羅男女中學底層樓梯口，所以我常去新會堂吃中飯。中午泄蘭堂大廳經常有人吹風笛，使我開始喜愛優美動聽的風笛奏樂。

一九六一年四月，英國共濟會大總監士加堡伯爵，任命父親為共濟會在遠東及香港地區的區總監。共濟會在地理轄區上，將以前的香港及南華區改為香港、遠東地區，以便將日本共濟會區包括在同一地區之內。當時日本僅剩下一個支會，直接受命於不屬其支會的英國倫敦聯合分會。〔共濟會於一八七〇年代在日本創辦分會，一九六〇年代時僅存日昇支會。〕

日本支會屬於父親的共濟會轄區之後，父親每年一月必去神戶參加他們的會員入會典禮，典禮後的宴席間，父親總是神情極為愉快。他的熱心連帶的影響到其他香港的會員，他們不顧日本一月寒冷的天氣，也相繼加入日本之旅，幾年之後會員妻子亦被邀參加。到父親逝世時，赴日人數已增加

至二十人，神戶之旅成為香港共濟會會員的年度大事<sup>①</sup>。他也和蘇格蘭區總監一起參加過神戶分會莊嚴美麗的克比堂獻堂典禮。

父親的新職位令他承擔至少需二十年才能解決的日本橫濱共濟會堂，及其四周空地產權的棘手問題。這塊土地原屬太平洋戰爭前在橫濱活動的六個英國特定團體所有，但後來即未再使用過。曾經使用過該會堂的一些駐日軍隊中的蘇格蘭支會會員及新會員，非常擔心以後可能失去聚會場所，但又無經濟能力可購買這塊價格已一減再減的土地。

一九八二年終於以非常和諧的方式，解決了日本橫濱會址的產權問題。土地賣給橫濱市發展成為公園後，將賣地所得大部份資金，交由蘇格蘭支會東星第六四〇號做為購買新會址之用。其餘金額則在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設立基金，提供研究共濟會獎助學金，由英國分會監管<sup>②</sup>。父親畢生注重教育，加上他和這兩所大學關係特別密切，這問題能如此圓滿的解決，使父親個人深感滿意。

雖然父親屬於英國行會，但他也是在香港的其他轄區支會的固定客座會員。愛爾蘭的大總監，對父親頒贈榮譽資深會員資格，後來又成為蘇格蘭大分會的榮譽副區總監。

父親擔任共濟會區總監達二十一年，在此期間父親對共濟會奉獻出無限心力。香港地區共有十四個分會，及四個附屬支會，父親每年一定親自出席這些不同單位的入會典禮及年會，從未缺席過。這些會議通常在十月及次年四月之間舉行，會議日期都特別安排父親在香港，或他可由外地趕回開會的時間召開。

父親任區總監時，陶喬(George Todkill)擔任儀式組長多年，他說父親是個很容易共事的人，因為他總是知道自己要什麼。而且父親極為守時，開會時他一定在晚上六點二十分踏入會堂，六點三十分時已開始主持會議分發任務。父親吩咐陶喬在十點二十分時，不論有任何人正在發言，一定要結束會議。當會眾站立舉杯道別時，陶喬就送父親上車，其他會員仍繼續在會場交談，但父親習慣早睡早起，所以總是先離開。

有人臆測父親曾計劃共濟會在中國復會，有幾次父親在共濟會的泄蘭堂以私人午餐款待來訪的中國友人，若對方話題涉及共濟會時，父親便會向他們解釋不涉及政治的會旨，及引導參觀會議廳。

父親在中國旅遊時，曾在華南看了四個共濟會的舊會址，但他非常謹慎的不讓人誤解他有收回會址的意圖。父親並讓中國政府有機會參閱有關共濟會正確的歷史及會旨資料<sup>(1)</sup>，提供正確的相關資料極為重要，一九七四年時有一本刊物對中國讀者報導稱，共濟會香港分會是香港外籍人士三合會的幫會組織，並將共濟會與中國的秘密幫會相提並論，使外界誤解共濟會是幫會組織，並稱共濟會是「白人的國際三合會」<sup>(2)</sup>。

父親逝世後，香港逐漸接近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日期，對於中國政府是否允許共濟會這類社團，在香港繼續存在是個未知數。姚剛特別就此問題赴北京徵詢意見，並對北京當局強調父親自少年開始即屬共濟會會員。結果港、澳辦事處對姚剛保證，只要會員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香港共濟會在一九九七年之後仍可繼續活動，所有會議仍准許以英語進行。由於舊日的共濟會給外人的印像是個秘密組織，中國方面則希望共濟會日後活動能較為公開，尤其在社會工作及慈善事業方面。共濟會會議儀式中，須對當地政府宣誓效忠，所以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將不再對英國君主政權致敬，而改向對中國政府效忠<sup>(3)</sup>。



# 第十五章

## 高瞻遠矚

八〇年代初中、英雙方為香港主權問題開始談判，當時香港經濟正走下坡，民眾對未來都缺乏信心，決定移民，許多市民皆做移民加拿大、美國、澳洲及紐西蘭的打算。市面上有句大家常說的話就是，「做過一次難民之後，我們不想再做難民。」移民外國成了熱門話題，甚至還有專為可能會移民的人而編撰發行的書刊<sup>(一)</sup>。

由統計數字上分析，中國和香港的遠景相當看好。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之間，中國出口至香港的貿易額為港幣二百九十五億一千萬元，增幅為百分之三十二，而中國進口香港貨品數額亦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七。中國進口額大增的原因是香港中華電力公司對廣東省增加供應電力所致。中國近期的現代化計劃已使香港再度成為貨物轉口集散地<sup>(二)</sup>。

一九八一年香港政府舉行地方選舉，是邁向較有代表性方式政府的第一步。因為當時英國政府正準備與中國談判香港未來問題，所以覺得有必要讓香港民眾在地方事務上，較有表達意見的力量。

我們家則一切如常，不受任何影響，父親對中國及香港未來的信心十足，絲毫不受動搖。他對「一國兩制」的觀點是：

．．．這個結果表示國際關係的新方向，而此新關係是基於雙方政府的互相尊重，並應以所有政府及當地人民福祉做為根本條件。

他對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的展望是：

對中國來說，香港對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在一九九七之後的許多年，仍會舉足輕重，自由企業在社會公正下得以維持，不致受緩慢工作態度而拖累<sup>(1)</sup>。

父親相信香港居民仍會一如以往勤奮工作。父親指出有些人說中國靠香港套入大量外匯，但香港若無中國又將如何自處<sup>(2)</sup>？香港依賴中國供應最重要的水和食物及廉價勞工，他不明白人們為何如此漠視香港須靠中國才能存在的事實。

香港與上海同為國際商港，二者之間常互相競爭及比較，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上海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中心。香港商界非常關切，在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中國之後，上海是否有取代香港的地位，成為中國首位商業中心及通往中國門戶的可能。父親在一九八二年發表談話中表示：

由於香港不受外匯管制及低稅的制度，也是融資的主要中心，為了永遠保持香港比其他如上海等地區優越的地位，我們必須時時投注所有資源，增強財務結構基礎及工業科技。<sup>(3)</sup>

父親認為由Edward Du Cann為首的英國國會代表，在一九八二年接受中國政府邀請訪問北京時，居然建議中國政府應就香港問題與倫敦開始「協商」，是件很荒謬的事<sup>(4)</sup>。加上英方妄想中國繼續簽定這個根本不平等的條約，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承認在一八四二年所簽訂的南京條約，在一八六〇年及一八九八年的北京條約，中國已聲言將如期收回香港及九龍主權，當時未見英方有任何正式反對。父親認為當時雙方政府都認同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暫由英國管轄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為止<sup>(5)</sup>。

父親相信香港的未來一部份須靠香港居民自身的努力，若香港能繼續保持生產力量，對中國及世

界經濟產生特殊效益，才能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有合理實際與理性解決問題的共識。主權問題應以雙方經濟，而非靠武力或政治意識，甚或國際法的基礎來考慮。最重要的是使香港能永久保持獨立的經濟現況，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再將現代科技知識引進中國。所以香港現行的法律及商業慣例都應延續，港幣亦應保持自由兌換<sup>(2)</sup>。

父親對未來的香港政府，有以下的進言：

日後香港可在新成立的管理委員會之下，成立一個由現行制度改善修正的新政府。香港在中國旗幟下成為「特區」，管理委員會的領導人可三、四年一任，由中、英人士輪流擔任。政府的任何改變與修正都應該在一九九七年之前，以漸進和緩方式進行，避免臨時突變所帶來的衝擊……在立法局全體新議員選出之前，可由數位指定議員繼續運作，成為數年的臨時過渡措施……而公務人員架構亦應在謹慎策劃之中，盡量維持現狀。<sup>(3)</sup>

在法律方面，父親建議目前全世界所承認的香港法律，在一九九七年之後在中國同意之下應繼續沿用。最終上訴法庭應設在香港，而非北京或倫敦，在中、英及香港同意下，可特別安排由英國樞密院的法官擔任新的職位，繼續協助香港<sup>(4)</sup>。

在財經方面，父親認為香港已在外匯基金及儲備受限於殖民地的英幣規定下而引起的災難中得到教訓。香港在一九七二年基金多元化之後，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的金融中心。一九八二年時他說：

本人認為中國領導人提到保持香港現狀時，應將香港所有的優勢全力保存。香港外匯基金在一九九七年時，不應轉至倫敦或北京，而應保留在香港本地，或香港認可的任何其他地方，才可永久保持港幣的獨立性。使得國際商業界對香港加強信心。<sup>(5)</sup>

# 心靈祥和

嘉

道理勳爵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四日寫給父親的信中提到：

回顧戰後不久的香港及看到今天的光景，我深信目前的成果，是來自如同閣下及府上各位親人及一般有信心及進取心的市民努力，實令人由衷欽佩。

敬祝賢伉儷身體健康、福壽雙全，並盼與閣下友誼長存。

父親在一九八二年決定不再坐船出海，便將亞特蘭大號遊艇送給看船工友何寧，讓他將賣船所得用來退休養老，父親希望何寧在他有生之年能安享退休生活<sup>(2)</sup>，何寧在我們家工作多年，看著利家兒孫長大<sup>(3)</sup>。那年我們回港探望父母親時，我簡直不能相信父親會放棄這艘他最心愛的遊艇，但我不知道他是因為心臟血管硬化，醫生囑他不應繼續游泳。

父親與二祖母即他自己的生母，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令父親非常引以為傲。我常聽他很驕傲的稱讚二祖母，說她雖然年事已高，但思路卻依然清晰敏捷。我想父親一定以為自己也可像二祖母一樣高壽。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父親寫給嘉道理的信中說到：

多年來都能定時收到府上果園的柑橘，實在是盛情可感。

家母即將九十八歲，身體健朗，篤信佛教，每年此時都期盼能將府上柑橘擺置神台供奉，她每天仍打四圈麻將當做運動……

一九八三年一天早上，母親見父親面帶微笑便問他原因，父親說他夢到祖母在對他呼喚。

父親的老朋友廖承志在一九八三年初夏去世，父親是香港唯一受邀赴北京參加喪禮的人。廖承志不只是父親的好朋友，亦是他所尊重的人，所以父親一定要親赴北京致唁。

費彝民在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北京所住的酒店頂樓與父親見面時，費彝民要寫些東西但身邊無筆，便向父親借用，用後稱讚父親的筆很好用。分手時又怎能料到這一別竟是永訣<sup>(11)</sup>。

那年夏天北京特別炎熱，氣溫高達華氏一百度，父親搭機回港途中誤點數小時，加上機場又無冷氣，父親只覺透不過氣，呼吸非常困難。

由北京回來之後父親就身體不適，醫生診斷後立刻要他進聖保祿醫院。

醫院辦理入院手續要二千元保證金，父親無現金支付，只好打電話給秘書李姑娘，要她回家向母親取錢，並嚴禁李姑娘將他入院的消息告訴任何人，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幾位弟弟<sup>(12)</sup>。當天在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工作的利家兄弟，對父親的行蹤都覺得極不尋常，因為父親從沒有一天不上班，李姑娘只能托詞說父親有事。後來醫院的主管Sir Albert Rodrigues巡房時看到父親，消息才傳到利家兄弟，第二天大家都責怪李姑娘不應對他們隱瞞事實。

醫生囑咐父親要靜心休養，這對父親來說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母親還請了一位特別護士照顧他，但父親卻將護士辭退。父親僅准許極少數人可以知道他入院，他自認很快即可出院回家，甚至不許母親告訴我們這個消息，因為父親最討厭別人為他大驚小怪，他對自己的病痛從不在意。兒女在父親去世之後才知道他因病入過醫院。

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和副社長李儲文，在七月二日去醫院探望父親。他們是極少數父親住院期間所見的人。當天父親正吵著要出院回家，母親便要許家屯幫忙相勸父親多在醫院休養幾天。許家屯與李儲文進到病房時，見到父親已起床坐在椅子上接待他們，父親說他沒什麼毛病只是大家太過緊張罷了<sup>(13)</sup>。在醫院住了三天之後，父親就心煩氣躁的急於出院，他向主治醫生攤牌，對醫師宣稱若再不讓他出院回家的話，他就自己走出醫院。當時是七月五日早上，他仍須用氧氣輔助呼吸。

七月五日當天在利園酒店已安排舉行午宴，歡送水務署署長Tucker退休，由於請帖早已發出，若父親仍在醫院的話，就安排由中華煤氣公司的總秘書代父親主持午宴，後來父親既已出院就堅持



自己主持。他並在餐前要李姑娘將需要他簽字的支票帶到利園酒店給他，李姑娘覺得父親面色不大好，而且說話較為遲鈍。她回到公司對仍在公司做事的家驥四孀提起此事，家驥四孀說：「他想出院的話，沒有人能阻擋！」

七月六日早上，父親一如往常在小餐間吃完早餐，預備穿衣出門上班，突然倒地不起，待救護車將他送到醫院時已告不治，與世長辭。

李姑娘家住於父母親所住的崇明大廈對面，當她經過崇明大廈返公司時，我們家中司機兼守衛阿力對李姑娘說：「利先生走了」，李姑娘一時未能會意，再問他：「走到那裡？」阿力不禁眼紅的哭了起來。李姑娘實在不能相信這個消息，後來她神情恍惚漫無目的走在街上，碰到漢釗哥剛從崇明大廈斜對面的嘉蓮大廈走出，她問漢釗哥她該做什麼，漢釗哥說：「先回寫字樓再說」。李姑娘在幾個月之後甚至仍不能接受父親去世的事實，總覺得他會回來。她常望著窗外以為會像以前一樣，在下午還可以看到父親回家用完中飯，從街上走回公司的情景<sup>(8)</sup>。一位朋友在七月六日早上坐的士時，司機告訴她香港剛失去了一位好人，一問之下才知道他所指的是我父親。

七月六日晚上七時，她剛由加州洛杉磯返達香港機場，他的司機告訴他這個消息時，他非常震驚的說：「那我現在怎麼辦？我所有的中國關係都沒有了！」<sup>(8)</sup>

七月五日晚上，我正在加拿大多倫多家中用完晚飯<sup>(9)</sup>，接到七叔的電話告訴我父親去世的消息。我驚駭得腦海一片空白，簡直不能相信我所聽到的事實，我們完全不知父親入過醫院，而且每個人都理所當然的認為，父親會永遠在我們身邊。

電信由世界各地排山倒海而來，其中有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及楊尚昆、習仲勛、谷牧、余秋里、姬鵬飛、經普椿、廖夢醒等中國國家領導人，紛紛致電慰問。中文報章對不同人士的電信的內容均有廣泛報導。

七月某日，《大公報》費彝民的辦公室收到三支與他在北京酒店向父親借用同樣的筆，原來是父親生前囑咐秘書送交費彝民的。費彝民見到這三支筆時真是感慨萬千，父親在病中還如此體貼入微，記得這些小事<sup>(10)</sup>。

由於父親是共濟會遠東及香港地區的區總監，共濟會在七月十八日在香港聖約翰大教堂為父親舉行追悼會。因為衛權須要返回多倫多照料他的病人，所以長子偉雄特別飛來香港代表衛權參加這個追悼會。母親要家中女眷全部穿黑旗袍，所有男孫輩穿黑西裝，不知家中親人如何找到這些裁縫，能在四十八小時之內趕製出這批孝服。

追悼會那天烈日高照，非常炎熱，教堂內坐滿人。Justice Cons致詞時頌揚父親一生以發揚共濟會宗旨助人濟世美德為目標。在共濟會區總監任內，將現有慈善基金籌募及施賑制度，重新規劃，將這責任交給父親奉獻心力最多的地區慈善會。他不只是成功的企業家還具有多方才華，更是一位宅心仁厚的慈善家，能啟發他人同心為善。共濟會儀式中，父親最喜歡讀的經句是，門徒保羅歌頌慈善為懷的讚美詩<sup>[21]</sup>。他並形容父親為人親切和藹，深得身邊所有人的敬愛，他的領導能力和靜默的權威更能提昇他人的信心及熱誠。父親從不吝於誇讚他人的好處，可是若發現對方未盡全力時，又會毫不遲疑的加以批評。但父親對屬下一向是體恤和關懷<sup>[22]</sup>。

十月八日，日本神戶的共濟會會員在聖安德魯飛翔天使禮拜堂，為父親舉行另外一次的追悼會，會中並特別宣讀神戶市長官崎辰雄所致的電唁。副總監督海福納(Christopher Hafner)致頌詞時，提到父親對神戶日昇分會的特別照顧。神戶分會是率先響應父親為紀念英國總會成立二百五十年，捐贈醫學研究獎助學金的分會。海福納亦提及父親與中國領導人物的特殊關係，父親是國家主席李先念第一位接見的香港市民。更說到父親對一九九七年香港問題實際解決方法的見解，最令人深思緬懷<sup>[23]</sup>。

李姑娘為父親工作超過十二年，所知甚多，而且與外界人際關係很好，所以父親去世後有許多人願以高薪聘用她，但李姑娘全不接受，她覺得沒有人能取代像父親這樣的上司。她珍藏了一小張我父親面帶笑容的相片，她認為是父親相片中最好的一張，還保留了一些她替父親寫的中文書信影本，她說這些都是極有感情的紀念品，後來她非常慷慨地將這些珍藏全部交給我，作為此書的參考資料。李姑娘說父親不是完美無瑕的聖人，但他仁慈善良，忠直誠懇，而且永遠是位謙謙君子。

父親去世的消息連續在中英報章、電視及廣播中廣泛報導，為防二祖母知道真相，父親的妹妹立

刻將二祖母常看的電視機切斷電源，偽稱電視故障，由於她不識字，報章雜誌則不必擔心。二祖母在晚年極少出門，親人及家中僕人都受囑不得對她提及此事。以後幾年每當二祖母詢問父親未前來向她請安的原因時，母親總是找藉口支吾以對，過了一段時期，她就不再追問。我們相信她心中明白，只是不願證實心中的恐懼而已。

父親的遺願是將他的骨灰灑在香港海灣，但母親很守舊的執意不肯，因為她死後要葬在父親身邊。

父親生前人人都尊稱他為「澤哥」，許多人都深切的懷念他。寫此書時，每個人都極為熱心的幫助我，因為他們對父親仍充滿了敬愛與感激。有人稱他是「偉人」、「好朋友」甚至「傳奇人物」，亦有人很惋惜的認為，父親的死對香港主權問題的中、英談判是一大打擊。

從父親的喪禮可得到證實，甚至他的死，都在替中國與香港之間建立橋樑，為雙方帶來和平與繁榮。



## 結語

周 恩來總理遺孀鄧穎超女士為對我父親表示敬意，特別提名母親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香港代表。

母親常說：「雖然妳父親性急又古板，但他對我這樣好，我實在沒有什麼可說他的。」母親在父親一生中一直是他最關愛的，父親本性寬厚大度，每做任何事業投資，一定自動將半數置於母親名下。父親誠實耿直的性格令母親對他完全仰賴，母親對任何重大事情的決定及難題，甚至家中應付帳單及她旅遊行程，全由父親處理安排。母親總認為自己會比父親早走，所以父親的遽逝令她不只悲慟萬分，頓時失去生活重心，而且對父親置她不顧撒手而去覺得非常刺傷，使她接連數月都須靠鎮靜劑過日。年紀七十四歲的母親，還是盡了她的全力繼續走她該走的路。

我多麼希望父親在世時，能有多些時間與他在一起，又多麼希望能再向他多問些問題，但我也和其他人一樣，以為父親會長久的在我們身邊。父親所作的榜樣，使我學到許多事情，並將盡我所能以父親作為我待人處世的準則。對父親的關愛我將永誌在心，並以一顆感恩的心來承受他留給我們的名聲，身為他的女兒，我感到非常榮幸。



# 利銘澤生平事業摘要

一九二七年

牛津大學畢業：文學士

一九三二年

牛津大學：文科碩士

一九四六年

太平紳士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

穀米糧食統制處處長

一九四九年

大英帝國官佐勳章 (O.B.E.)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

第四、五屆亞洲及遠東地區經濟委員會會議香港代表

一九六〇年

香港赴西非貿易訪問團團長

一九六三年

香港赴德國法蘭克福貿易訪問團團長

一九六三年

大英帝國司令勳章 (C.B.E.)

一九六四年

香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一九六四年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一九六九年

日本三等瑞寶勳章

## 香港政府委任各局議員及委員會委員：

一九四九年

稅務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〇年

市政局議員

一九五三年

薪俸調整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〇年

特別房屋調查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

公務員敘用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

建築條例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

空運牌照局委員

立法局議員

行政局議員

反貪污諮詢委員會委員

漁業發展及貸款委員會委員

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 共濟會：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八三年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八三年

香港、華南共濟基金信託委員會主席

香港及遠東地區區總監

### 香港大學：

一九四八年

一九五四年

開始擔任校務委員會委員

開始擔任大學校董

### 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三年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三年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三年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三年

校董會副主席

校園計劃及建設委員會主席

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主席

榮譽學位委員會委員

董事會主席：

聯合地產有限公司  
加華石油有限公司  
國光漆廠有限公司  
花園酒店（香港）有限公司  
源和洋酒行  
維達航業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  
香港電話有限公司  
香港鋼管有限公司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民樂公司  
九龍的士有限公司  
光利公司  
利園酒店  
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  
興華半導體工業有限公司  
華利貿易公司

副主席：

香港羅富齊銀行  
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香港華商銀行公會

東亞銀行

亞洲航業有限公司

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

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信託有限公司

香港紡織有限公司

會德豐船務有限公司

及其他公司

其他：

香港業主聯會主席

香港鄉村俱樂部會長〔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

南華體育會會長

四邑工商總會會長及永遠名譽會長

灣仔街坊福利會會長

華商會名譽會員

中國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永遠名譽會員

香港鄉村俱樂部永遠名譽會員

香港日本人俱樂部永遠名譽會員

僑港新會商會終身董事

香港總商會會員〔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八年〕

保良局永遠董事局董事〔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

保良局副主席〔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



# 利銘澤的弟妹：

二叔 - 銘洽

三叔 - 孝和〔榮根〕, Harold

四叔 - 榮森, J. S.

五叔 - 榮傑

六叔 - 榮康, J. K.

七叔 - 榮達

二姑姐 - 舜華, Doris

三姑姐 - 舜英, Ansie

四姑姐 - 舜琴, Joyce

五姑姐 - 舜賢, Dione

六姑姐 - 舜豪, Amy

七姑姐 - 舜儀, Diana

八姑姐 - 舜娥, Vivien

# 註釋

## 永別

1. 一九八三年七月七日 Hong Kong Standard 《香港虎報》刊載
2. 一九八三年七月七日，七月十二日《南華早報》刊載

## 第一章

1. 父親的弟妹皆以叔或姑姐排行序稱呼
2. 中國南方的鄉村，亦是利氏家族祖祠所在。國人宗親觀念極重，相信父親必深以此二位同鄉為榮。

3.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子褒學校年報》第五頁及第七頁
4.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 Percy O'Brien 信函
5. 一九七四年英國倫敦出版 V.H.H. Green 所著 A History of Oxford 第一百八十八頁及一百八十九頁
6.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 Percy O'Brien 信函
7.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Percy O'Brien 信函
8.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Percy O'Brien 信函
9.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 Percy O'Brien 信函
10. 白石信一所譯小池厚之助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於山一證券公司內部發行雙月刊之文章。

## 第二章

1. 一九九七年四月招黃瑤芬及胡黃瑤芝於加拿大溫哥華口述
2. 一九九七年四月胡黃瑤芝於溫哥華口述
3. 一九三四年香港出版張蓮覺「何東夫人」所著《名山遊記》第一百〇五頁
4. 一九九七年六月香港訪問曾於黃埔船塢工作的George Todkill，並提供一九三一年父親在工地監工的相片。
5.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6. 一九九七年四月招黃瑤芬及胡黃瑤芝於溫哥華口述
7. 一九三九年上海出版Chungshee H. Liu所著Hainan, The Island and the People
8. 錄自一九三九年香港出版王少平所著《菲島瓊崖印象記》第八十一頁，王亦是父親在海南牧場的投資人之一。
9. 王少平《菲島瓊崖印象記》第六十六頁及六十七頁
10. 王少平《菲島瓊崖印象記》第六十九頁
11. 王少平《菲島瓊崖印象記》第八十一頁
12. 王少平《菲島瓊崖印象記》第八十九頁及九十頁
13. 一九九六年一月在香港訪問，經常陪同我父母親入中國的前香港新華社秘書何銘思。
14. 包括中國資源委員會技術室主任及曾任台灣交通部部長的沈怡、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錢昌照、及資源委員會採購室主任蔣平伯等人，以上資料由吳慶塘於一九九五年春在多倫多提供。
15. 為留德工程師，以採用Onega機械儀器建立火車精準時刻聞名，極獲蔣介石重用。
16.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加拿大多倫多口述
17.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18. 一九九七年六月香港電話訪問姬達爵士
19.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20. 一九九五年夏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 第三章

1. 一九九五年香港出版謝永光所著《香港抗日風雲錄》第七十二頁及七十三頁
2. 一九六〇年英國倫敦出版Tim Carew所著The Fall of Hong Kong第二十六頁及二十七頁
3. 一九九五年香港出版謝永光所著《香港抗日風雲錄》第九十六頁
4. 一九八〇年加拿大多倫多出版Ferguson, Ted所著Desperate Siege: The Battle of Hong Kong 第五頁

5. Ferguson所著Desperate Siege 第六頁及七頁
6. 一九七五年香港出版Sir Selwyn Selwyn-Clarke所著Footprints: The Memoirs of Sir Selwyn Selwyn-Clarke第五十八頁
7. 一九九六年一月譚徐靈輝於多倫多口述，戰時譚為防空隊員。
8.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伍英才於多倫多口述
9. Ferguson所著Desperate Siege 第七頁
10. 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廖仲愷之子
11.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於廣州口述
12. 一九九六年一月前香港新華社秘書何銘思於香港口述
13. Selwyn-Clarke所著Footprints: The Memoirs of Sir Selwyn Selwyn-Clarke第六十四頁
14. 當時未婚，以本名Elizabeth Teng工作

15. 一九九六年一月譚葆和於多倫多口述
16. 一九九六年一月譚葆和於多倫多口述
17. 一九八〇年香港出版David Faure所著Saikung, The Making of the District and its Experi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錄自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第二十二冊中的一百八十四頁及一百八十五頁。
18.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伍英才於多倫多口述
19. Selwyn-Clarke 所著Footprints: The Memoirs of Sir Selwyn Selwyn-Clarke 第六十五頁
20. 伍家在香港淪陷及日本投降後的全部經歷，由伍英才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多倫多口述。
21. 一九九六年一月譚葆和於多倫多口述
22. 他願繼續留在香港為市民提供醫療服務，但被某些人指控為奸細，日後為日軍拘禁。
23. 一九九六年一月譚葆和於多倫多口述
24. 一九九三年香港出版《活躍在香港——港九大隊西貢地區抗日實錄》書中，江水所撰「護送何香凝、廖承志母子倆的經過」章節中第二十二至二十六頁。
25. 一九九三年香港出版《活躍在香港》中，「港九大隊史」章節第二十及二十一頁。
26. 一九八一年香港出版Edwin Ride所著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第二十七頁，註二，第十七頁、第二十九頁及註十七。
27. 汪背棄蔣在重慶所設政府後，自行在南京另設偽政府。
28. Edwin Ride 所著B.A.A.G. 第三十一頁至四十四頁
29. Col. L. T. Ride 於一九四六年，對英國政府所寫關於華南不同組織的報告。
30.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31.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梁威林於廣州口述



32. 一九九六年一月何銘思於香港口述

## 第四章

1. Sir Selwyn-Clarke 所著Footprints: The Memories of Sir Selwyn-Clarke第六十九頁
2. 一九九五年一月譚葆和於多倫多口述
3. 一九九七年二月利漢輝於加拿大溫哥華口述
4. 一九九六年十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5. 一九九六年十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6.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伍英才於多倫多口述
7.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8.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伍英才於多倫多口述
9. 一九九六年十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10. 用絲不用棉，較普通棉被輕暖。
11. 由貴州至桂林
12. 凌鴻勳、石志仁、侯家源、袁夢鴻
13. 父親從未加入任何政治黨派
14. 此職位由二姑丈鄭觀成指派，永光煤炭行最大客戶為鐵路局，所以生意極為穩定，鄭的姪子譚乃亮為會計，與吳慶塘同住公司附近的竹泥屋內。
15.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16. 吳慶塘亦有參與此建築物的監工
17.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18.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提及，當年非常高興能有免費火車通行證。吳因喜好打乒乓球頗受鐵路局員工歡迎，經常打球時間多過鐵路監工時間，乒乓球為當時少有的娛樂活動之一。
19. 國華銀行總經理，為國內及海外華僑界極具影響力的財經人物。
20. 新加坡華僑銀行主席
21. 新加坡華僑銀行總經理
22.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23.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4.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5. 三叔曾任董事
26. 一九九七年十月香港盛樹珩信函
27.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28. 一九九七年四月招黃瑤芬於溫哥華口述
29.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 第五章

1. 每五日取白米一斤四兩、麵粉一斤及青豆半斤，一斤等於一點三二磅；一兩等於一點三三安士。
2. 刊載於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華僑日報》
3.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表示，當年任何人在此職位皆可發大財，但父親從不為自己圖利。
4.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江蕙蘭於香港口述

5. 非大英帝國聯邦受訓醫生不得在香港行醫

6. 一九六三年盛樹珩與利家重建友誼，任職香港文華酒店為營業部總管，妻子為朱貴思。

7.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四日盛樹珩香港來函

8.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七日、十二日、二十三日，一九五一年八月九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十五日、二十七日，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二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九日，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十六日，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三十一日，一九五三年五月十日、十七日、三十一日《華僑日報》

9.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華僑日報》

10.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華僑日報》

11. 一九四一年時香港四分之一勞力人口服務於工業生產

12. 日本投降時人口為五十萬人，一九四九年時多達二百萬人。

13. 一九四九年一間專在中國及東南亞吸收黨員的共產黨學校被迫關閉，至一九六七年年時香港政府極少關閉學校，但對學校「顛覆」活動則定期監察。

14. 一九六五年香港出版Alexander Grantham葛量洪總督所著Via Ports第一百一十五頁

## 第六章

1. 一九九五年四月李樂君於加州洛杉磯口述，李為父親生前最後任用的秘書。

2. 一九九五年四月李樂君於加州洛杉磯口述

## 第七章

1. 一九九一年香港出版Hedy, Sue所著《香港鄉村俱樂部》第二頁
2. 《香港鄉村俱樂部》第十三及十四頁
3. 《香港鄉村俱樂部》第七十九頁
4. 《香港鄉村俱樂部》第十六及十七頁
5. 《香港鄉村俱樂部》第二十頁
6.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虎報》
7.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 第八章

1.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江蕙蘭於香港口述
2.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江蕙蘭於香港口述
3. 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華僑日報》
4.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榮森於香港口述
5.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定昌於香港口述
6.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7. 利漢釗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香港表示，約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8. 一九九七年二月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9. 一九九七年二月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10. 一九九七年二月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11.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江蕙蘭於香港口述
12. 太古集團於一八一六年在英國成立，公司於一八六七年一月一日在上海設立Butterfield & Swire Co.，對中國進口棉花及棉布，並由中國出口絲和茶。一八七二年成立中國航運公司(C.N.Co.)，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太古將中國公司總部移至香港。一九四六年七月成立Swire and Maclaine有限公司經營進出口業，又在一九四七年六月成立Taikoo Wharf and Godown公司。一九四八年時太古取得國泰航空公司的大部股權，公司業務廣及製造、工業工程、飲料、地產、保險、農業、及零售業。
13.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於香港註冊
14. 公司於一九四八年成立
15. 一九九七年二月吳慶塘於多倫多表示，這是香港當時地產交易及商業法的一大改革，並自此帶動香港幾十年後的經濟發展。
16.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17. 我深信與香港上海商業銀行的關係對此極有影響
18. 香港的商業有線電台
19.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20. 一九九七年二月利有璇於溫哥華口述
21.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利漢釗在香港表示：當年香港的老闆決不會坐公司的送貨車。
22. 日後家族在一九九〇年代將土地出售
23. 利乾於一九九八年一月由香港提供此資料
24.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5. 利乾於一九九八年一月由香港提供此資料



26.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7.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8.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9. 香港在一九七三年受世界石油危機影響股市價格大跌，導致經濟衰退至一九七六年止。
30.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31. 一九七〇年十月成立的私人有限公司，名為興利建設有限公司，屬一九二三年所組的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名下。
32. 父親為公司初期董事會的董事長，陳斌、胡法光、Michael Jebsen、Per Jorgensen、郭得勝、利漢釗、利榮森、利國偉、Ian Robert Anderson及葉謀遵為董事。
33. 總面積為80,881平方呎，祖父當年是以祖母、父親、銘洽二叔、孝和三叔和榮森四叔的名義購置這些產業，全賴利氏家人將產業歸至家族公司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名下，令所有家族成員得以受益。事實上祖母在世時，已將她名下的產業全部歸所有子女名下。
34. 一九九七年底，身兼其他職位的利漢釗，被推選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席。
35.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 第九章

1. 原本計劃在新界屏山興建新機場，但香港殖民地政府覺得，飛機若在屏山起飛降落勢必在中國領空飛繞而過，因在五〇年代時曾有民機被擊落。啟德機場增建的新跑道可供最大客機起降，跑道用地伸入九龍海灣內，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這條新跑道才告完工使用。
2. 目前是東亞銀行主席及總裁
3. 一九九七年三月白石信一由日本提供資料

4. 由一九七〇年開始，他們即為中國高級國家領導人的眼科醫生，包括鄧小平在內。
5. 中國全面禁止自由交易二十年後，在一九七八年才開始有自由市場。

## 第十章

1. 一九六五年香港出版Alexander Grantham葛量洪總督所著Via Ports第一百八十八及一百八十九頁

2. 一九九六年一月何銘思於香港口述
3.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4. Ruth Hayhoe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寫給她母親的家書
5. 一九九七年被選為香港教育學院院長，同時亦是多倫多大學安省教育學院比較教育學教授。
6.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Ruth Hayhoe家書
7. 一九九七年六月姚剛在香港說：當年他的職位僅是初級經理，對正在香港的太古主席Sir Adrian Swire表示，政治暴動不至於有太嚴重的財物損失，同時在道義上，公司不應在客戶最需幫助的時候背棄他們。由於香港太古對此事有權可自行做主，太古便決定對客戶續保暴動險，結果公司不但分文未損，還贏得社會大眾的信心。
8.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江蕙蘭於香港口述
9.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廣州，對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費彝民在《大公報》發表之「緬懷利銘澤」訪問梁威林。
10.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李國寶於香港口述
11.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Ruth Hayhoe家書
12. 多倫多大學、約克大學聯合亞太研究所資料；一九九七年五月陸鴻基教授於亞洲人權與民主

會議中發表的The Rise of a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第十六頁及十七頁。

13. 一九九七年六月姬達爵士Sir Jack Cater，在香港表示：「香港警察在一九六七年暴動之後才冠上「皇家」二字。」

14. 一九九七年八月由Lady Cater提供屬於姬達爵士Sir Jack Cater的資料

15. 陸鴻基教授所著The Rise of a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16. 一九九五年四月李樂君於洛杉磯口述

17.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大公報》

18. 一九九七年十月陳之昭醫生於馬利蘭州巴爾地摩口述

19. 在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九年之間人口增加四倍

20. 後來與耶魯大學有聯系

21. 一九九四年香港出版，由吳倫霓霞所編的《邁進中的香港中文大學》The Quest for Excellence第十八頁

22. 《邁進中的香港中文大學》The Quest for Excellence第二十頁及二十一頁

23. 《邁進中的香港中文大學》The Quest for Excellence第二十五頁

24. 一九九七年六月馬臨教授於香港口述

25. 一九九七年六月馬臨教授於香港口述

26. 一九五一年十月由基督教會代表組成

27. 香港中文大學投標管理委員會陳尹璇提供的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三年投標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28. 一九九七年六月馬臨教授於香港口述

29. 一九九七年六月馬臨教授於香港口述

## 第十一章

1. 一九九七年六月緒方鈴子於香港口述
2. 一九九七年六月緒方鈴子於香港口述
3. 日本駐港總領事於一九六八年對日本政府的績效報告
4. 一九六九年香港日本商會離開香港日本人俱樂部，另組辦事處。
5. 一九九七年六月香港日本人俱樂部事務局長吉岡義之於香港口述
6. 日本山一證券白石信一於一九九七年三月所提供的資料
7. 後者日後遷入對街新完工的利園酒店
8.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成立
9. 一九七五年日本學校在藍塘道157號自購產業
10. 特別來賓為父親、日本總領事遠藤又男、教育署副署長、簡悅強為中國人代表及馮秉芬爵士。後者說服香港政府准許香港日本學校得以用日本學制授課。
11. 藤田一郎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所撰「香港日本人學校開校二十周年特刊」第十九頁，由吉岡義之譯為英文，原文載於Phoenix Publication第十三期。
12. 一九九四年拆除，重建為嘉蘭中心的一部份
13. 藤田一郎的「香港日本人學校開二十周年特刊」
14. 勳章上飾有碎鏡及一圈寶石，還有階級較高的勳章才有的金稜線，資料由吉岡義之一九九七年八月於香港提供。
15. 一九八八年香港出版，由Christopher Hafner為紀念我父親所寫的The Craft in the East。
16. 一九九六年十月利國偉爵士於香港口述
17. 此時杭州的七〇四計劃（一九七〇年四月）正剛開始，此計劃是興建一所佔地五十英畝可防核

子武器的地下軍事基地。地面上兩幢華麗的建築物分別屬於毛澤東和林彪所有，這計劃開始時或許並沒有圖謀囚禁毛澤東做人質的意圖，但此建築完工後確實可作此用途。一九七〇年毛澤東在廬山推翻了林彪欲宣稱毛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天才」，神化毛澤東為傀儡領袖的企圖，林彪此時心中明白必須開始進行第五七一隱喻「武裝起義」的計劃。

林彪欲推翻毛澤東的密謀，約在一九七一年春天於蘇州開始策劃，當時林彪夫婦與二十六歲的兒子林立果正在蘇州度假，全部行動是由林立果指揮。根據官方報導，原本計劃是先佯裝行刺毛澤東，然後林彪假作「營救」毛澤東，中立了周恩來、江青、康生及其他軍事領袖。但因林人手不夠，此計劃未能成功。又有另一計劃，在毛澤東搭乘特別列車在中國中南部巡視時，伺機進行暗殺。林彪在一九五九年取代彭德懷為國防部長，空軍是他計劃叛變的主力。毛聽到風聲後，當即改變行程，急速經過上海，於九月十二日早上到達北京。九月十一日林彪及葉群正在北京以東約一百三十英哩的北戴河海邊等候消息，當晚得知行刺計劃失敗後，葉群立刻收拾行李，其中有英、中和蘇、中兩本字典。同日下午五時林立果搭乘屬林彪專用，編號二五六號的三叉式引擎飛機，由北京飛到北戴河。機上三名飛行人員於九月六日受命，預備翌日早上七時起飛，九月十二日晚上周恩來接到八四三一情報單位密報，林彪、葉群及林立果有潛逃出國的跡象後，便立刻改變當日行程，延期接見日本訪問團。周恩來在三十分鐘之內下令禁止全國飛機起飛，尤其是林彪的三叉式專用機。一種說法是，此時周恩來還做勢打電話至北戴河，向林家三口問安，使他們明白事跡敗露，毛、周二人都已察覺到他們的陰謀。半夜時，三名機員被命令預備隨時待命起飛，機上除林家三人之外，尚有其他三名乘客。當時毛澤東正在中南海的室內游泳池游泳，周恩來便衝入報告林彪座機已起飛的消息，他建議趁飛機還在中國領空時，派軍機擊落，但據聞毛澤東只回應「聽其自然」。一九九三年紐約出版Harrison E.

Salisbury 所著 *The New Emperors* 第二八十四頁至三〇三頁  
 18. 一九八三年東京出版岡田晃所著《外交水鳥秘話》第一四九至一六一頁。由香港恒生銀行職員



譯為中文。

19. 一九九六年十月利國偉爵士於香港口述
20. 於一八九七年創立
21. 白石信一於一九九七年三月所提供的資料。當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成立時，白石信一是香港的業務經理為森下茂樹下屬。
22. 一九八二年九月之前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股權全部屬於山一證券公司
23. 白石信一於一九九七年二月所提供的資料
24. 寫此書時他身為日本四大證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證券公司副主席
25. 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之間
26. 白石信一於一九九七年三月由日本大阪所提供的資料
27. 白石信一於一九九七年三月由日本大阪所提供的資料
28. 一九九七年六月緒方鈴子於香港口述
29.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三越百貨店主席岡田茂給我父親的信函。三越百貨店於一六七三年創立，並在一九〇四年組成公司。
30. 根據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Asian Economic News，京華證券體系公司為台灣企業家沈慶京所有。
31.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一日白石信一的信函
32.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Asian Economic News

## 第十二章

1. 一九八八年香港出版Christopher Ha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四百二十二頁

2. 一九九七年六月姚剛於香港口述
3. 在此同時香港繼續建造世界最好的水庫，並將海水淡化處理使用。
4.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梁威林於廣州口述
5. 一九六三年五月及六月《大公報》
6.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大公報》
7.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大公報》
8.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華僑日報》
9. 一立方米約等於二百二十加侖
10.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大公報》
11.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梁威林於廣州口述
12.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香港虎報》
13.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香港虎報》
14. 一立方米約等於二百二十加侖
15. 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 Times
16.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李國寶於香港口述
17.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江蕙蘭於香港口述，利江蕙蘭在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任秘書至六十五歲退休，父親每日放工都順路送她回家，在車上常會告訴她一些平日不談的公司機密。
18. 立法局議員、行政局議員、反貪污諮詢委員會委員及漁業發展貸款委員會委員
19.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華僑日報》
20.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李國寶於香港口述
21.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費彝民於《華僑日報》所撰「緬懷利銘澤」

22.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國偉爵士於香港口述，透露此消息的中國政要因仍在世不便提及真實姓名。  
23. 父親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及十五日，在德國法蘭克福 Gravenbruch-Kempinski Hotel 所發表的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內容。

24.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梁威林於廣州口述

25. 一九七九年一月《名流月刊》第二十四頁

26.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大公報》

27.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馬臨教授信函

28.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29. 一九九七年六月馬臨教授於香港口述

30. 中國年輕人常不分「n」與「l」發音，令字義混淆不清

31. 一九九五年四月李樂君於洛杉磯口述

32. 一九九五年四月李樂君於洛杉磯口述

33. 姚剛於一九四八年大學畢業後即加入太古集團的上海辦事處工作，後來成為首位獲送至英國接受實習訓練的本地人，通常此機會僅保留給牛津畢業生。一九五一年韓戰爆發後，太古不願再派專家至中國，便詢問姚回中國的意願，結果以二十二、三歲的年齡，姚剛成為太古在中國的保險業經理，總部設於上海，在天津、青島、漢口、廈門及汕頭皆有分公司。一九五三年時他覺得太古在中國前途不明，提議太古自中國撤退，太古便接受他的建議撤出中國，姚剛在一九五三年聖誕節抵達香港。他退休之前身兼太古集團六個輔屬企業的主席。

34. 一九九七年六月姚剛於香港口述

35. 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為北京政府最具實力的國際公司，海內外共有二十間分公司，員工兩萬六千人，資產美金五億元以上。海外發展方向集中於開發天然資源及通訊事業：如在華盛頓西

- 雅圖所有的森林產業，成為美國西北部的木材主要供應商。其他企業亦有中華電力公司、港龍航空、香港電訊、貿易，及大多在香港、澳門及中國的地產業。公司股票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姚剛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在香港表示：因他與魏的私人友誼是「太古與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關係密切的原因，促使二者有許多合作企業」。
36. 旅客可由香港上車直赴廣州辦理入境手續，不必在邊境接受檢查。
37.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任社長
38.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王匡於廣州口述
39. 利銘澤所發表的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
40. 美國銀行副總裁 H.A. Washcheck 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四日致父親的信函
41. 費彝民於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在《大公報》所撰「緬懷利銘澤」
42. 費彝民「緬懷利銘澤」
43. 合約規定中國在十五年之後擁有旅館所有權，但後來延長至二十年。
44. 附屬條約於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簽署
45. 合約中稱花園賓館
46.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花園酒店〔香港〕有限公司與廣州嶺南置業公司，簽訂廣州花園賓館的工程及經營合作合約。
47.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花園酒店〔香港〕有限公司與廣州嶺南置業公司，簽訂廣州花園賓館的工程及經營合作附屬合約。
48.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
49.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表示，當時是中方代表堅持此設計。
50. 一九九五年春吳慶塘於多倫多口述

51. 姚剛於一九九七年六月於香港表示；完工時造價超出預算百分之八十，為港幣十五億元。
52. 她因而成為廣州花園酒店董事局的副主席
53. 一九九七年六月姚剛於香港口述
54. 父親計劃在東京設立聯絡處，由緒方鈴子負責。
55. 一九九七年六月緒方鈴子於香港表示；當時雖然美國領事館已遷出，僅將文化中心留在花園酒店，但日本領事館仍未有遷移打算。
56. 港幣七億元
57. 為中國政府在北京的賓館專招待達官顯要，因古代君王於內宮釣魚而命名為釣魚台。
58. 一九九七年六月姚剛於香港口述
59. 一九九五年春李樂君於洛杉磯口述

## 第十三章

1.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南華早報》Berta Manson所撰Empire Builders的系列報導
2.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南華早報》
3. 這是香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出現的社會現象，導致一九七三年的經濟衰退。
4.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大公報》
5.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南華早報》
6.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及十五日，利銘澤於德國法蘭克福經濟會議中，所發表的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演講詞。
7. 一如西方家庭的聖誕樹，國人在農曆年時家中常擺飾桃花，盼能在年初一開花為來年帶來好運。



8. 一九九五年春李樂君於洛杉磯口述
  9. 一九九六年十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10. 一九九六年十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11. 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華僑日報》
  12.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九日《華僑日報》
  13.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九日《華僑日報》
  14. 香港鋼管有限公司開幕致辭
  15.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江蕙蘭於香港口述
  16.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大公報》
  17. 一九七九年八月《名流月刊》第二十四頁
  18. 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
- 《大公報》
19.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月及四月《大公報》
  20. 維多利亞城市發展公司秘書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六日給父親的信函
  21.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22.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3.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4. 中國政府並不打算將國內不穩定的局面波及香港
  25. 一九九六年利漢釗於香港表示，香港第三條過海隧道可在一九九七年完成。
  26.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費彝民於《大公報》所撰「緬懷利銘澤」
  27. 這亦是香港市區革命性的改變，將香港及九龍聯合為一個大城市。

28.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漢釗於香港口述
29. 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G. R. Ross接任之前，父親仍為主席。
30.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華僑日報》
31. Jardine Fleming & Company Limited是香港第一間商業銀行，於一九七〇年成立，Jardine Matheson Holdings Limited及Robert Fleming Holdings Limited共為股東。
32.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李國寶於香港口述
33.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華僑日報》
34. 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時，由於電話線路嚴重短缺，電話公司受賄猖獗，甚至還有黑市行情。
35. 一九九七年六月於香港電話訪問姬達爵士
36. 姬達爵士是香港戰後的軍方高層人員，那時與父親相識並成為好友。他於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十月任職於香港廉政專員公署為廉政專員，繼任職布政司，日後獲封爵位。
37. 費彝民所撰「緬懷利銘澤」
38.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大公報》
39. 一九七五年七月及八月《大公報》
40. 利漢釗於一九九七年八月由香港所提供的資料
41. 一九八七年香港出版Robin Hutcheon所著The Blue Flame
42.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費彝民所撰「緬懷利銘澤」
43. Robin Hutcheon所著The Blue Flame
44.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日Sir Evelyn de Rothschild由倫敦致父親信函
45.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Sir Evelyn de Rothschild由倫敦致父親信函

46. 一九九七年六月Per Jorgensen由哥本哈根所提供的資料
47. 一九九七年六月Per Jorgensen由哥本哈根所提供的資料
48. 一九九七年四月利鄺靈愛於溫哥華口述
49. 一九九三年七月八日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50. 利銘澤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演講詞
51. 姚剛一九九八年二月香港提供資料顯示：這家英國倫敦公司是英國唯一的獨資大證券公司，在過去三十年中，公司在世界十一個金融中心皆設有分公司，香港分行於一九七四年創立。員工一千多人分佈全球，業務範圍為企業金融、工業經紀及資金管理。
52.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大公報》
53. 一九九七年四月林達光教授於溫哥華口述，一九八〇年代林為澳門東亞大學校長。一九九七年六月姚剛於香港口述，林教授與姚剛皆為加華石油有限公司董事。
54. 利銘澤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演講詞

## 第十四章

1. 一九八八年香港出版Christopher Ha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二百五十二頁
2. Ha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前註
3. Ha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前註
4. Ha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四百二十二頁
5. Ha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四百二十二頁
6. Ha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四百二十二頁
7. Ha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四百二十五頁

8. Hafner 所著 *The Craft in the East* 第四百二十一頁
9. Hafner 所著 *The Craft in the East* 第四百二十四頁
10. Hafner 所著 *The Craft in the East* 第三百六十二頁至三百六十四頁
11. 共濟會地區副區總監姚剛弟兄提供的一九九七年春季共濟會遠東及香港地區分會通訊錄。

## 第十五章

1. 一九八〇年代初北美經濟萎縮導致香港移民潮暫緩，但一九八六年許家屯的反對香港自由選舉言論及北美經濟好轉，又興起移民熱。
2.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及十五日利銘澤於德國法蘭克福 Gravenbruch-Kempinski Hotel 經濟會議中所發表的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
3. 利銘澤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
4. 利銘澤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
5. 利銘澤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
6. 英國及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在一九七一年聯合國會議中同意，將香港由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中刪除，香港問題將由兩國雙方談判。
7. 利銘澤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
8. 利銘澤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
9. 利銘澤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
10. 利銘澤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
11. 香港政府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應走的方向，在父親的 *On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to China* 演講詞中有發表演見。

12. 我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回香港時，曾見到買下亞特蘭大號的船主的兄弟叫阿明，他是Deacon & Co. 主席R.G.Ross的船工，他告訴我亞特蘭大號有幾年成為供人出海野餐的出租船隻。何寧日後在為專為富人照顧遊艇的年輕船工圈中頗受尊重，並成了他們的大阿哥。
13. 他來我們家工作時，哥哥和姐姐已赴英國讀書。
14.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費彝民在《大公報》所撰「緬懷利銘澤」
15. 一九九四年春李樂君於洛杉磯口述
16. 一九九三年香港出版許家屯所著《許家屯回憶錄》第四十三頁
17. 一九九五年春李樂君於洛杉磯口述
18. 一九九七年六月姚剛於香港口述
19. 香港與多倫多夏季因日光節約時間相差十二小時
20. 費彝民所撰「緬懷利銘澤」
21. 一九八八年香港出版Christopher Haf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四百二十四頁及四百二十五頁
22. Haf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四百二十四頁
23. Haffner所著The Craft in the East第四百二十四頁





My parents, 1981.  
父母親，1981年



Mother with President Yang Shangkun, 1989.  
1989年母親和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



I revisited Chongqing, 1996. Photo taken by the Yangtse River.  
1996年我回重慶攝於長江江畔



Mother with Cai Chang, Chairwoman of the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母親與中國婦聯會主席蔡暢



Mother with Deng Yingchao, widow of Zhou Enlai.  
母親與周恩來遺孀鄧穎超



Father with Gu Mu, Vice-Premier, circa 1982.  
父親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約於1982年。



Father welcomes the most Worshipful The Grand Master His Royal Highness The Duke of Kent, October 28, 1982. Courtesy of Zetland Hall.  
1982年10月28日父親以共濟會香港及遠東區區總監身份，歡迎最高總監根德公爵來訪。相片由香港共濟會滙蘭分會提供





Father with leaders of China, circa 1982. Far left: Yang Shangkun next to Father, Third from right: Jiang Zemin.  
父親〔左二〕與中國政要，楊尚昆〔左一〕，江澤民〔右三〕，約於1982年。





Father with President Li Xiannian, circa 1982.  
父親與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約於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

快，诸事顺遂。谨祝

健康长寿！

江泽民  
二月廿二日

Letter from Jiang Zemin to Father, 1981.<sup>1</sup> See endnotes (p. 237)

江澤民在1981年給父親的信函

##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工業部

---

詒澤先生大鑒：

此次应邀訪港，承蒙  
周到安排和熱情接待，  
不勝感謝之至。我們已于二月  
五日返回北京。由於临近春節，  
未克及時修函向候，殊以  
為歉。遙想閣下春節愉快

---



Formal letter inviting Father to be administrator of the Song Qingling Foundation from the honorary chairman Deng Xiaoping, 1982.

1982年父親的聘書



Guangzhou-Kowloon Through Train ceremony, 1979. Centre: Governor Sir Murray Maclehoze.

Front row: fourth from right, Father; second from right, Mother; fifth from left, Lian Weilin.

麥理浩〔正中〕、父親〔右四〕、母親〔右二〕及梁威林〔左五〕攝於1979年廣州至

九龍直通車通車典禮。





Father with our son Ashley at ancestral graveyard in Sunwui, January 1979.  
1979年1月父親和作者長子偉雄攝於廣東省新會縣祖墳



My parents' Golden Wedding Anniversary, February 28, 1978,  
at the Lee Gardens Hotel.

1978年2月28日父母親金婚紀念日攝於香港利園酒店



Second Grandmother (in centre), on her 90th birthday, 1976.  
1976年二祖母〔正中〕九十大慶





From left to right: I.M. Pei, Father, W. Szeto, Hon Chiu. Architects Pei and Szeto show Sunning Plaza model, 1977.  
1977年〔由左至右〕貝聿銘、父親、司徒惠及利漢釗與新寧大廈模型合影，新寧大廈為貝聿銘和司徒惠合作設計。

## Visit to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1977.

1977年訪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With village leaders.  
父親與自治區領袖



Father and village head.  
父親與自治區領袖



My parents.  
父母親





Father and me in Toronto, 1974.  
1974年父親和我攝於加拿大多倫多市



Father swimming at the Hong Kong Country Club, October 1975.  
1975年10月父親在香港鄉村俱樂部晨泳



Launching of M.V. Grand Jade, 1973.

1973年新船大玉號下水慶典



Mother dancing.

母親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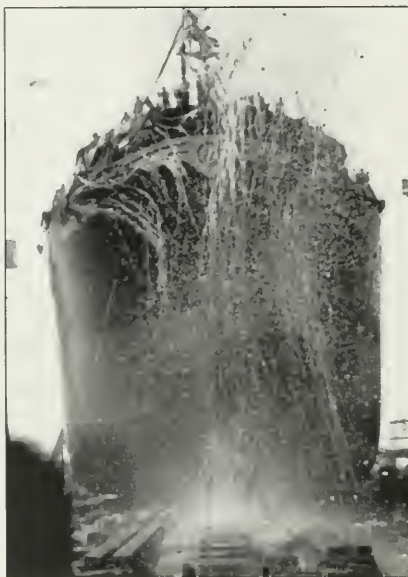


Father.

父親



Mother at the launching.  
大玉號下水典禮中的母親



Launching of M.V. Grand Jade, (named after Mother, whose Chinese name means "Jade"), a 30,000 DWT Bulker, at Koyo Dockyard on June 30, 1973.  
1973年6月30日以母親命名〔璧為玉的通稱〕的三萬噸大玉號  
新貨輪在日本正式下水





The establishment of Yamaichi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td.,  
Hong Kong, July 5, 1972. Father on the far left.  
1972年7月5日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左一為父親。



Father (far left) with Konosuke Koike next to him, circa 1980.  
父親〔左一〕和小池厚之助〔左二〕，約於1980年。



The Order of the Sacred Treasure, Gold Rays with Neck Ribbon.  
日本瑞寶勳章



Father (on far right) awarded The Order of the Sacred Treasure,  
March 12, 1969.  
1969年3月12日父親〔後排右一〕攝於瑞寶勳章授勳典禮





My parents, 1968.  
父母親，19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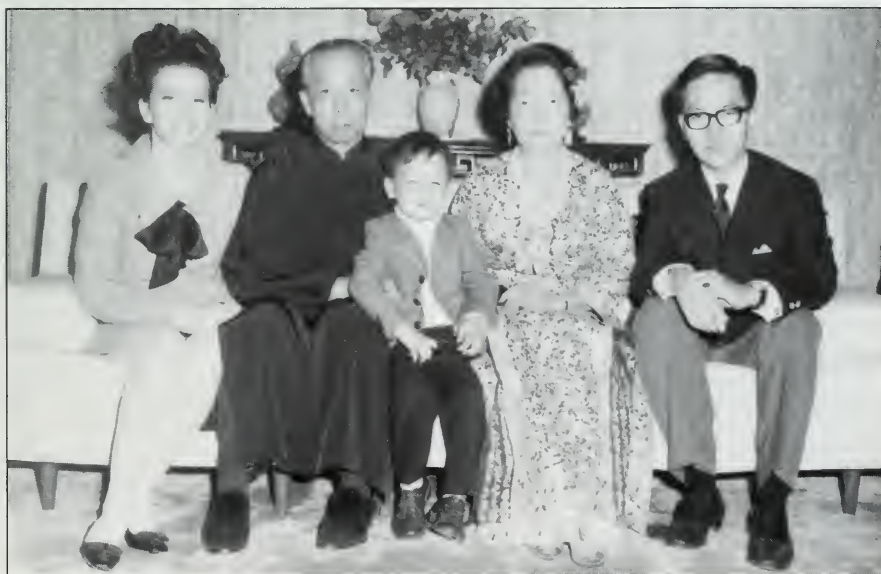
The Freemason. Father as the Grand Master of Hong Kong and the Far East, circa 1964.

父親佩掛共濟會香港及遠東區區總監的配飾，約於1964年。



I posed with my parents just before Mother and I left for Canada,  
August 1959.

1959年8月母親送我赴加拿大讀書，行前與父母親攝於機場。



Neville and me on either side of my parents and Ashley,  
Hong Kong, 1968.

1968年我與衛權同長子偉雄回港時與父母親合照





Proposed layout and alignment of the two-lane tunnel, January 1964.  
1964年1月雙車道海底隧道計劃圖及預定路線



Chinese dinner party after signing of the Cross Harbour Tunnel contract,  
Father (second from left), June 26, 1969.  
1969年6月26日海底隧道合約簽署後的中式慶祝晚宴，  
左二為父親。



Father with Her Royal Highness Princess Alexandra.  
父親與英國亞歷山大公主



Father with Her Royal Highness Princess Margaret.  
父親與英國瑪嘉烈公主





Father at Michael Jebsen's Farm in Elsholm, near Aabenraa, Denmark, 1963.  
1963年父親攝於丹麥友人農莊



Father swimming with Michael Jebsen in Als Fjord, 1963.  
1963年父親與友人在丹麥內海海峽游泳



Father, leader of the Hong Kong Trade Mission to West Africa, 1960.  
1960年父親率領貿易訪問團赴西非考察



Father presenting ancient Chinese wine cup to President Kwame Nkrumah of Ghana, 1960.

1960年父親致贈中國古酒杯給加納總理



Mother, 1952.  
母親，1952年





Father, 1952.  
父親，1952年





Mother at the opening of Sir Robert Hotung's Princess Theatre. Father (second from left) and Sir Robert Hotung (seated) look on, December 1952.  
1952年12月母親為何東爵士〔坐者〕的樂宮戲院開幕剪綵，  
左二為父親



Launch picnic, 1955.  
1955年出海野餐



On our first launch, 1947. Left to right: Mother, Deanna, Richard, me and Father.

1947年全家首次出海，左起：母親、姐姐、哥哥、我及父親。



Family picture, 1949. Left to right in front row: Deanna, Richard, Christopher and me. Second Row: my parents.

1949年的全家福，前排左起：姐姐、哥哥、弟弟及我，  
後排為父母親。



Admiral Sir Cecil Harcourt, governor of postwar military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with Mother (immediate right) and Fourth Aunt (immediate left), April 11, 1946.

1946年4月11日母親〔右二〕、四姑姐〔左二〕與  
戰後香港軍政府總督Sir Cecil Harcourt 合影。



Sir Alexander and Lady Grantham with my parents (on right), Hong Kong, 1950.

1950年父母親〔右〕和香港總督葛量洪夫婦攝於香港





The Lee Building, 1945.  
利行，1945年



Family in Yishan, 1943. Left to right: Richard, Father, Deanna, Mother, and me.

1943年全家在宜山，左起：哥哥、父親、姐姐、母親及我。



Family in Chongqing, 1945. Left to right: Mother, Deanna, Richard, me and Father.

1945年全家在重慶，左起：母親、姐姐、哥哥、我及父親。



## Hainan Island, 1935-37

海南島，1935年至1937年



Father with friends.

父親與友人



Primitive transportation.

原始的交通工具



Mango fork and knife designed  
and crafted by Father.

父親設計製造的芒果刀叉

# Li aborigines in Hainan Island, 1935-37

海南島原住民黎人，1935年至1937年



## Hainan Island, 1935-37

海南島，1935年至1937年



Father at plantation.

父親於牧場



Father on a tractor.

父親駕駛農耕機



Friends and family at home in Conghua, 1935. Mother and Father on left.  
1935年父母親〔左一、左二〕和親友攝於從化寓所



In Conghua with Mother's family, 1935. Mother and Father on left.  
1935年父母親〔左一、左二〕和母親家人攝於從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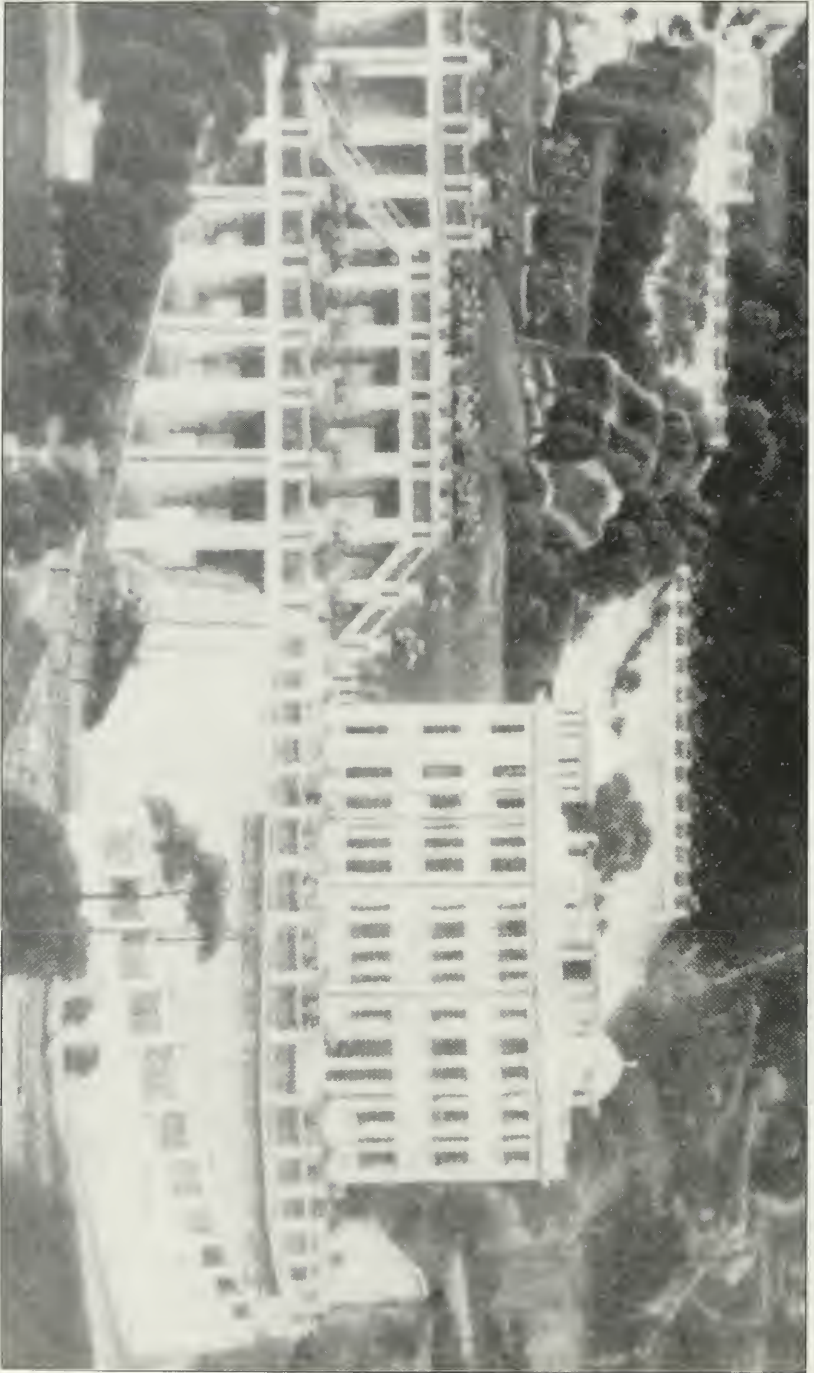


My parents' wedding, February 28, 1928, at St. John's Cathedral.  
父母親於1928年2月28日在香港聖約翰大教堂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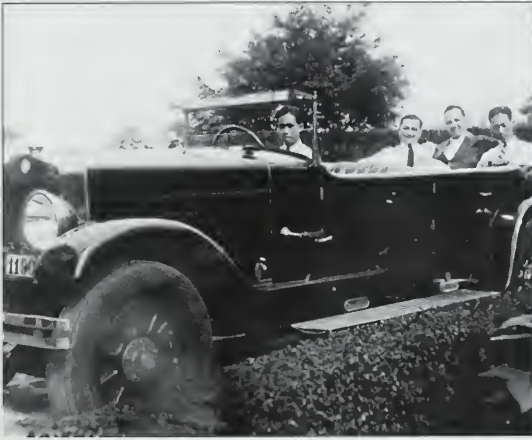


The Wong clan, 1921.  
黃氏家族攝於1921年



The Big House, 1920.  
大屋，1920年

England, 1923-27  
英國，1923年至1927年



Father driving his friends.  
父親駕車接載朋友



Father riding.  
父親騎馬





Father as a student at Oxford, 1923-27.  
1923年至1927年，牛津大學學生時期的父親。



Father and Grandfather, circa 1909.  
父親與祖父，約於一九〇九年。



## IN TERMS OF ORDINANCE NO. 1 OF 1936

When and where born.	Name if any.	Sex	Name and Surname of Father.	Name and Maiden Surname.	Rank or profes- sion of Father	Signature, Description and Residence of Informant	When Registered.	Original Name, if a child after Registration of Birth
128 74 Street 1905 To Ben Han District of Shanghai 生年正月也。	利 銘 澤 Li Ming Ze	Male 男	利 熙 臣 Li Xi Chen	張 門 喜 Zhang Men Xi	店 東 Dian Dong	See Xi Chen Jiatun, 75 Road - Shanghai Shanghai 王仁威父 利熙臣 生年正月也	5th 册年二月九日 1905 注册年二月九日	Robert Charles (See)

Extract from the Register of Births in the Colony of Hongkong this, 3<sup>rd</sup> day of December 1919. C 17.10 Key 253  
True Copy  
Prov. Head of Sanitary Depar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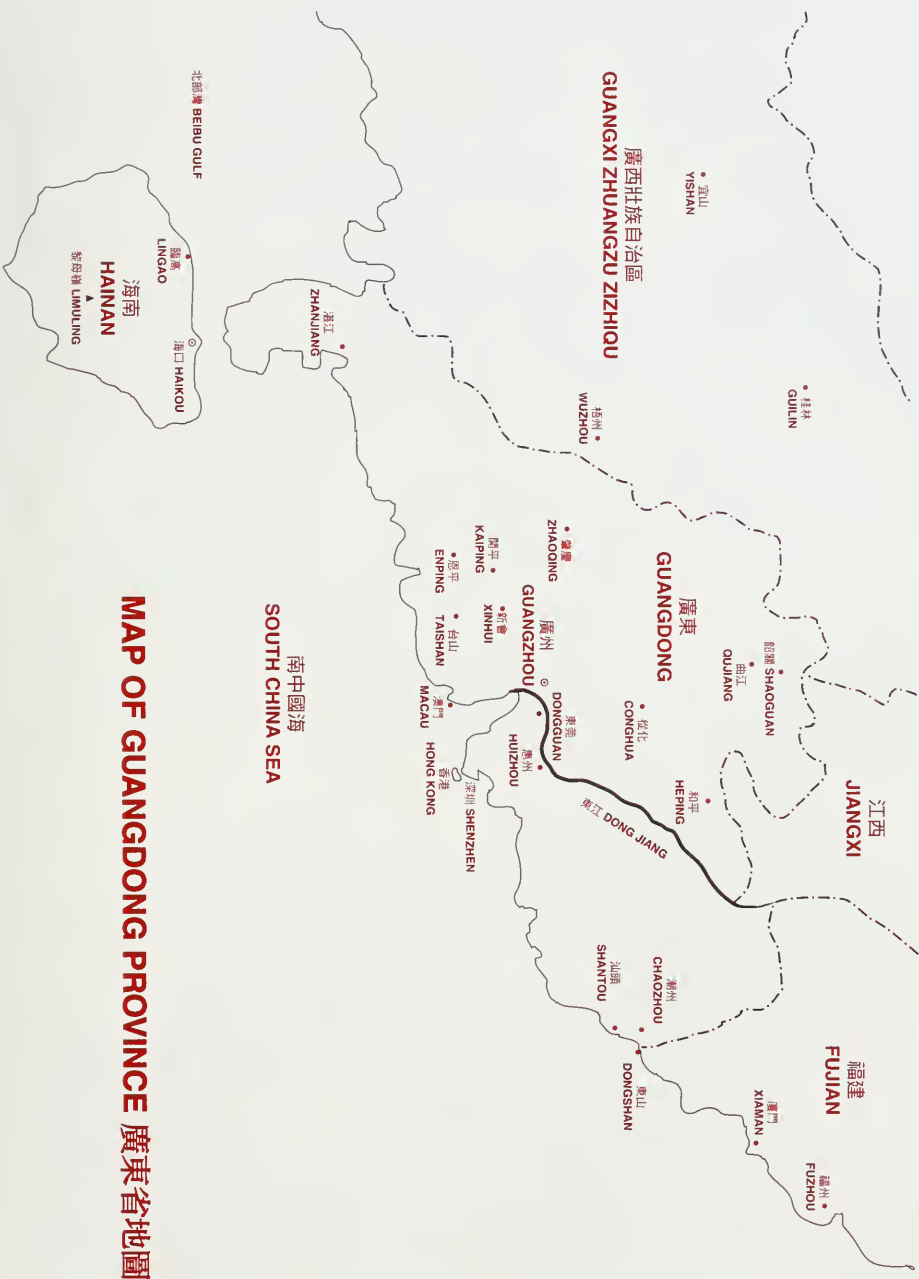
The literature of history of handwriting since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not listed in the Summary, though this is probably a mistake. The references of the literature appear every week under the heading of "Handwriting." The literature of handwriting since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not listed in the Summary, though this is probably a mistake. The references of the literature appear every week under the heading of "Handwriting."

Father's birth certificate.  
父親的出生紙



MAP OF HONG KONG 香港地圖





# MAP OF CHINA 中國地圖





To  
Cassidy-Hung Lay Room Centre

all good wishes

Vivian  
Oct. 6, 98.

加港文獻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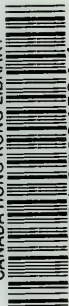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Gift from

Ms Vivienne Poy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84584 1

# BUILDING BRIDGES

*The Life & Times of  
Richard Charles Lee*  
Hong Kong: 1905-1983

VIVIENNE POY